



## 【论 文】

# 国家的眼睛： 社会科学家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sup>1</sup>

托马斯·S. 墨磊宁<sup>2</sup> (Thomas S. Mullaney) 著,  
曹何稚译<sup>3</sup>

【摘要】本文对 1954 年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在这项计划中，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干部共同从省内一百多个少数群体中认定出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本文指出，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和共产党的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重要。借用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教会自己如何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至少在民族识别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这样的。相反，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在 1954 年民族识别的个案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治理的思维 (mentality)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比较社会科学的思维。

【关键词】中国；中国共产党；民族识别；少数民族；族群；民族学；民族政治；治理；历史；语言学；民族；国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分类学；云南

## 导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五年后的 1954 年夏天，一个由大约 50 位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干部组成的小组向全国民族成分最多样化的云南省进发，旨在确认省内百余个少数群体中哪些将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在这项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工作当中，由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创造了一幅人口学的蓝图，后来被中国政府用以指导“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sup>4</sup>

虽然民族识别意义重大，但不论是从重要性方面来看，还是就基本信息而言（谁参与了这项工作，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开展这项工作的缘由何在），民族识别一直都是中国当代史中最缺乏理解的一段插曲。在 1995 年中国出版了首部（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有关民族识别的专著后，这种困惑有所减轻。<sup>5</sup>但在澄清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时，这项研究详细地但却不加批评地将民族识别描绘成一个发现的过程，似乎民族识别的调查者只是揭示了一个既存的民族秩序。该书的论调和分析方法直接反映出了作者的立场。这本书由 1954 年民族识别小组的一位成员施联朱所写，但却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位政府官员黄光学名下出版。黄光学和施联朱没有打算对当年的识别

<sup>1</sup> 本文的英文题目为“Seeing for the State: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China’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刊载于 *Asian Ethnicity*, Vol. 11, No. 3, October 2010, 第325–342页。

<sup>2</sup> Thomas S. Mullaney, 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现代中国史助理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处女作《*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探讨了中国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政府决定哪些少数民族群体将得到认定的过程，以及这一认定如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格局。他还主编了《*Critical Han Studies: Understanding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on Earth*》（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集结了一些关于中国主体民族的开创性研究。最近他致力于研究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全球发展史，重点研究了电报码、打字、汉字检索系统、速记、盲文、计算机技术和其它现代语言系统在中国的发展。作者地址：Department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450 Serra Mall, Building, 200, Stanford, CA, 94305-2024, USA.

<sup>3</sup>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sup>4</sup> 作者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2010 年即将出版的《*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中的材料。

<sup>5</sup> 黄光学，1995，《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

工作和划分类别的结论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更无心揭示中国政府在建构官方认定的民族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是将民族识别处理为一个由调查者发现既存民族身份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大陆学者企图将民族识别及其发现说成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其他国家的学者则倾向于强调国家在划分甚至强加这种民族身份类别时扮演的核心角色。<sup>1</sup> 在学术界以外，这种倾向也同样处于支配地位。在过去五年与其他学者的频繁交流中，我发现存在这样一种默认的观点，即认为政府将民族识别和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强加给了人民。共产主义中国不仅想象和发明了这些民族身份类别，而且让中国社会看到了这种新型模式的重要性。

在这种高度两极化的历史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对民族识别计划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并指出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和共产党的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更重要。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教会自己如何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至少在民族识别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这样的。<sup>2</sup> 相反，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简言之，本文将阐明在 1954 年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治理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比较社会科学的思维。社会科学家充当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眼睛，并且因此教会了这个国家如何以分类的眼光看待族群。为阐明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之间的关系，我将着重考察民族识别的三个关键方面，即识别工作计划的缘起、民族分类的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的后勤工作。

## 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

与土地改革不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共产党为巩固政权而计划执行的，共产党也没有致力于将中国各少数民族合并为总数小一些的一些大群体的考虑。<sup>3</sup> 相反，共产党只是为应对建国初期特殊且无法预料的政治危机——建国后人口普查的结果——而十分不得已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这次人口普查允许“新中国”的公民在不受国家分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愿登记“民族身份”，结果全国自由地申报出 400 多个民族名称，这使政府大为震惊。如果国家接受这一普查结果，中央政府必将瘫痪，包含所有民族代表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无法建立。

要理解这一危机的直接起源，必须回到 1952 年，当时中央政府宣布将于 1954 年下半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届时这个年轻的政权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并将当时仅在地方上运用的代议制建立一个全国性体制。此外，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共产党要将它积存的抽象的民族政治承诺转换成具体的政策，这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和民族代表制。<sup>4</sup>

195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是早期落实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些法案统一规定了县级、省级和国家级选举的程序，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如

---

<sup>1</sup> 如 Herberer. *Nationalities, Conflict and Ethnicity* 和 Bradley.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Yi*。事实上在英语学界对中国民族的研究中，民族识别始终是缺位的。例如，尽管许多学者考察了共产党时期的民族政治，但通常是从官方认定的民族入手，并未关注这些民族最初被分类的过程。又如 June Dreyer 对共产党的民族政治做出了非常经典的分析，但却完全没有讨论民族识别。Colin Mackerras 在其 1994 年的著作中只给民族识别留了 3 页篇幅，而在其之前和之后的著作中则再无提及。参见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Mackerras.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在政治科学中，值得一提的例外是 Katherine Kaup 对壮族的研究（*Creating the Zhuang*）。在人类学中，民族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也保持着未被检验的状态。虽然很多学者都讨论了中国的非汉族群体是如何在 56 个民族的框架下运作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对官方认定的结果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最初对民族身份进行分类的历史仍然是未予讨论的。参见 Litzinger. *Other Chinas* 和 Schien. *Minority Rules*。值得一提的例外是 Melissa Brown 的著作，她对土家族识别的研究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参见 Brown.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e*。

<sup>2</sup>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sup>3</sup> Gladney. *Muslim Chinese*, p. 67.

<sup>4</sup> 要深入了解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治观，参见 Liu. *Frontier Passages*。

邓小平在 1953 年 2 月 11 日的讲话中所说，这些法案包含了一些确保少数民族优惠待遇的章程。首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定的 1200 个席位中，法律规定少数民族代表至少占有 150 个席位。中国政府的预期甚至还超出了这个数字。据邓小平所说，政府预计将有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来自少数民族，这一比例超出了仅占中国公民约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有很多民族，分布在非常广阔的地区，因此他们需要此种程度的待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相当数目的少数民族代表。”1953 年的《选举法》承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寡，至少享有一个代表席位。这是为了保护较小民族的政治权益，并且避免他们在仅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体制中遭到较大民族的掩盖。<sup>1</sup>但在这一体制得以实现之前，共产党将在后勤方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需要创造一个按“民族”边界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划分的官方分类法，为此必须精确地知晓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以及他们的名称。然而，虽然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进程，但从未彻底地解决这一族群政治学（ethnopolitics）问题。<sup>2</sup>

共产党最初制定的计划并不是一项社会科学分类，而是一条俗称“民从主人”的不干预政策。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所属民族的称谓。为此，政府于 1953 年 7 月至 1954 年 5 月开展了一项大大简化了的人口普查和全国范围内的选民登记。<sup>3</sup>普查人员要询问五项问题：姓名、年龄、性别、与户主的关系以及民族身份。<sup>4</sup>当普查人员要求被调查者申报其所属的民族时，后者并不是从既定的清单中选择自己所属民族的名称，而是在空白处填写，或口头告知普查人员并由后者转译成汉语。

在某些方面，普查登记结果证实了共产党对中国人口情况的一些预期。例如云南登记了白族、本人族、傣族、哈尼族、回族、景颇族、卡瓦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普拉族、彝族和壮族共 14 个人口超过十万的群体。根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普查之前绘制的民族分布图，政府对这些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并做好了认定他们的准备。<sup>5</sup>同样，普查还登记了阿昌族、阿札族、布朗族、花腰族、苦聪族、母机族、怒族、土族、香堂族、些族、西番族、瑶族和藏族共 13 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中等群体。正如共产党预计的那样，当地的确存在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对应的族称。

但在这 27 个群体之外，民族志地图就开始变得非常模糊了。登记显示人口在 100 至 1000 之间的群体有 38 个，而人口少于 100 的群体竟有 92 个。<sup>6</sup>全国共统计出 400 多个民族名称，其中有 200 多个来自西南边陲省份云南。<sup>7</sup>按照当时颁布不久的《选举法》，中国政府将面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一大群代表小群体的少数民族代表所充斥的困境。如果说邓小平和其他人最初就预料到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将从少数民族中产生，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比例会远远超过预期数字，达到大约四分之一。而且还有 20 个群体的人口登记仅有 1 人，这意味着还将出现某个少数民族代表仅仅代表他（她）自己的荒唐情况。<sup>1</sup>

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制定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sup>1</sup> 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第 201 页。

<sup>2</sup> Liu. *Frontier Passages*.

<sup>3</sup> 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初稿）》，1954 年。

<sup>4</sup> Arid. *The Siz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sup>5</sup>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云南省民族事物委员会，1953，《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

<sup>6</sup>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1954 年。

<sup>7</sup> Fei Xiaoto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正是在这种现实面前，而非因为某个既存方案，民族识别工作才正式启动了。1954年初，还有短短6个月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此时政府只有求助于中国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决定首先解决情况最复杂的云南省的问题，于是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于1954年春正式成立。

## 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民族学家曾被描述为“被共产党强加的科学所束缚的囚徒”（*prisoners of the science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Communist Party*）<sup>2</sup>，并且往往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仆从。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倾斗争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新中国初期却缺乏适用性，对于1954年的民族识别计划来说尤其不适合。虽然这项计划的主管都是政府官员，如云南省副省长张冲（1900-1980）、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群杰（1912-2008），但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团队成员却是调查主管人。有三位学者更是在事实上监管了民族识别计划，即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1910-2000）、语言学家傅懋勤（1911-1988），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云南本地人方国瑜（1903-1983），他们都是在民国时期（1911-1949）成长并完成专业训练的。<sup>3</sup>

政府给这些学者、干部分配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即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小组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多点调查，并最终形成一套有关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分类的提案。他们制定出的民族分类法不仅会影响到学术界，还将影响国家本身的人口构成。好在林耀华、傅懋勤、方国瑜——以及杨堃等非官方调查者——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制定出了一套精致的云南民族分类系统，在他们看来，民族识别就是其工作的一个延续。与中国早期的其他民族学家一样，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环境下进入云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科学界放弃了东部沿海地区，撤退到民族成分极其多样的西南内地。作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社会科学家们暂时搁置了他们早年对都市社会学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而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上，这产生了丰富的民族学调查，中国民族学的学术规范也由此诞生。在这段战时流亡期，学者们开始将云南看作费孝通所说的“文化的最佳实验室”，在这个地区中“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原始猎头者到复杂、个体化的城市居民——都生动地展现了出来。”<sup>4</sup>费孝通欣喜地描述从昆明郊区走到城区就像“在一天之内从波利尼西亚环游到了纽约。”<sup>4</sup>与非汉族群体毗邻而居，社会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云南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又是什么人？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民族学要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凌纯声、马长寿、罗常培、林耀华等人开始为云南省的民族迷宫绘制地图。

据我在别处深入考察到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族学家运用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运用词汇比较法等来自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学者们开始将语言作为族性的表征，“语言群体”和“族群”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以前分为“方言群体”和“民族支系”）。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家把他们在云南使用的分类理论追溯到英国殖民官员H. R. 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那里。虽然戴维斯是一位业余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但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认为他制定了云南最早的科学人口分类，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这一分类只进行了微调。<sup>5</sup>在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界的核心人物，这种语言学方法也被带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这些跨越了1949年分界线的学者有林耀华、方国瑜、费孝通、傅懋勤、罗常培、马学良、杨成志、杨堃等人。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达到了他们的学术

---

<sup>1</sup> 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物委员会研究室，《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1954年。

<sup>2</sup> Harrell.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p. 244.

<sup>3</sup> 2003年1月3日于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4</sup>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 p. 9.

<sup>5</sup> Dacies. *Yün-nan*.

鼎盛期，此时已经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占据了学术领军人物的位置。<sup>1</sup>林耀华、傅懋勳和方国瑜还主管着民族识别的具体调查部门。

要理解新中国早期的民族分类理论与民国后期之间的连续性，只需回顾识别计划开始前的1954年3月即可。当时罗常培和傅懋勳提出：“在云南的大概140个少数民族名称中，许多只存在称谓上的差异，而实际上是相同的。如果以拥有独立的语言为标准，这些族称单位（ethnonyms）可以合并成大约25个群体。”<sup>2</sup>在识别小组刚刚组建的4月26日，语言学家罗季光给识别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中重申了傅懋勳的观点（后者日后被任命为识别小组的首席语言学家）。罗季光指出，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来看，识别小组可以将这上百个民族名称合并到25个左右。<sup>3</sup>在仅仅三天后的4月29日下午，语言学专家马学良（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民族学家）给识别小组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这封题为“语言在调查里的作用”的信简明且直接：在对云南人民开展深入的民族学调查之前，首先需要进行语言学分类。只要用这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比较法和分类法勾勒出云南省民族构成的基本框架，调查者就可以据此进一步研究当地的文化、习俗等等。<sup>4</sup>在民族识别刚刚启动的六月初，识别小组将语言正式列为“分类的基本标准”<sup>5</sup>。从这个方面上看，民族识别工作就是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延续，整体的分类学理论和具体的民族分类范式在这两个时期都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1954年罗季光给识别小组的建议和凌纯声、丁文江、马长寿等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之间，看到一条直接的、未曾断裂的谱系（见表1）。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1954年民族识别小组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最终提案同样保留了这种连续性。

表1：罗季光的民族分类与20世纪有影响力的民族分类之比较<sup>6</sup>

丁文江（1935）	凌纯声（1936）	马长寿（1936）	罗季光（1954）
类别稳定的群体			
苗	苗	苗	苗
瑶	瑶	瑶	瑶
民家	民家	民家	民家
蒲蛮（蒲人）	蒲蛮	蒲蛮	蒲蛮
傣（摆夷）	傣（摆夷）	傣（僂夷）	傣
藏	藏	藏	藏
-	古宗	-	-
西番	西番	西番	西番
-	纳西（么些）	纳西（么些）	纳西
怒	怒	怒	怒
倮□（彝）	倮□（彝）	倮□（彝）	彝
倮倮	倮倮	倮倮	倮倮
-	阿卡	-	-
倮黑	倮黑	倮黑	拉祜
窝泥（哈尼）	窝泥（哈尼）	窝泥（哈尼）	窝泥（哈尼）
景颇（克钦）	景颇（开钦）	景颇	景颇
-	佤	-	佤 <sup>12</sup>

<sup>1</sup> 参见笔者对徐琳的访谈。徐琳，傅懋勳的妻子，曾参与1952年的语言学调查和1954年的民族识别计划。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J]。

<sup>2</sup>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J]《中国语文》1954年。

<sup>3</sup>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4</sup>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引用了他关于《语言在调查里的作用》的笔记。

<sup>5</sup> 研究室，《云南省少数民族支系系属研究概况和存在问题》[Z]，1954年。

<sup>6</sup> 马长寿分类中的仡佬、畲族、黎、水家等一些西南民族并不属于本次研究聚焦的区域，因此在表中没有列出。另外，丁文江认定出的“安南人”（越南人）和凌纯声认定出的“僂”对于20世纪学术界趋势来说完全是孤立、偏离的，在此也不列出。丁文江，《爨文丛刻》[M]；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J]；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J]；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J]。第21-26页。

类别不稳定的群体			
缅族系			
-	阿昌	阿昌	阿昌
-	喇僊	喇僊	-
-	阿系	阿系	载瓦
-	马鲁	马喇	-
缅人	-	-	缅人
-	-	-	茶山
-	-	-	浪速
佧族系			
-	崩龙	-	崩龙 <sup>3</sup>
-	卡瓦	瓦	卡瓦
-	拉（卡拉）	喇	-
-	-	噗喇	-
僳族系			
-	-	僳	-
-	仲家	仲家	-
-	依	依	依
-	沙	沙	沙
-	吕	-	-

一度被奉为民族分类指导范式的语言学模型对识别计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识别小组把语言学模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仅在必须证实或修改这一模型时，才开展田野调查。换句话说，民族识别并不包括“对日常琐事和当地习俗的民族志调查”<sup>4</sup>，也算不上“迄今最全面的田野调查”<sup>5</sup>相反，识别小组在每个申报群体（application group）中选择出一至十名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为期几小时至几天不等的简短访谈。<sup>6</sup>

民族分类的谱系对于理解识别计划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上文讨论的识别计划的缘起更是十分重要。虽然学者们往往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简化民族分类，但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事实上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首先发起并四处呼吁进行民族分类。早在建国人口普查的危机出现之前，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已经自发地致力于建立一套理论，将西南地区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组织到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框架中。而且，他们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理”，而是谋求“分门别类”（departmentality），从而使新形成的中国民族学——而非政府——能够看清这个社会。若如斯科特所说“国家的简化”是为了确保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制正常运行，那么“社会科学的简化”就是为了确保学术准则的正常运行，这为专业认同以及信息的流通和储存提供了基础。只是在1953至1954年的危机出现之后，中国共产党求助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这种社会科学思维才进入到了共产党的治国之道中。如果我们将讨论再推进一步，就可以发现一种被公认为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却是值得考虑的。在民族识别开始之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sup>1</sup> 但是在1954年调查小组为官方认定的民族分类提交的最终提名中，傣还是被当作了一个不稳定的类别。在临近识别计划第一阶段的1954年7月，识别小组还是没有弄清傣和怒的关系，但暂定在最终报告中将两者合二为一。不久后，随着识别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展，小组又决定将两个族群分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初步总结》[Z]，1954年，第10-11页。

<sup>2</sup> 戴维斯和民国时期的分类学家在他们的分类中并没有明确地列出回族和蒙古族，但这一疏忽并不代表他们否认这两个民族的存在，二者已经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说”成为了公认的事实。

<sup>3</sup> 虽然1959年官方认定了崩龙族（之后改名“德昂族”），但在调查者首次向政府部门提出这项建议时它还是有些不清晰。在1954年提交的最初报告中还没有能够提出证明崩龙族存在的证据，但王晓义（口述）和张奇峰在1960年的民族识别报告中谈到，在1954年的识别小组中已经有认定崩龙族的最初和非正式的倾向了。参见张奇峰，《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Z]，第10页。

<sup>4</sup> Tapp, 'In Defense of the Archaic', p. 67.

<sup>5</sup>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p. 131.

<sup>6</sup>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接受了省内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观点，这大大超出了 20 世纪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做出的分类。在一幅 1951 年内部刊印的民族分布图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列出了 132 个民族。<sup>1</sup>1953 年，在该委员会出版的另一幅分布图中列有 125 个民族。<sup>2</sup>到 1953 年再版时，这个数字仅仅稍微缩减到 124 个。<sup>3</sup>这些材料——特别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民族志著述和声明相对比——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只是民族分类的辅助刀手，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才是主刀手。<sup>4</sup>

## 知识与权力的联合

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计划当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自主性而忽略了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为了平衡二者，下文将考察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由中国共产党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方面：管理识别计划的后勤工作；决定哪些群体将接受识别及其先后次序；为识别小组提供某种方法以确保被识别群体能够认同识别工作的结果（这是中国民族学家之前很少考虑的）。在上述三个方面，识别小组的社会科学家们都是依赖于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

政府首要和最基本的工作是安排行程、食宿和访谈。在识别小组到达任何一个指定的城镇或村庄之前，地方官员就已经安排好了食宿和从昆明出发的差旅条件。<sup>5</sup>在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后，调查者居住在各政府单位里，如地方政府、军队和小学。<sup>6</sup>每天的调查路线也是由云南省基层政府安排的。调查者没有时间自己去寻找各个待识别民族（*minzu candidates*）的代表，要接触到这些人并进行田野访谈，只能靠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干部来安排。<sup>7</sup>例如地方干部安排调查者与政府当中自我申报为阿木、布都、布孔、卡都、喇赖和期第的人接触。<sup>8</sup>如果没有合适的访谈对象，地方政府就会扩大范围，将偏远地区的非汉族居民从他们的村庄中接到县城来，调查者通常会对他们进行几小时的访谈。这些受访者会得到当地政府的一小笔补贴，以抵偿他们的收入损失。<sup>9</sup>

以识别调查员王晓义的经历为例，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与基层政府关联得有多密切（以及田野调查的行程安排得有多紧凑）。<sup>10</sup>1954 年 5 月 27 日，识别小组全体开会讨论调查的任务分配问题。王晓义和另一位语言学家常宏恩被分到了墨江县，这个两人小队负责调查疑似哈尼族支系的群体。6 月 3 日，在另一个小队出发前往调查地点的第二天，王晓义和常宏恩的行程是断断续续地在 5 个村庄和墨江县城之间徘徊，在 16 天里大概调查了 7 个申报群体。<sup>11</sup>6 月 22 日他们离开墨江前往普洱，用两周时间探访了 5 个村庄，调查了另外 5 个族称单位（*ethnonymic groups*）。7 月 4 日完成第一阶段的总结，用两天时间返回昆明。在昆明，二人又花费 5 天时间参加讨论会议、结算开支、整理田野笔记。7 月 13 日开始为期一周的撰写。7 月 21 日向识别小组领导林耀华提交了最终的分类提案（*taxonomic recommendations*），至此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的准备工作迅速开始，识别小组人员被重新划分编为新的小队，这一次王晓义和施联朱、陈凤贤、沈家驹、常宏恩一起被分配到新平小组。他们于 8 月 15 日从昆明出发，18 日到

<sup>1</sup>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云南省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Z]，第 5 页。

<sup>2</sup>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3，《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Z]。

<sup>3</sup> 如上。

<sup>4</sup> 更详尽的论述参见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sup>5</sup> 2003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sup>6</sup> 2003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sup>7</sup> 2003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2003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sup>8</sup> 2003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9</sup> 2003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sup>10</sup> 2003 年 1 月 3 日和 1 月 23 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11</sup> 2003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达新平。在接下来的四周里，小队探访了十多个村子，调查了约 13 个待识别民族。9 月 16 日，他们返回到位于新平县城的驻地，用两周时间整理材料、准备最终报告。9 月 29 日，小队返回昆明并向林耀华提交第二阶段的分类提案，至此第二阶段结束。王晓义的调查任务相对于其他组员来说较轻，这可能部分因为其他人负责调查彝族和疑似彝族支系的群体。但是他的经历显示出，识别小组的任务分配旨在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人手，也体现出识别小组在差旅、食宿和安排访谈对象方面有多么依赖于政府。

事实表明，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广泛帮助，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一一识别 1953 至 1954 年云南省普查登记的所有申报群体。<sup>1</sup> 见证政府影响力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识别计划中选择哪些申报群体作为调查对象。1954 年 5 月 20 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群杰对识别小组下达了三条简明扼要的指令，用以确定对哪些申报群体进行识别及其先后次序。这三条原则是：大群体先于小群体，内地群体先于边界群体，政治敏感群体（特别是彝、侏、沙、傣和土家）先于其他群体。<sup>2</sup> 对大群体以及彝、侏等在省内具有较大政治势力的群体进行识别，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但需要说明的是，内地民族先于边界民族接受调查，是因为后者分布在中国边界，这对于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的昆明和北京方面来说更具有进一步讨论的意义。<sup>3</sup> 然而事实表明，虽然政府认为边界群体具有极端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识别小组的领导认为若在当时进行调查将很难达到某种深度，只有等到新生的中国政府对边界地区实现更全面的政治控制以后再作讨论。<sup>4</sup>

遵照这些原则，识别小组粗略地挑选了 60 个申报群体作为田野调查阶段的对象。有趣的是，没有得到检验的并不仅仅是人口规模较小的申报群体，同样也有一些人口规模大的群体，官方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更多证实。因此在那些未被调查检验的群体中，很可能存在错误认定的情况。这种“先验民族”共有 14 个，即傣族、哈尼族、回族、卡瓦族（之后改名佉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民家族（之后改名白族）、纳西族、瑶族、彝族和藏族。<sup>5</sup> 各小组不会花费任何时间来验证这些群体的存在，但会确定其涵盖成分，即这个地区中的其他申报群体是否可能属于上述 14 个民族中的哪一个。<sup>6</sup> 因此这 14 个民族在识别计划具有核心地位，其他申报群体将被安置在这个基座之上。

在计划安排的田野调查阶段中，调查者们严格遵循这几条政治指示。第一阶段从 6 月 2 日到 7 月 21 日，小组调查了普查清单上每个符合三项优先原则的群体，他们是所有人口超过十万的群体、13 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群体（共 18 个，占 72%）、4 个人口在一千到一万之间的群体（共 20 个，占 20%），以及 1 个人口少于一千的群体（共 15 个，占 7%）。彝族、侏族、沙族、

<sup>1</sup> 通常认为有 260 个申报群体，但这是个错误。根据我对该时期普查登记的分析，普查人员记录了 212 个族称单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 260 个或更多 (Fei,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如果剩下的 50 多个群体真的被记录了下来，应该是被不严谨地归在了“其他民族”、“不明民族”或其他具有类似“混杂”标题的栏目里。因为这些族称单位没有被记录在案，这 50 个申报群体不可能申请识别小组的审核，也就不可能有得到官方认定的机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Z]，1954。

<sup>2</sup> 2003 年 1 月 23 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得到李群杰的佐证，《云南省少数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会上的报告》，12. 王晓义的称述仅在一个方面与档案资料不同，即王晓义背诵了四个高度优先群体（彝、侏、沙、傣），在李群杰 1954 年报告的手抄本和 1955 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还包括第五个群体即土家。中央民族学院，《云南土家族调查材料》[Z]，第 25-28 页。

<sup>3</sup> 例如 1952 年，傅懋勳带领的一组语言学家在云南开展了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当时云南省副主席张冲指示调查小组将重点放在边界少数民族上，以便提高这些群体的集体民族认同 (centralized ethnic identity) (用语言学集成的方法)，更好地抵抗云南边界外国势力的分而治之阴谋。参见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J]。

<sup>4</sup> 在分析 1953 至 1954 年的普查和选民登记时，也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模式，即政府希望深入了解边界的人口状况，但由于缺乏行政控制，无法在许多边界地区展开普查。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Z]，1954 年。

<sup>5</sup> 需要指出的是，1954 年识别小组的领导张冲是彝族，副队长李群杰是纳西族。参见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Z]，1955 年。

<sup>6</sup> 我要特别感谢 Steve Harrell 在此帮助我区分了民族存在和民族成分。

傣族、土家族都在第一阶段的考察范围中。小组在第二阶段改变了调查方式，将重点放在人口仅有几百或几千人的群体上，把他们打包成更大的群体。小组总共调查了5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群体、16个人口介于一千到一万之间的群体（共20个，占80%）、14个人口少于一千的群体（共15个，占93%）。<sup>1</sup>而在1953至1954年人口普查中出现的另外一百多个族称单位，则因人口太少而被调查计划简单地略过。至于其他民族，官方认为可以日后再作讨论，但没有给出确切的期限。<sup>2</sup>

最后，识别小组使用的访谈方法也体现了国家和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识别小组关注了一个中国民族学家以前从未在意的问题，即那些被识别的人群是否认可对他们的认定结果，如果不认可，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产生这样的认同。这样一来，与20世纪上半叶那些描述既存族群的民族学家不同，识别小组开始采用一种开放式的干涉手段，既描述现实存在的族群，也描述潜在的族群。那些“现实存在”的族群包括藏族、彝族等14个无需检验的群体。至于其他群体，调查者有权决定用哪些“可能的”分类方法对他们进行定位或归类，中国政府则可以在民族识别计划结束之后通过一系列被称为“民族工作”的调整方案使之成为现实。<sup>3</sup>换句话说，政府就像是社会的工程执行者，而识别调查员则是社会的规划建筑师。

以1954年接受调查的土老族为例，可以反映出识别小组的工作目标和方法。调查者在报告中写到：“‘土老’族是壮族的一个支系，但土老语已经演变成了壮语中的一个独立方言。我们最好将它合并到壮族中，但……这需要一定的酝酿和收复工作。”<sup>4</sup>为此调查者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访谈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被中国民族学和语言学发现的民族。识别小组将土老族和其他（a）拟定归入壮族、（b）在词汇和语法上共享大量语言学特征的特定申报群体的成员聚集在一个屋子里进行访谈。<sup>5</sup>调查者事先就知道，在理论上这些群体应该能够相互沟通，在访谈中则鼓励他们互动，以期通过随意的谈话来激发受访者对同屋中“他群”的自我认同。在诱导出这样一些认识之后，识别小组就会提出类别合并的建议。如果时机合适，屋内的受访者会同意这些合并建议，这使小组的预期有了可行性。此时识别小组就获得了他们所需的双重条件：他们的分类提案既有客观材料的支持，又博得了被识别群体自身的主观认同。

这种实验方法在土老族的案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识别工作中推广开来。土老族代表公开证实了这种访谈法的变革力量，一些受访者宣称直到他们接受访谈时才“认识到”自己与当地其他群体的同胞关系。<sup>6</sup>一位土老族代表的话被记录了下来：“要不是因为毛主席，我们（参加访谈的群体）从来都不会在一起，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大家是同种同根的。”<sup>7</sup>这样的证词进入到识别报告中，为这些群体的类别合并提供了主观支持，并与语言、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客观材料结合了起来。

在其他案例中，这种访谈法没有达到启发受访者的目的。这也许是因为有些非汉族代表无法像调查者想象的那样相互理解，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像1954年的识别小组那样把共同语言和共同身份等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者加强了干涉力度，直接向受访者解释（甚至宣讲）他们语言中的相似之处以及语言和族属的关联。<sup>8</sup>以咪哩族为例，识别报告称：“最初，参加访谈的咪哩族代表相信他们与‘腊鲁’、‘密岔’和‘蒙化’是不同的。”但是“通过对比他们的语言、

<sup>1</sup> 确切日期参考王晓义的调查行程表，来自2003年1月3日和27日对王晓义的访谈。在识别计划中王晓义保留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详细的日记，在我们的口述历史回顾中他为我讲述了自己的日记。

<sup>2</sup> 1960年的一些研究试图解决这些被搁置下来的问题。更多关于1960年识别计划的内容参见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sup>3</sup>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sup>4</sup> “酝酿”一词明显具有“潜在”和“实现”的含义。

<sup>5</sup>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6</sup>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

<sup>7</sup>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土老族识别小结》[Z]，1954年

<sup>8</sup> 2003年1月27日对施联朱的访谈。

服饰、住屋、习俗等”，调查者使咪哩族代表相信自己与上述三个群体是一样的。根据记录，当时出席的咪哩族代表张正云最终让步了，承认：“我想我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组成部分。”<sup>1</sup>

这类访谈工作为 1954 年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奠定了基石，并且反映出识别计划具有强烈而且公开的政治色彩。但是必须记住，这些访谈的目标始终是使受访者接受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民族分类体系，而这些分类体系是在识别计划开始之前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是在政治性如此明显的领域，社会科学家也明显占有核心重要地位。

## 尾声

在 1954 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行将进入尾声之时，识别小组在最初的申报群体中只认定了阿昌族、布朗族、怒族和西番族 4 个单一民族。其他群体则被合并到上述某个先验民族中，或被重新识别为在邻省广西已经得到官方认定的壮族（见表 2）。

表 2：1954 年云南省民族识别调查小组的分类提案

申报群体	识别结果
阿昌	阿昌
白朗	布朗
黑浦	傣
蔗民	汉
哈尼、豪尼、碧约、卡都、干纽、阿木	哈尼
卡都	哈尼
拉乌	哈尼
糯比	哈尼
梭比	哈尼
苦聪	哈尼
本人	卡瓦
勒墨（那马）	民家
怒、佻	怒
西蕃	西蕃
西番	西蕃
阿车	彝
阿西	彝
阿札（普）	彝
颇罗（普）	彝
泼哇（普）	彝
车苏	彝
腊鲁	彝
茛菘	彝
黎明	彝
六得	彝
倮	彝
罗武	彝
罗武	彝
蒙化	彝
蒙化	彝
密岔	彝
咪哩	彝
母机（普）	彝
纳渣	彝

<sup>1</sup>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新平县咪哩族调查》[Z]，1954 年，第 100 页。

泼拉培（普）	彝
普（阿杂、普拉）	彝
撒尼	彝
散民	彝
山苏	彝
水田	彝
水彝	彝
他谷	彝
他鲁	彝
土	彝
土家	彝
土家	彝
土家（包括蒙自）	彝
土家	彝
图拉帕（普）	彝
支里	彝
白君	彝
子彝	彝
昨柯（普）	彝
黑衣	壮
隆安	壮
依	壮
沙	壮
天保	壮
土老	壮

根据这一新的人口模型，云南省内只有 19 个民族，即阿昌族、布朗族、傣族、哈尼族、回族、景颇族、卡瓦族（之后改名佉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民家族（之后改名白族）、蒙古族、纳西族、怒族、西番族（之后改名普米族）、瑶族、彝族、藏族和壮族。若将镜头切换到当下，这一版图基本没有改变。这 19 个群体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之后又添加了 6 个，包括 1959 年识别出的崩龙族（之后改名德昂族），<sup>1</sup>1964 年识别出的佤族（之后改名独龙族），<sup>2</sup>1979 年识别出的基诺族、最初在贵州被识别出来并且随后在云南得到认定的布依族、识别过程与布依族相似的水族，以及散布全省、已经无需验证的满族。这 25 个民族几乎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民族的一半。

#### 参考文献：

- [1] Arid, John, S. *The Siz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 [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 [3] Bradley, David.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Yi’, In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ed. Stevan Harrell. 214-2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4] Brown, Melissa, J.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e: The Case of the Tujia in Hubei, China’ . *Asian Ethnicity* 2001 (vol. 2 no. 1) . 55-72.
- [5] Davies, Henry R. *Yü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sup>1</sup> 张峰奇，《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Z]. 第 10 页。

<sup>2</sup> 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M]. 第 150 页。

- [6] Dreyer, June.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8] Fei Xiaoto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 [9] Gladney, Dru.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0] Guldin, Gregory.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ao*.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 [11] Harrell, Stevan, ed.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12] Herberer, Thomas. 'Nationalities, Conflict and Ethnic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Yi in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ed.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13] Kaup, Katherine, P.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 [12] Litzinger, Ralph.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3] Liu, Xiaoyuan.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y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6] Mackerras, Coli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17] Mullaney, Thomas S. "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 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and its Foundations in Republican-Era Taxonomic Thought", *China Information*, 2004 (18) 207-241.
- [18] Mullaney, Thomas 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19] 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0]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1] Tapp, Nicholas. 'In Defense of the Archa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1950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2002 (3) 63-84.
- [22] 'Shangcong Yunnan zheng shaoshu minzu shibie yanjiuzu diaocha jihua', 22-33, 1954. Yunnan Provincial Archives, 1954.
- [23] 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草案的说明 (1953年2月11日), 《民族政策文选》,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
- [24] 丁文江, 《爨文丛刻》, 上海: 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1935.
- [25] 福祺, 《方国瑜传》,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26] 费孝通, "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季刊》6 (1957): 9-31.
- [27] 黄光学, 《中国的民族识别》,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 [28]李群杰,《云南省少数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会上的报告》,11-15. 云南省档案,索引 2152,目录 3,文件 3,1954.
- [29]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地理学报》1936 (vol. 3 no. 3) . 533-548.
- [30]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中国语文》1954. 21-26.
- [31]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季刊》1936 (1) .
- [32]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大理文化》1992 (1) .
- [33]研究室,《云南省少数民族支系系属研究概况和存在问题》,26-38. 云南省档案,1954.
- [34]《1953-1954 永胜县选民登记/普查》,1954. 云南省档案,1954.
- [35]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 5. 昆明: 云南省档案 索引 2152 • 目录 3 • 文件 3, 1951.
- [36]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昆明: 云南省档案 索引 2152 • 目录 3 • 文件 4, 1953.
- [37]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选委会材料), 1-167. 昆明: 云南省档案 索引 2152 • 目录 1 • 文件 48, 1954.
- [38]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土老”族识别小结》,21-26. 云南省档案,1954.
- [39]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新平县“咪哩”族调查》, 86-100. 云南省档案,1954.
- [40]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富宁“黑衣”族社会情况调查》,123-131. 云南省档案,1954.
- [41]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初步总结》,昆明: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1954.
- [42]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Z]. 昆明: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
- [43]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选委会材料),云南省档案,1954.
- [44]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初稿),云南省档案,1954.
- [45]张峰奇,《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昆明: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1960.
- [46]中央民族学院,《云南土家族调查材料》,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1955.

## 【论 文】

# 中苏关系中的“东突”问题（1944-1945）<sup>1</sup>

Erkin Ekrem<sup>2</sup>

**摘 要：**1943年苏联在新疆势力被驱除的同时，莫斯科利用新疆民众民族独立之愿望又制订了重返新疆的秘密计划。在苏联的协助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于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宣布成立，因而苏联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在新疆的影响力。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约过程中“东突”问题作为一个制衡筹码，苏联迫使国民党政府为保满洲（中国东北）、旅大二港和新疆的权益作出了割让外蒙古的决议。而当苏联政府获得在中国的利益、恢复1904-1905年前日占领土以及对日宣战而拥有了在该地区的部分主导权以后，逐渐改变过去不支持中共之政策，开始培养中共在中国的势力。实际上，苏联对中国政策中的“东突”筹码已开始转变为“中共”筹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完成为其规划的历史使命。因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面临改变国家地位和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境地。而国民党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也受苏联之助，方获成功。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展现了其不可忽视的主导性作用，因此，苏联在新疆事务中再一次巩固了其影响力。本文通过探讨苏联策划新疆独立的原因、策略之演变以及达成的后果，讨论在国际政治变化之背景下莫斯科如何利用“东突”问题，获取其在中国的战略利益以及中国的策略性响应。

**关键词：**中苏关系、东突厥斯坦、新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民政府

## 一、重返新疆：苏联扶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自1944年春原新疆督办盛世才（1897-1970）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新疆以后<sup>3</sup>，苏联即实行报复行动。据罗志刚的分析，苏联在新疆惨淡经营20余年之久，其在这里的巨大权益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自然于心不甘；同时，盛蒋不恋苏联过去在其危难之际给予其重大援助之旧情，趁人之危，驱除苏联的做法，也难免激起苏联的愤恨。这种利益因素和怨恨心理结合在一起，驱使苏联在撤退新疆之际即进行报复、破坏蒋、盛在新疆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sup>4</sup>。因此，苏联方面大幅度缩减新苏贸易额，迅速撤出了它在新疆的全部经济项目。苏联的这种做法，使长期倚赖于苏联的新疆经济陷入混乱，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困苦，给蒋、盛在新疆的统治顿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上的混乱给苏联撤退后就开始回潮的少数民族叛乱火上浇油。此时，在新疆失去地位的苏联一改以前和汉人一起镇压少数民族叛乱的方针，转而支持回教徒的反对汉人的运动<sup>5</sup>。

### （一）苏联报复中国政府

苏联在1943年4月初做出完全撤离新疆之决议，恐怕苏联同时也拟定了新的新疆政策；因此方有1942年10月以来莫斯科不愿撤出在新疆的苏联势力，6个月后则以果毅的态度声明完全撤离

<sup>1</sup> 本文刊载于 台湾中央大学 历史研究所 《两岸发展史研究》第六期 第109-213页。

<sup>2</sup> 作者为土耳其 Hacettepe 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sup>3</sup>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and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43-254;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65-174.

<sup>4</sup>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39。

<sup>5</sup> 欧阳云梓，“1942-1943年国民政府的新疆战略述评”，《中州学刊》，总期129（2002年5月），页94。

新疆等政策变化过程。1943年5月4日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针对盛世才背叛行为以及新疆局势召开了评议会议。会议决定对盛世才的行为应采取反制措施，取缔盛氏政权。并且开设有关专业学校培养当地民族人士，帮助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当地加强民族解放的宣传活动<sup>1</sup>。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S. Panyushkin, 1905-1974）即于6月16日致中国外交部节略，指摘盛世才对苏措施为非法与仇视行为，并附1940年12月盛世才与苏联所订之密约<sup>2</sup>。莫斯科已启动颠覆盛世才政府之策略。据1943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1897-?）密呈外交部电函，喀什区警察局截获苏联在当地发展的间谍，并拿获宣传小册；“其内容纯系诋毁本省当局，并挑拨各族仇视汉族感情，从事反对我现政府。”<sup>3</sup>24日吴泽湘又密呈函外交部，“查本省自上年盛督办表示接受中央政令以后，驻新苏方人员对本省当局表示不满，认为省方业已改变政策，从事反苏，对于本省措施，因也恒有微词……是知苏方正在本省策动阴谋”。并请示中央应采取何种方针<sup>4</sup>。8月24日吴泽湘又密呈外交部，在喀什噶尔、塔城、和阗、阿山等地发现苏联间谍鼓动民变，因此指出“是知苏方必已派动大批间谍在本省各地活动”。<sup>5</sup>至9月16日外交部长宋子文（1894-1971）就此密呈蒋介石（1887-1975）之解决苏联策动新疆动乱之策，以为暂缓抗议。因为“现值苏方撤退迪化飞机制造厂、独山子（Maytagh）油矿员工机件及苏联第八团之际，若此时将本案遽行提出谈判，预料苏方将设词否认卸责，甚或反增中苏双方之嫌隙”。<sup>6</sup>蒋介石以为暂缓抗议，待日后再议<sup>7</sup>。随着苏联在新疆积极分发宣传小册之政治活动<sup>8</sup>，10月苏联也加强了边防军力，时常在苏方境内鸣枪演习<sup>9</sup>。10月6日，蒋介石核准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1903-1984）拟呈，认为“鉴于目前苏联正在该省撤退第八团及迪化飞机制造厂、独山子油矿员工等情势，暂缓向苏抗议一节，所见甚当”。<sup>10</sup>据吴泽湘10月24日的报告，“最近伊宁市上发现便衣苏民众，身藏手枪，三五成群，到处活动，苏领事馆确实亦有鼓动维、哈各族从事暴动之企图”。<sup>11</sup>另据吴泽湘10月27日的报告，苏方在疆的活动有（1）越界抢劫人畜；（2）在边境擅自鸣枪；（3）苏飞机越界巡查；（4）增强边防武力。苏联在疆的特务活动则有（1）散发宣传小册；（2）制造机会引诱中国民众；（3）领事馆人员积极外出活动；（4）企图鼓动各族暴动；（5）引诱中

<sup>1</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1941-1949 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 22. *Монография.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стр. 71-72, 75.* 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贝利亚专档》(ГАРФ. Ф. Р-9401. Оп. 2. Д. 149. Л. 167-176)之资料,1946年8月6日苏共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内政部长库鲁格洛夫(Sergei Nikiforovich Kruglov, 1907-1977)、国家安全理事会主席阿巴库莫夫(Viktor Semyonovich Abakumov, 1894-1954)等联合呈送斯大林之报告,确认1943年5月4日苏共中央有关新疆问题决议业已获得圆满成功,请求苏共中央奖励内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人士。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5.

<sup>2</sup>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页244。

<sup>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台北:外交部,2001年),页194。

<sup>4</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195。

<sup>5</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0。

<sup>6</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4。10月6日蒋介石核准该项事由,10月12日外交部训令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暂缓向苏联提出抗议。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7。

<sup>7</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3-204。

<sup>8</sup> 1943年9月在喀什噶尔、迪化、和阗等地区时常可见印制精美的《为民族的复兴前进》之宣传册子,其各处宣传小册之内容略异,但其要求略同:(1)在新疆成立民族参政会;(2)消灭独裁制度;(3)建立维、哈、柯、蒙等族的军队;(4)释放被押头目及宗教首领;(5)从速停止由中国内地移民;(6)限制国税,准许货物自由流通;(7)制定新疆人民与苏联自由贸易法规等事项。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8。《为民族的复兴前进》之宣传册子全文见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4-207。

<sup>9</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1-215。

<sup>10</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7。

<sup>1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9。

民子弟潜逃苏联。与此同时，苏方也不时提出新省警察敌视苏联民众事件。吴泽湘分析，苏方所有之作为，“或为日后在边境或省境内发动更大纠纷先占地步，亦未可知”。<sup>1</sup>

11月3日蒋介石接到西北长官朱绍良（1891-1963）的报告，苏联正在组织其境内柯尔克孜族军团，欲侵新疆<sup>2</sup>。但国民党高层对此消息有怀疑，以为“此类情报出自女流，此多揣测”；或以为“就国际形势而言，苏联此时似不至在新疆有何行动”。<sup>3</sup>外交部长宋子文虽同意以上观点，但也指出，“惟自新省情形变迁后，苏方自不甘心，难保其绝无暗中派遣武装柯族，携械潜入新边，冒充新省柯族，诱同当地不逞之徒，从事反动之企图”。<sup>4</sup>11月26日外交部从驻塔什干冯代领事处获悉，已入苏籍之新疆归化族前伊宁（伊犁）实业公司总经理格尔彬克（Kripink）及前伊宁归化团团团长波里诺夫（A. Polinov/Ivan J. Polinov）等分别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造谣，“谓承化、塔城均已失陷，来年伊宁、喀什各地均将划与苏方管理，并有武装部队入境”。<sup>5</sup>此二人尤以波里诺夫在1944年11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之初任副主席，格尔彬克则在共和国建立之初任财政部长<sup>6</sup>，其言语由来或非虚词。1944年3月4日一份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信函中称：“据报苏联在新省使馆虽于去年撤销，但暗中活动仍力，有唆使新省哈民举行阿山暴动之势。最近派大批工作人员于新省策动各宗族仇杀汉人，并发给枪弹甚多”。<sup>7</sup>各种传言的流行，预示苏联在新疆将会有一番作为。

莫斯科利用政治宣传鼓动新疆民众反抗新疆政府若始于1943年5月，而苏联利用苏联境内和当地民众武装打击新疆政、军的行动盖始于1944年初。1944年初，苏共中央要求驻新疆各苏联领馆提供苏联支持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之前景分析报告。各报告陆续呈报苏共中央，其中苏联驻喀什领事Shesterikov之有关南疆前景报告认为，政治迫害与民族压迫造成新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问题，反抗盛世才政权，建立本民族政权的意识已逐渐增强。但是，没有境外的支持殊难成功。当地民众无反苏倾向，亲近美、英，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因此，新疆的革命运动无宗教势力的支持，也很难获得成功<sup>8</sup>。苏联驻新疆各地领馆报告中多称，新疆革命运动的条件业已成熟。而且，新疆精英多在苏联受过教育，部分精英在苏联受教育和生活中已加入苏联共产党，构成革命运动的主力部分<sup>9</sup>。但是，驻喀什领事Shesterikov分析道，在南疆鼓励民族解放运动有许多困难，缺乏相关的物质条件和一统当地民族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sup>10</sup>。而据北疆之苏联领事馆的报告，相对南疆，北疆具有一定的物质和人员基础<sup>11</sup>。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苏联高层在新疆发动“民族解放运动”之策略都是建构在此类报告之上的。

1944年3月2日苏联飞机越境新疆青河县会河口，协助哈萨克暴动领袖奥斯曼（Osman Islam, 1899-1951）抗击省军。3月9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因苏联飞机轰炸阿山中国军队一事，

<sup>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09-210。苏联在与新疆交界处的活动，详见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1-215。

<sup>2</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6。

<sup>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7。

<sup>4</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8。

<sup>5</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1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页6257。

<sup>6</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32、6535。

<sup>7</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23。

<sup>8</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АВП 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итаю. Оп. 32-а. П. 299. Д. 11. Л. 1-18），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5-76。

<sup>9</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8。

<sup>10</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АВП 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итаю. Оп. 32-а. П. 299. Д. 11. Л. 17），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7。

<sup>11</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АВП 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итаю. Оп. 35. П. 237. Д. 14. Л. 1-13; Оп 32-а. П. 299. Д. 9. Л. 9-11），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7-78。

向苏联驻迪化领事普式庚（Georgi M. Pushkin）提出抗议<sup>1</sup>。3月11日驻新疆省军在距外蒙古约70公里承化与奇台之间进剿暴动的哈萨克牧民，但外蒙接济该暴动民众，并且追击哈萨克人的省军遭到由外蒙古方向飞来之带有苏联军机标志飞机的轰炸与扫射。3月12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函中以及13日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时，皆质询苏联飞机入境攻击一事。对此，苏方声称与己无关，容报莫斯科后再作答复<sup>2</sup>。14日，苏联领事普式庚拒绝吴泽湘于3月9日之抗议<sup>3</sup>。自3月11日至3月22日该标志飞机或侦查或轰炸省军，省军败退。实际上双方之间已发生了边界冲突。中国方面认定这是苏联的阴谋，即一方面在压迫新省当局就范，一方面在策应延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sup>4</sup>。同时，蒋介石认为苏联军机轰炸新疆，将为国军正式进驻新疆，收复主权之良机<sup>5</sup>。

美国方面当初对此事件的观察和分析与中国方面相似。如3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 1887-1960）致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 1871-1955）电中就有关蒙古来机攻击一事解释道，事件发展到苏联飞机蓄意攻击新疆部队，也只是苏联意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对他现在不欢迎的盛世才发泄不满，只要盛世才在任，就仍有可能再发生这种边境事件<sup>6</sup>。3月17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告知苏联军机轰炸，表示“此实不能视为地方事件，而为苏联目前即将来远东政策一极重要之征兆”。<sup>7</sup>而且以为苏联与日本可能达成某项谅解。3月22日罗斯福回电指出，苏日达成谅解“似非完全可信”。<sup>8</sup>中方在此次新疆事件中未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而苏联方面的响应也较以前强硬。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答复中国政府的质询时称：“新疆军队追缉哈萨克人民，有侵入外蒙领土之情事。苏联政府依据1936年3月12日与蒙古所订之互助条约不得不予外蒙以一切援助及支持”。对此，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严重回复<sup>9</sup>。即便如此，为了缓解当前紧张局势，蒋介石可能有改善中苏间外交关系的意图。3月21日，蒋介石在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1896-1965）的有关报告上批示“尚望努力促进中苏关系之亲密为盼”<sup>10</sup>。

随着事件的发展，美国对事件的认知也渐与中国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4月3日向国务卿发电称，美国驻迪化领事史密斯（Horace H. Smith, 1905-1976）认为，进行攻击的动机是出于新疆军队实际或幻想蚕食外蒙古领土，而引起这一事件则可能是由于中国侦查兵想试探外蒙古的反应。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则把该事件解释为，苏联想试探重庆和新疆军事合作的程度，以期有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为延安共产党和苏俄开辟一条经由新疆、宁夏向陕西的走廊<sup>11</sup>。据美国驻苏大

<sup>1</sup>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 273。

<sup>2</sup>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页 457-458、458-459；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 494-495。

<sup>3</sup>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 273。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297。据唐纵3月14日日记，“此事显系苏方有计划之行动，使盛在新无法立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简称《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 416。

<sup>5</sup>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 274。

<sup>6</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以下简称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762.

<sup>7</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 164。

<sup>8</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 165。

<sup>9</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297。

<sup>10</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03。

<sup>11</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766. 中文数据中时常将“苏联”与“苏俄”混用，当有区别。俄国自“十月革命”（公历1917年11月7日）之后，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其英文为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其俄文为 *Rossiyskaya Sovetskaya Federativnaya Sotsialisticheskaya Respublika*。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其英文为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其俄文为 *Soyuz Sovetsk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СССР)。文中“苏俄”多从引文之主人。

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 1891-1986）于4月3日致国务卿赫尔电中转引4月2日莫斯科各报发表塔斯社乌兰巴托消息，去年（1943）年末新疆地方当局强迫阿尔泰地区的大部分哈萨克居民迁移到新疆南部各县。很多哈萨克家庭不愿迁移，为逃避新疆军事当局的迫害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避难，蒙古当局将其作为难民收容。从新疆东北部来的中国军队，为追逐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萨克人，并以飞机扫射这些难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居民点。蒙古政府对此次侵犯边境事件作出反应，对新疆入侵部队进行了抵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人士确信，如果今后再发生新疆部队侵犯边境事件，苏联政府将根据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36年3月12日订立互助协议向其提供援助，以保障该共和国领土的安全<sup>1</sup>。4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中也有相似的信息和看法<sup>2</sup>。因此，高思4月4日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中建议：“我们坚决认为，美国政府不应以任何方式干预涉及苏联政府的事件”。<sup>3</sup>至此，美国对中苏冲突的政策和立场也趋于明显。4月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告以苏联军机又一次轰炸中国驻新疆部队以及与苏方交涉过程及内容；强调“此事之发展，显示苏联对远东之政策，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战局”。并且“认此为极严重之事，正在研究应采取之步骤”。<sup>4</sup>罗斯福在4月8日回复蒋介石的信函中也建议双方避免冲突，保证对日战争的胜利。信中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sup>5</sup>，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sup>6</sup>。4月10日再去函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提醒中国禁止再扩大反苏宣传。再次建议，“将此目前事件予以搁置，以待此次战争之结束”。<sup>7</sup>显然，罗斯福并没有分担蒋介石对苏联的隐忧，而罗斯福更多地在考虑如何使苏联参与对日战争。从美国对阿尔泰边境冲突事件和对蒋介石的申诉所表现出的反应可知，美方并未满足中方的意图，相反，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一直寻求机会劝告中国政府，避免冲突，加强合作<sup>8</sup>。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于4月21日致国务卿赫尔报告中，亦提醒美国政府避免卷入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sup>9</sup>。其结果，苏联势力自撤离新疆后转而鼓励当地民众反抗新疆政府的行动获得了初步的成果。

盛世才于4月28日呈蒋介石的报告中称，苏方策动哈萨克人叛变以及苏蒙军队入侵新疆，其“使用自动火器及指挥哈匪作战之指挥官，均系苏联与外蒙人”。<sup>10</sup>而且新疆本地也发现苏方组织的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盛世才也称已有破获。对此，盛世才提出两点对策：“系采取积极肃清内部之反动分子，特别是加快肃清游击队秘密组织及共产党秘密组织；同时，并极力把握各宗族头目、阿訇以及有声望者，以减弱苏方活动力量，加强各宗族对国家民族观念”。<sup>11</sup>由此可知，苏联不但军事侵扰新疆，而且也鼓动地方反盛世才势力达到其颠覆盛氏政权之目的。根据国民政府驻阿拉木图领事馆的报告，在4月之间苏联将13人秘密派往新疆，“专以行刺为目的”

<sup>1</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767.

<sup>2</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768-769. 另外，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6月访问新疆后的总结报告也称：「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早春在新疆与外蒙古边界发生的纠纷，是由于中国方面企图使逃入外蒙境内的哈萨克牧民返回新疆，并派军队追赶，这些军队又被蒙古人赶了回来，从而造成的。苏联驻外蒙公使说，蒙古飞机轰炸了新疆几处地方，以报复中国对外蒙的轰炸。他对于现在的局面似乎并不关心。」 See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240.

<sup>3</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769.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166-167。

<sup>5</sup>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8年），页206-208。

<sup>6</sup>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页206-208。

<sup>7</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773, 785, 798, 800-803;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167。

<sup>8</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167-174。

<sup>9</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776-777; 有关美国对苏联政策之变化，See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p. 99-200. 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接受美国调解的原因是：一是为了适应国内政治上的反共需要；二是出于关于战后世界政治的某些考虑。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页266-269。

<sup>10</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461。

<sup>1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462。

<sup>1</sup>。据中国驻安集延领事馆于1944年6月10日密呈外交部之所获情报称：“苏方近曾拟遣派大批俄人以及曾受苏方训练之新疆维吾尔族人多名暗入该省，从事活动”。<sup>2</sup> 该情报并附有苏方密遣新疆之23人的名单<sup>3</sup>。

当初，蒋介石担心苏联重新染指新疆，对苏态度十分强硬，而在新疆开始出现具有苏联背景的动荡事件以后，盛世才多有不安。3月15日蒋介石曾致电盛世才，要求其“前方部队应沉着防守，后方应积极增援”<sup>4</sup>为原则，并保证“无论其演变如何，中央必负责主持”。<sup>5</sup> 3月19日又指示朱绍良积极备战，“即飞迪化坐镇策划为要”<sup>6</sup>，已摆开不惜与苏联支持的苏蒙军队一战的架势。至美国了解事件真相以及做出旨在缓解双方冲突之政策后，中国方面似乎同意冻结苏联飞机和外蒙古军队侵入新疆造成的危机<sup>7</sup>。中国开始寻求处理该事件的办法。4月11日，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1891-1981）等政要就新疆问题进行了专门会商，探讨中苏关系现状。会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1890-1969）数言主张对苏要忍耐。王世杰则谓不但要忍耐，还要积极设法恢复友好感情，否则，“中苏关系如不能善化，势必恶化也”。<sup>8</sup>据《王世杰日记》，蒋介石同意以上建议，指示提出有关方案，并训示对目前新疆所发生的事件保持忍耐<sup>9</sup>。而国民政府正在考虑改善中苏关系之际，4月12日苏联在迪化策动了一场未成功的暴动<sup>10</sup>。之后，王世杰于4月17日提出的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建议。该建议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其次，在5月份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十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再次，恢复中苏之间感情。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这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sup>11</sup>。王世杰奉蒋介石的旨意，于4月25日会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反苏的意向，中苏关系“较前疏冷”<sup>12</sup>，是由于苏联未能坦白谈论对日中立问题而使中国舆论产生了某种“误会”。对于潘友新特别提到的新疆问题，王世杰解释说，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盛世才掌握着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新疆问题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然而，盛世才最终将被撤换，潘友新对此表示满意<sup>13</sup>。然而盛世才仍然报告苏蒙与新疆之冲突，并询问是否向苏方正式提出抗议<sup>14</sup>。5月5日又有两次苏机入侵新疆之事，而国民政府对“苏蒙军越境助匪及苏机侵新案，今宜采对苏暂隐忍及大力搜证，并积极剿灭叛匪之策”。<sup>15</sup>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多次催促蒋介石履行解除盛世才在新疆职务的承诺。自此以后中苏关系似有好转。驻苏大使傅秉常于6月1日呈蒋介石报告中谈及在莫斯科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讨论中苏关系。潘友新以为，苏联一直对中国友好，这种关系应得到强化。潘友新也表示，借此次回国机会将积极促进中苏友善关系<sup>16</sup>。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2。

<sup>2</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38。

<sup>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39-240。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0。

<sup>5</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0。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1。

<sup>7</sup> 据唐纵 4 月 3 日日记所载：“昨日苏联塔斯通讯社发表消息，谓新疆对外蒙实施轰炸，苏联有对外蒙援助之义务。此消息答复我对苏之抗议，显然有扩大事态之趋势。自此新苏问题发生后，吾知中苏交恐无澄清之望。观苏联最近之态度，情势至为显然”。唐纵，《唐纵日记》，页 420。当时大约国民党上层都有同感。

<sup>8</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页 289。

<sup>9</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289。唐纵曾与蒋经国谈论过中苏问题。据唐纵 4 月 12 日日记所载，蒋经国告诉唐纵，“苏联对中国之问题，不是中共与国民党问题，而是中国在战后是否与苏联一致。如果战后中国参加反苏阵线，苏联不愿意的。中国想打开对苏外交，除非保证中国不致反苏”。唐纵，《唐纵日记》，页 423。

<sup>10</sup>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 277。

<sup>11</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291-292。据唐纵 3 月 29 日日记，“军令部已见仍应与苏联保持友谊，不可因小失大，应设法调整人事，盛须调离新省，另派他职。所见与我完全相同”。唐纵，《唐纵日记》，页 419。

<sup>12</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297。

<sup>13</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297。

<sup>14</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30。

<sup>15</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36。

<sup>1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05。

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1944年4月22日，为在中国的第十四航空队运送美国补充物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 1890-1986）要求苏联政府同意美国派遣一个大型卡车运输队，经由苏联突厥斯坦入境新疆。美国并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正面答复，以为这种可能性甚微，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苏联的行为一向很差<sup>1</sup>。直到1944年秋苏联方面终于同意运送车队经由中亚经新疆至中国。但是，此时伊宁事件爆发，也因大规模的动乱而无法实行<sup>2</sup>。华盛顿认识到重庆政府的整体苏联政策应有所改变。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指示驻华大使高思向中国官员指出：“中国目前之反苏宣传，与联合国倡导之友好关系，实不相宜”。<sup>3</sup>因此敦促“中国采取措施，俾与苏俄存更密切之谅解与合作之关系”。<sup>4</sup>同时指示高思向中国方面表示美方对中苏关系的看法：（1）新疆和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这样对待这一问题；（2）最好是承认既成的实际状况，即外蒙自治这一事实。如果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这一地区，苏联完全可能进行抗争；（3）美方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主要政权，美方并不关心中国的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4）美方希望中苏两国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同盟关系<sup>5</sup>。为此，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为调停中苏边界冲突和推动中苏接触奉命访华<sup>6</sup>。之前，6月11日王世杰曾为蒋介石拟就双方谈话要旨，其中对苏关系问题上表示有意接受美国总统的一切斡旋<sup>7</sup>。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6月16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sup>8</sup>。

据《王世杰日记》6月22至23日的记述，华莱士表示美国总统罗斯福最关心中苏关系的递增；如中共真以苏联为政治背景，国民政府宜尽早与苏联恳谈。蒋介石向其表示盼美国暗中给予帮助<sup>9</sup>。通过蒋介石和华莱士的会谈，中美两国在改善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正式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得出的共识称：“中国与壤地最近之伟大邻邦苏联之关系，必须维持于互相谅解之基础之上；即中国与其他邻国之关系亦复如是。任何均势之局面，决不能有助于和平之目的”。<sup>10</sup>对此，“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sup>11</sup>，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sup>12</sup>。6月24日

<sup>1</sup>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38-139. 美国援华军火物资，包括 500 辆卡车，美军 1,000 人，从波斯湾绕道中亚入境新疆。预定 1944 年 10 月 1 日自波斯湾启程，12 月 1 日到伊宁。这是苏联最不乐意见到的事。安宁，《新疆内幕》（出版地不详：创垦出版社，1952 年），页 169。

<sup>2</sup>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53.

<sup>3</sup>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页 225。

<sup>4</sup>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页 225。

<sup>5</sup> 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页 160-161；赫伯特·菲斯，“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页 124。

<sup>6</sup>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由阿拉斯加经苏联西伯利亚、中亚于 1944 年 6 月 18 日到达迪化，以了解新疆的局势。当华莱士到达迪化机场时，盛世才夫妇，蒋介石的代表王世杰，外交部参事郭斌佳，新疆监察使罗家伦，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吴泽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新疆督署参谋长汪鸿藻及美国大使馆参事、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美国领事、英国领事等到机场迎接，盛世才自然给予极周到隆重的接待。蒋介石与华莱士自 6 月 21 日晚间首次会谈开始，先后五次交换了意见。华莱士首先表示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看法：“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大林说起：苏联对国民政府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容纳共党力量共同抗战。斯大林并且明言，中国共产党无理论之立场，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且与苏联无甚关系。斯大林又表示：希望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之改善，但此仅为从中疏解，而非希望其居于仲裁地位”。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 年），页 145。

<sup>7</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29。

<sup>8</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32-333。

<sup>9</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39-342。王世杰虽然力主中苏邦交亲善，但实属无奈之举。1944 年 8 月 22 日王世杰致函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苏联对中国，诚令人闷闷，但我方做法似只有力求接近”。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页 873。

<sup>10</sup>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正中书局，1965 年），页 471。

<sup>11</sup>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550.

<sup>12</sup>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sup>1</sup>。实际上，王世杰心中的对苏之新疆政策也已拟妥，调整新疆政治和人事，制造中苏亲善的舆论<sup>2</sup>。

但苏联学者对华莱士访问新疆的目的有怀疑，以1944年华莱士在新疆旅行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美国特别关心把新疆作为反苏的根据地<sup>3</sup>。这个观点是否也代表当时苏联政府，殊难知其真相，但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表明苏联政府对中苏不满的态度：1943年3月，苏联依据〈苏蒙协议〉，以飞机轰炸扫射进剿叛逃之哈萨克人的中国部队，造成双方紧张关系，苏联要求中国赔偿其遗留在新疆的财产，并且以苛刻条件要求中国支付抗日初期援华之军火款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则公开声明中苏关系已完全恶化，苏联“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sup>4</sup>。面对这种发展趋势，美国一直为促进中苏关系而努力，但常以迁就莫斯科，以极力说服重庆政府为政策。1944年7月10日王世杰向蒋介石呈送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建议“在对苏交涉前，我方准备似应着重两事：其一为新疆政治情况及人事之调整。倘无此种调整，苏方之猜忌必难冰释，甚或发生新事故，使其他努力归于泡影；其二为以适当方式发动中苏亲善言论。关于此层，钧座似可指定三、四人密主其事，以期造成有系统有分际之舆论”。<sup>5</sup>7月14日，罗斯福又亲自致电蒋介石，美国愿意凭借自身丰富经验帮助中国政府改善与苏联以及中共的关系<sup>6</sup>。因此，中国一方面向莫斯科建议举行中苏高峰会议，一方面请美国“在中、苏间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并请罗斯福“居间设法促成中苏代表会议”。罗斯福针对这一建议表示“正在切实筹思”<sup>7</sup>。

就在中国有意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乐意从中帮助的一个时期，1944年7月12日发生当地武装分子围攻吉木乃（Jimunay）县政府的事件<sup>8</sup>，武装分子不支，逃往苏联境内。此后逐日有围攻吉木乃县府，而且有苏联士兵参与助战。15至16日交战最激烈，双方持续交火约10余小时，中国方面死4人伤5人，苏联边卡士兵伤者3人。其后武装分子焚烧县政府而远去<sup>9</sup>。重庆政府经多日研究终于8月21日提出交涉决定，9月1日方有蒋介石“即照所拟办理可也”的指示<sup>10</sup>。面对中-蒙冲突及阿尔泰地区哈萨克人的叛乱，中国外交部以为其背景有苏联，决非纯军事手段所能解决；因此拟定了三项策略以应变局：（1）改进对哈族之党政工作；（2）加强中苏外交关系；（3）极力恢复中央及边区地方长官与外蒙之联系<sup>11</sup>。但该策略多流于形式。8月初，塔城地区裕民县察汗鄂博地方有16家共60余名归化族，连同其牛马逃往苏联。新疆边防军李东福班长和李景山班长又被苏联军队掳走，其中李东福被杀<sup>12</sup>。中国外交部以及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1897-?）等多次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未得其结果<sup>13</sup>。8月7日至12日阿山哈巴河（Kaba，位于阿尔泰山南麓）

---

1944-1949, p. 550.

<sup>1</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38-343。

<sup>2</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52-354。

<sup>3</sup> 卡比察（M. C. Капица）着、赵承先、忻鼎明合译，《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页 106。

<sup>4</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页 140。

<sup>5</sup> 周宁选辑，“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呈呈”，《民国档案》，期 2（2006 年），页 52。

<sup>6</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485.

<sup>7</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 877。

<sup>8</sup> 今之吉木乃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边陲，隶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尔泰地区（Altay），位于准噶尔（Junghar）盆地北缘，萨吾尔山（阿尔泰山山脉之一）北麓，额尔齐斯（Irtish）河南岸，地理坐标为北纬 47°00'-47°59'，东经 85°33'-87°09'，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 141 公里，东与福海县（Burultokay，阿尔泰地区中部）毗邻，南与塔城地区（Talbagatai）的和布克赛尔（Hoboksar）蒙古自治县相连，北接哈巴（Kaba）河、布尔津（Burqin）两县。

<sup>9</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66-270。

<sup>10</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3。

<sup>1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0。

<sup>12</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2、244-245、248-249。

<sup>1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4-251。

县牧民共八千余人逃往苏联<sup>1</sup>。8月19日“苏方来三人持轻机枪向我绥定（今属霍尔果斯县）三道卡驻军袭击”<sup>2</sup>，9月13日驻苏大使傅秉常（1896-1965）遵令向苏方提出遣返叛逃苏联之新疆牧民的要求。而傅秉常得到的答复为：中国牧民自称，系因受新省当局宗教迫害而逃往苏联避难，目前已受哈萨克当局的庇护<sup>3</sup>。随后，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就有关中国边防兵被掳或杀事件进行了交涉，也无结果<sup>4</sup>。10月7日由哈萨克人组成的400余人武装进入伊犁，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鉴于此冲突，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提出需要苏军保护自身安全的要求<sup>5</sup>。10月9日外交部又接到由柯尔克孜和苏联军人组成的一支500余人武装力量袭击了莎车（Yarkent）专区之苏巴什（Subashi）与布伦口，企图占领该地后攻取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另28名匪军由英吉沙（Yenihisar）进行，企图截断莎车交通，匪兵均有新式武器，如连珠枪、轻机及手榴弹齐全，确经苏方陆军训练”。<sup>6</sup>10月12日外交部密电吴泽湘搜集苏方“助匪证据”<sup>7</sup>，10月18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1890-1987）接到有2,000苏联红军叛变之消息，有传言谓该叛军“与哈匪同谋，已在北疆扰乱，有劫夺伊宁之企图，并在杓特克司，东土耳其斯坦国际阴谋难测”。<sup>8</sup>此消息至11月3日和7日方得知仅为谣言而已<sup>9</sup>。同时在10月间，伊宁等地发现《我们为什么作斗争》宣传小册。特派员吴泽湘断言是驻伊宁之苏联领事馆在各处散发该传单。吴泽湘密呈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查该项反宣传小册译文之内容，重在挑拨破坏汉族与其他各族间之情感，并以在苏联生活自由快乐及幸福等，名为解放民族，实为鼓动各族暴动，扰乱本省各地治安；复查本省各地哈匪猖獗，正防不胜防之际，而且苏军助匪行为仍不停止，此项反宣传小册似属苏方引发，万一无知分子受其煽惑，对本省治安颇多影响，若不积极禁止，后患可虑”。<sup>10</sup>虽然外交部对新疆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出了一些改善当地政、经状况措施，以达到反宣传的目的<sup>11</sup>，但在当时的新疆以及重庆政府来看，思想意识和实施操作方面都不可能。中国官方正在调查苏联支持新疆各族暴动事实而寻求交涉办法时，11月7日“伊宁事变”爆发，11月12日已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

对新疆发生的具有苏联背景的所有事件，国民政府并没有认清其事态的严重性，仅以边界冲突和苏联报复盛世才作评判，不知苏联自1943年至1944年间逐步实施其阴谋之内情。美国方面对此看法与重庆政府略为相似，但比国民政府稍解苏联在新疆的战略目的。9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中国科职员蔡斯（Augustus S. Chase）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美国驻迪化领事史密斯经过分析所得意见为：苏联的意图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完全控制新疆；苏联所要实行的最终计划（在国际情势允许时）是想要把大部分新疆分配给外蒙古和其他拟议中的在苏联控制下的一些半自治州和苏联控制的甘肃走廊，以便确保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最近苏联的阴谋涉及到将新疆北部一块大如浙江省的土地纳入外蒙古；直到现在苏联未能实现他的意图，只是由于全神投入欧洲战争以及盛世才（1895-1970）坚决保持（即使在所谓的合作时期中）其反对苏联阴谋的秘密系统；苏联的阴谋

<sup>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3。

<sup>2</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3。

<sup>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9-250。

<sup>4</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50。

<sup>5</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5。

<sup>6</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5。

<sup>7</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5。

<sup>8</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5-277。

<sup>9</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77-278。

<sup>10</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51。该宣传小册哈萨克原文见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60-265。其中文译文见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51-254；英文译文见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0), pp. 200-205.

<sup>1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54-257。

和方法是无所不为，如不想使新疆在今后6到10个月中解体，就必须加紧行动（包括中国或其盟国甘心和苏联进行战争）。但是蔡斯怀疑史密斯的观点<sup>1</sup>。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也告诉华盛顿，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Donald M. Nelson, 1888-1959，美国军工生产署署长）和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 1883-1963）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sup>2</sup>。苏联为保证其计划在新疆得以实现，在国际上开创政治环境，以便掩饰其真实意图。

## （二）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

盛世才（1895-1970）政权在新疆实行暴政，激化了新疆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加之新苏关系破裂后，双方进出口贸易关系中断，造成省区生产下降，物品奇缺，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现象。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使得各种矛盾浮出表面，人民迫于压力，铤而走险，暴动一触即发，从而为苏联在新疆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基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1944年6月访问新疆时也有类似的观察：“我们访问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省省会迪化。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阀。政府是个人统治的，通过警察的彻底监视而实行统治。90%的人口不是汉族，大部分是维吾尔族‘突厥人’。汉人和非汉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几乎无从证明政府有能力对此问题作有效的处理。盛将军两年前亲苏联而现在反苏联，以致在新疆的苏联总领事和苏联公民的生活极为困难”。<sup>3</sup>

盛世才不但在新疆由于残酷统治以及贪污造成当地民众的愤懑<sup>4</sup>，而且美、苏也对盛世才的反苏政策表示不满，担心盛世才的行为会影响到盟国对日协同作战的计划。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于6月20日到达重庆时，曾向蒋介石建议改善中苏关系，并指出盛世才是中苏关系改善的一大障碍<sup>5</sup>。王世杰曾于1944年4月17日为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而为蒋介石提出一项建议：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另委他职。4月19日获得蒋介石批准后，4月25日王世杰会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告诉他中央有关决议的大意，即盛世才最终将被撤换，潘友新对此表示满意<sup>6</sup>。该苏联大使一直表示希望国民政府将盛世才从新疆除去，因为苏联感到不可能同盛世才共事<sup>7</sup>。由于各方不满盛世才的行为，因此取缔盛氏政权已是势在必行<sup>8</sup>。

盛世才对此变化大概有所耳闻，因此抛弃重庆政府，重新回归莫斯科当是盛氏的一项政治选

<sup>1</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812-813.

<sup>2</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395-396。

<sup>3</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240.

<sup>4</sup> 中国边政协会编，《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台北：中国边政协会，1954年），页 61-64。

<sup>5</sup> 戴维·达林着、潘崖译，《苏联与远东》（台北：华国出版社，1950年），页 357。1944年8月16日美驻华大使高思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中指出，“将盛世才保留在新疆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我们非常怀疑盛世才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也怀疑苏联会在此时开始他们对新疆实行积极控制的计划”。See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806.

<sup>6</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页 291-297。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接受美国调解的原因是：一是为了适应国内政治上的反共需要；二是出于关于战后世界政治的某些考虑。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页 266-269。

<sup>7</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505. 在1944年8月14日一次社交晚会上，美驻华大使高思与苏联驻中国武官罗申（N. V. Roshin）谈话时，罗申谈到新疆问题，“他非常愤慨地说，那里的情况令人不能容忍，但他了解到更换盛世才的困难，因而对蒋介石推迟实现8月9日向苏联大使所作要进行更换。中国不久一定要行动的保证，没有加以责备。……关于哈萨克人的叛乱一事，他说他认为已告平息，如果盛的部队不压迫哈萨克人，不逼迫他们在那里务农，就不会有动乱”。See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804-805.

<sup>8</sup> 据中国学者分析，苏联支持少数民族人民起来反对盛世才、国民党的主要方法是：第一，由苏联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谴责盛世才、国民党的反苏活动，要求撤换盛世才。第二，制造舆论，发动群众。他们采用少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的民族、宗教口号来发动群众。第三，策动建立秘密组织，培训骨干。第四，开放边境，掩护因反对盛世才、国民党而逃苏的人员。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13-14。

择<sup>1</sup>。据学者分析，盛世才判断国民党政府将要崩溃，至少是对他无可奈何的时候，这时又是德苏战争苏军转败为胜的时期，投靠苏联将是明智之举。为讨好苏联，表明心迹，盛世才先于1944年4月逐捕了一批反苏反共人士。盛世才甚至以为，若苏联不再收纳他，他还可以与日本合作。因为1944年7、8月后，抗日战争呈现过分的颓势，潼关、桂林均告紧急，与日本合作不是没有希望的<sup>2</sup>。盛世才自然不愿就此结束在新疆的统治，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便故技重演，即发动“八一—黄林案”，向国民党中央驻新疆势力开刀<sup>3</sup>。1944年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由其警务处特务人员将国民党中央于1943年1月至1943年底派驻新疆人员陆续逮捕，几乎一网打尽，连同地方干部共计逮捕300多人。此次事变发生后新疆监察使罗家伦（1897-1969）及美国驻迪化领事先后秘密发出“新疆政变”的电报<sup>4</sup>。据朱绍良所言：1944年秋季，盛世才忽请辞主席职，而中央派任新疆人员多数被捕、中枢忧疑，以为苏联压力加强，阴谋得逞，新疆当局又将重回旧路<sup>5</sup>。8月12日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告了案情。同时，盛世才向斯大林（Joseph V. Stalin, 1879-1953）表示悔过自新，但遭到回绝<sup>6</sup>。国民政府方面为挽救局势，一面急派朱绍良、徐恩曾（1896-1985，交通部次长）飞迪支撑局面，援救人员，一面下令胡宗南的部队向新疆进迫，空军也飞临哈密，威胁迪化；同时，盛氏亲信的东北军柳正欣部，又抗命不向国民政府军预七师进攻，发密电直接拥护中央。这样一来，弄巧成拙的盛世才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2年来稳固的统治基础，忽然全部动摇。而且，盛世才深知苏联的下一步棋将要出现<sup>7</sup>。因此，在国军大军压境之时，盛世才已感到大势已去<sup>8</sup>。

案发后，8月15日蒋介石派朱绍良飞抵迪化，向盛世才转达国民党中央旨意，即代表中央政府要盛世才去重庆任农林部长。8月29日国民政府即下令：盛世才准辞本兼各职，朱绍良就任新疆省政府代理主席一职。9月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去重庆就职。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884-1959）仍然带职于同年10月初来新主政<sup>9</sup>。自此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直接统治新疆<sup>1</sup>。苏

<sup>1</sup> 据对当时情况略有所知的李帆群分析：“他知道回到内地，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徒有虚名；而且他在新疆杀了那么多人，一旦他手里无权，这些人的亲属必然要对他进行报复。因此，他又打算以排除国民党人为条件，再度依靠苏联，并派汪鸿藻携带他的亲笔密函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联系，希望能得到苏联政治和军事的援助，同时命令粮服处准备一年的粮米，必要时不惜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以便再做他闭关自守的迷梦。可是，苏联拒绝了他的要求，使他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而且，他得力的部队将领柳正欣等都已经入狱，其左右又不敢和国民党较量，众叛亲离，使他陷于四面无援，手足无措的孤立境地。而朱绍良又代表中央劝其离新，东疆方面更是大军（国民党军）压境，如果再顽抗下去，恐怕连个农林部部长也当不上，权衡轻重，只有走是唯一的出路，如此，还可以落得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不致于狼狈不堪”。见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载《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34。另外，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6月20日飞抵迪化，提倡中苏有好的绥靖主义，这为盛世才带来了莫大的暗示，认为美国后台也不可靠。安宁，《新疆内幕》（出版地不详：创垦出版社，1952），页161。

<sup>2</sup> 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39。

<sup>3</sup> 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页259。盛世才叛变国民政府及迫害国民党驻新疆人士，详情见梁仁，《塞外霸主——盛世才》，页234-248。

<sup>4</sup> 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页239。

<sup>5</sup> 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页259。

<sup>6</sup>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页269。据安宁的论述，“盛氏秘密通过苏联领馆向斯大林忏悔，愿将新疆整个加入苏联，作为苏联战后加盟共和国之一”。安宁，《新疆内幕》，页161。对内情较了解的郎道衡以为，盛世才，“不能认为他还是回到苏联怀抱中去，可能他有这种幻想，但事实上已不可能”。郎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76。

<sup>7</sup> 安宁，《新疆内幕》，页161-162。

<sup>8</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005-6006。盛世才最初逮捕国民党中央派新人员时，原是讨好苏联的表示，表示他决心叛离国民党中央，假如苏联不是为了顾忌美英和整个战局的关系，再度收容盛世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苏联对盛世才下一步的行动未即指示，而国民党中央行动迅速，一面派朱绍良等安抚，一面令入新部队挺进迪化。盛世才深知自己实力不足以抗拒国民党中央入新部队，而外来援兵又非一时所能洽妥，彷徨数日，终于狼狈就范。梁仁，《新疆五十年》，页241。

<sup>9</sup> 据了解吴忠信任命新疆实情的曾小鲁所称：“新职主席一缺，伪中央的大员逐鹿者不少。如梁寒操、朱家骅都到过新疆。朱跃跃欲试。孙科则力保梁寒操。二陈（果夫、立夫兄弟）也想推荐C.C.人物。但是蒋介石心目

联方面对此表示满意，并声称：此次中国政府更换新疆当局，苏联方面对此表示满意，并声称：“此次中国政府更换新疆当局，如其动机在调整中苏关系则不得不使人满意”。<sup>2</sup>盛世才被迫离新有以下几个原因：（1）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导致新疆局势的混乱和动荡。民心尽失，破坏了他在新疆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是他被迫离新的根本原因。（2）苏联通过外交途径谴责新疆当局的反苏活动，强烈要求撤换盛世才，是导致他被迫离新的重要原因。（3）美国为保证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通力合作而从中斡旋，是盛世才被迫离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4）盛世才故伎重施，逮捕国民党在新大员，迫使蒋介石下决心调换盛世才。这是盛世才被调离新疆的直接原因<sup>3</sup>。

蒋介石在1944年8月选任新疆省主席时，特别垂青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因为吴忠信不仅是民族同化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行者，而且娴熟于运用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的手法：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以牵制其民众。蒋介石一方面借助吴忠信用中国传统统治少数民族手法治理新疆，另一方面又对新疆各族人民建立起严密的思想、组织控制体系，几乎把内地所搞的专制独裁统治原封不动地搬到新疆，如进行铺天盖地的“党化新疆”的宣传，以建立起统治新疆的思想基础；推行保甲制，以建立起统治新疆的组织基础等等<sup>4</sup>。吴忠信统治新疆采取了“治新三板斧”。在吴忠信的随官曾小鲁来看，所谓三板斧，不过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拢络上层分子的手法而已”，对于“新疆的劳动人民是没有实惠的”。“宣抚也罢，敦睦也罢，终无补于‘三区革命’形势的缓和”。<sup>5</sup>吴忠信以为统治新疆应分而治之，建议将新疆起一分为四，但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sup>6</sup>。

蒋介石认为，让吴忠信出任新疆省主席可以安抚新疆民众与苏联，但事实上吴忠信不但招致新疆人民的不满，而且苏联也视吴忠信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为“反苏集团”，使本已相当激化的新疆内外部矛盾更加激化<sup>7</sup>。吴忠信为避免与苏联有所冲突，严禁《新疆日报》登载反苏反共的中央社电讯，甚至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支持，吴忠信不仅在报纸上从不提及，连口头上也不曾向苏方提出过抗议<sup>8</sup>。然而其也无力恢复中苏关系，无功于新疆或中央。中国学者以为，国民党政府不懂得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民众力量已经崛起，决非少数特权人物所能完全控制。所以当1944年11月苏联策动支持新疆少数民族革命时，北疆一带的新疆少数民族人民或表现出同情与支持，或投身到武装反抗的斗争中去。这一严峻的形势促使国民党政府反思，发觉再沿袭过去的政策会丢失整个新疆，不得不改弦易辙变换统治手法了，用蒋介石的话说，即要积极准备对新疆进行“政治宗教改革”，换句话说，即要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让步<sup>9</sup>。

### （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诞生

---

中却属意于吴忠信。因为新疆环境特殊，过去杨、金、盛都把新疆搞成独立王国，好容易盛世才交出地盘，必须派一个既没有野心又老成持重的人才能放心。吴忠信主待边政多年，各方均著信誉，而且过去担任安徽、贵州主席时，均不过一年，即再三辞职。这样，逐鹿诸人也就无话可说。吴的班底只带去曾小鲁，周昆田两人。周为省府委员，曾为省政府秘书长”。曾小鲁，“吴忠信统治新疆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86。

<sup>1</sup> 有些学者认为，1944年9月重入中国版图，这是自1877年以来左宗棠西征以后中国内地势力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在1877年到1944年的60余年间，除极少数汉人官吏及冒险家外，是极端的隔膜。安宁，《新疆内幕》，页163。

<sup>2</sup>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页270。

<sup>3</sup> 欧阳云梓，“盛世才被迫离新原因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卷24期6（2004年12月），页19-22。

<sup>4</sup> 黄建华，“论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2（2002年4月23日），页53。

<sup>5</sup> 曾小鲁，“吴忠信统治新疆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页88-90。

<sup>6</sup> 吴忠信建议分省虽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批准，但从吴忠信的一首诗中可知其有关想法：“建议新疆分四省，山南山北与昆仑，安西从此安盘石，立只天山尽故人”。曾小鲁，“吴忠信统治新疆经过”，页90。

<sup>7</sup> 黄建华，“论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55。

<sup>8</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257。

<sup>9</sup> 黄建华，“论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53。

中国学者认为，苏联利用盛世才之暴政引发的民族矛盾和经济恶化以及与新疆相邻的有利条件，在新疆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施行了一系列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侵略性、离间性和颠覆性的活动，以恢复在新疆所获得的权益和对新疆的巨大影响，进而重新控制新疆。从此，“新疆边境地区开始成为多事之区，其社会政治局势日益激化，逐渐陷入到紧张、纷乱、激荡的状态之中。在苏联有关方面的策动和支持下，这一地区蔚然兴起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风暴，直至演变为席卷全疆的‘三区革命’”。<sup>1</sup>许多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分析，指出“‘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军阀盛世才的黑暗统治：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哈萨克、回等族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普通农牧民惨遭杀害、囚禁。有压迫就有反抗，富有斗争传统的新疆穆斯林民众忍无可忍。他们拿起武器，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得到苏联在人员和武器、物资上的支持”。<sup>2</sup>“三区革命”大规模的开展在1944年9月后，而远在1940年阿山地区哈萨克族牧民的武装斗争则是“三区革命”的前奏。而盛世才则另有解释：“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运动’，应视为新疆一部分回族等凭借外援分裂中国领土之一种背叛祖国之企图”。<sup>3</sup>实际上，从1943年8月间在南疆各地以及在迪化和北疆各地所发现以“解放组织”名义散发宣传小册可知，苏联在新疆鼓动和支持的是民族解放运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右派领导层以及后期的左派领导层都认为自身参与的独立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sup>4</sup>。然而，具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的独立运动，在任何一种有利时机都会爆发，“盛世才的黑暗统治”时期为此运动创造了机遇。苏联对此深有研究，因此可顺水推舟，借势达成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利益<sup>5</sup>。

苏联支持新疆突厥民族人民起来反对盛世才、国民党的主要方法是：第一，由苏联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谴责盛世才、国民党的反苏活动，要求撤换盛世才。第二，制造舆论，发动群众。他们采用少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的民族、宗教口号来发动群众。第三，策动建立秘密组织，培训骨干。第四，开放边境，掩护因反对盛世才、国民党而逃苏的人员<sup>6</sup>。苏联自1943年决定撤出新疆起已开始利用各民族文字的宣传小册奠定了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思想基础<sup>7</sup>。同时

<sup>1</sup> 曹国芳，“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21期2（2005年4月），页123-127。相同的观点也见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引言》，页3。对1911至1949年间新疆政治发展史深有研究的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也认为，伊宁暴动当初在尼勒克（Nilka）县爆发时仅为当地民众之自发行为，之后被苏联利用。See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3-174. 然而，该暴动自准备期间莫斯科就已插手，协助其暴动成功。

<sup>2</sup> 丁宏、张国杰，《百年中国穆斯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365。也有学者认为，盛世才亲共亲苏政策以及新疆各族子弟常赴苏联留学，这些都为马列主义在新疆传播创造了条件。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影响的青年人更加不满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因此，“三区革命”“从主观上讲它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国民政府加强反宣传政策，强化国民党在新疆的舆论宣传，保证国民党意识形态在新疆的传播。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论”，《西北史地》，期4（1994年），页67-68。中国官方学者中就东突厥斯坦之革命的爆发原因也有不同的看法：（1）其原因在于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其爆发原因之内因是主要的，国外支持和参与则为其次；（3）国外因此为主，其蓄谋已久，一手策划，内因为其次。蔡锦松，“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期2（1986年），页5。

<sup>3</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45、47。

<sup>4</sup> 据齐清顺的研究，三区革命领导人把“三区革命”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又称为“民族解放革命”或“民族解放斗争”等，认为“三区革命”是当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一场武装斗争。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期22（1998年），页79-90。

<sup>5</sup> 陈斯英在当时分析新疆为什么会发生伊宁事变时谈到：“概括言之，就是由于民族仇恨加上苛虐腐败政治与内外野心家的阴谋三种因素所促成。所以，伊宁事变的发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且可说是新疆过去一连串变乱的延续。因为那些造成历次变乱的因素从未被彻底消除，祸乱的根苗是永远存在着”。陈斯英，“伊宁事变前后的新疆政局”，载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页415。

<sup>6</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13-14。

<sup>7</sup> 据传，苏联同盛世才关系破裂以后，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

积极培养各族政治、军事人才为建立该共和国打下了物质基础。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sup>1</sup>。在“伊宁事变”之前，苏联就已开始筹划新疆民众反盛世才政府之行动。据苏联内政部人民委员会（NKVD，内政部）1944至1953 以及1946至1949年间之档案，苏联政府为策划新疆事变专门建立了“特别行动组织”，任命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情报事务长耶格纳洛夫（Vladimir Stepanovich Egnarov）将军担任该组织负责人，内政部人民委员会第一第四局局长郎方（Aleksandr Ivanovich Langfang, ? -1990）将军则协助耶格纳洛夫。该组织之指挥中心设立在阿拉木图（Alma-ata, 原哈萨克斯坦首都）市，分部则设在苏联境内之霍尔果斯（Qorghas, 一部在苏联境内，一部在伊宁境内，即霍城）。另外，为策划新疆南部事变，苏联内政部人民委员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设立类似的组织。1946年3月后该组织负责人为巴勒尼科夫（Balnikov）上校<sup>2</sup>。苏联内政部人民委员会特别行动组织许多特工渗透北疆，积极为苏联服务<sup>3</sup>。

据中国学者研究，苏联政府于1943年在阿拉木图成立了“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该组织由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所组建，其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的少数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sup>4</sup>。据称，1943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sup>5</sup>。由此而知，莫斯科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是一项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战略选择。苏联最高领导层包括斯大林、内务部长贝利亚（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 1899 -1953）以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此有所知，而内务部特别任务部（也称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情报事务部）部长耶格纳洛夫直接参与组织和主导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国全过程<sup>6</sup>。获得有关东突情资的管道并非仅耶格纳洛夫主导的特别任务部，苏联高层同时拥有其他的管道，了解东突情势之发展状况<sup>7</sup>。实际上是苏联内政部一手策划的非常完善的行动计划。

据了解该事件内情之投诚迪化政府之哈萨克族代表白克太供称：“（1）苏联策动阴谋，欲

---

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期3（1999年），页217。

<sup>1</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18。

<sup>2</sup> 《1944-1953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96. Л. 197-198）及《1946-1949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Оп. 2. Д. 144. Л. 383），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8-79.

<sup>3</sup> 《1946-1949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Оп. 2. Д. 68. Л. 242-245；Там же. Д. 99. Л. 157-158），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9.

<sup>4</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1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256。

<sup>5</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21。“红八团”对外称一个团，实际是一支包括步兵、骑兵、炮兵、摩托兵、坦克兵、工程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总兵力达3,000余人的机械化旅，武器装备除一般步、机枪外，还有坦克、装甲车、大炮、高射炮，甚至还有作战飞机100余架，其战斗力和机动能力比较强。“红八团”进驻哈密以后，不断举行军事演习，活动范围覆盖整个哈密地区。

<sup>6</sup> 《1944-1953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98. Л. 35-36），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81. 另见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页440。即使如此，苏联学者对此另有看法：“蒋介石集团积极地帮助美国的好战集团实行它们的反苏计划。例如，与苏联中亚细亚边境接壤并因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疆事变，就可明了这一点”。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05。

<sup>7</sup> 《1944-1953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96. Л. 197-198），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81.

使哈（哈萨克）、维（维吾尔）、回（中国穆斯林）、乌（乌兹别克）等各族籍其援助，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其各部首领，曾有由各地伊斯兰教绅士选任，然其军政大权，则由苏联派来之苏籍或归化族人员如波理诺夫、斯卡乌混、裴里贺夫、列司卡等，以及各专员或副专员或县长、警察局长等等操持之；（2）匪方大部军队为回教徒，一部为归化及蒙族，其主官曾多为当地人士，副主官、顾问教官等均为苏籍人员负责；（3）匪方所用武器如坦克、铁甲车、大炮、机枪等，均由苏方供给，由苏方军事指导员负责支配管理之，但阿山之武器多由外蒙运来，南疆（之武器）则1944年之德国（所）造；（4）匪方经费，自暴动以至现在，向人民征取，并没收汉族财产，以供军用，匪方则利用我省府印发新币上有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政府之钤记”。<sup>1</sup>依此可知该运动的政治组织、军械军饷等结构概况。

从散发传单的时间先后来看，除阿尔泰地区（阿山）之外，苏联在当初，即1943年8月之间，以南疆为重点实施独立宣传活动。部分间谍被新疆当地安全机构抓获或侦知的同时<sup>2</sup>，这种宣传活动逐渐开始向包括迪化在内的整个北疆扩展<sup>3</sup>。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力汗·吐烈（Alikhan Töre, 1885-1976）自1944年4月9日建立“伊宁解放组织”前后<sup>4</sup>，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官员就多次与之会谈，声称带来了斯大林的问候以及苏联愿意帮助完成独立事业，对1933年协助盛世才镇压民族独立运动表示遗憾，有关苏联官员也已受到处罚等等<sup>5</sup>。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lsan, 1895-1952）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曼，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曼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sup>6</sup>。同时，苏联还为当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逐一秘密派往阿山、塔城以及伊犁等三地区。由于这些骨干的参与，北疆各地开始了游击战争<sup>7</sup>。10月间“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艾力汗·吐烈与地下组织领导人阿不都海依尔·吐烈（Abdul-hayir Töre, 哈萨克人）共同商议暴动事宜<sup>8</sup>。至11月7日，部分省军调往阿尔泰地区对付乌斯曼反抗组织以及伊犁地区的部分驻军调往巩哈县（Nilka, 今尼勒克县）之际，伊宁市以艾力汗·吐烈领导的“伊宁解放组织”与巩哈县游击队里应外合发动了起义暴动<sup>9</sup>。艾力

<sup>1</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89-290。

<sup>2</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194-207。

<sup>3</sup> 1945年1月24日从外交部情报司转抄总统侍从室有关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活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该领事馆从1943年9月至1944年11月年间的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共有34条。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89-290。

<sup>4</sup> 据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这个组织的建立不是偶然的，是在当地出现了一批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在苏联学习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进步分子，并在他们的推动下，经过长期酝酿，联合了当时受盛世才、国民党的迫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组织起来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引言》，页 6-7。1944年4月9日成立的，伊宁“解放组织”领导成员共12人，主席为艾力汗·吐烈（Alihan Töre），主要成员有：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lkerim Abasov, 1921-1949）、喀斯木江·坎拜尔（Kasimjan Kamberi, 1910-1956）、赖希木江（Rahimjan Sabirhaci, 1906-1973）、加尼·尧力达西（Gani Yoldash）、努拉努丁拜克（Nureddin Bek）、阿不都肉甫·马合苏木（Abdulrauf Mahsum, 1904-2003）、沙力江巴依（Salijanbay Babajan, 1870-1954）、穆义丁（Muhiddin Ahun Kanat）等。该组织提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在群众中进行反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引导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二是在伊犁地区组织武装暴动；三是团结全疆的革命团体，消灭反动派军队，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政权。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7-8。

<sup>5</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İstanbul: Orient-Institut İstanbul, 2006), ss.232-233. 艾力汗·吐烈对苏联政府有所疑虑，因此在「伊宁解放组织」会议上指出，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曾经背叛过东突民族解放事业，因此担心与苏联合作会重蹈覆辙。该组织重要成员之一喀斯木江·坎拜尔则建议可以策略性利用苏联的支持达成独立事业。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3-234.

<sup>6</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9。

<sup>7</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11-30。

<sup>8</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36.

<sup>9</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28-32。有关尼勒克游击战详情见色拉依丁·斯得克，“关于‘三区革命’回忆”，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页 81-93。

汗·吐烈于当日在清真寺举行晨礼时，伊宁市东郊及北郊枪声乍起，艾力汗·吐烈当即声明这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枪声，继而宣布暴动。市民开始涌向街头，袭击市内政府机构，与进攻伊宁市的郊外地下组织积极配合。艾力汗·吐烈领导的数以千计的市民在袭击市警局成功之后，立即宣布：“从今日起，不承认占领者之中国政府”。<sup>1</sup>一场由苏联支持的、反对暴政和寻求自由的独立运动正式爆发<sup>2</sup>。

苏联最高领导层不但策划和组织“伊宁事变”，而且在物资、军事技术以及军事指挥方面也给予支持。“三区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苏联积极全面参与的结果<sup>3</sup>。伊宁革命成功后，苏方于1944年11月下旬在伊宁市分别设立由符拉基米尔·柯兹洛夫(Vladimir Kozlov)负责的“一号房”和由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Vladimir Stefanovich)负责的“二号房”以便为此革命提供咨询<sup>4</sup>。而耶格纳洛夫将军则担任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坐镇指挥<sup>5</sup>。当然，该政府的政治和军事之重大决议在未经过苏方的同意不可能被执行。耶格纳洛夫将军每周向苏联政府提供当地政情报告，提供该共和国之发展状况<sup>6</sup>。实际上，苏方在获得有关情报方面拥有多种管道，多由内政部长贝利亚直接呈报苏共中央高层<sup>7</sup>。

在基本占领伊宁城区后，即着手组织新政权。1944年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sup>8</sup>。艾力汗·吐烈、阿奇木伯克·霍加(Hakimbek Hoca, 1871-1957)、阿不都肉甫·马合苏木(Abdurauf/Abduraup Mahsum, 1914-2005)、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Rahimjan Sabirhaci, 1906-1973)、莫合买提江·买合苏木(Muhammedjan Mahsum, 1902-1962)、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lkerim Abasov, 1921-1949)、海比甫·尤尼切夫(Habip Yunichev, 1906-1945)、安尼瓦尔·木沙巴也夫(Anwar Musabayev, 1917-1995)、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莫斯卡廖夫(Povel P. Moskolov/Moskalev/Maskoliuv, ?)、阿不都海依尔·吐烈(Abdul-hayr Töre, 1890-1970)、加尼·尧力达西(Gani Yoldash, 1908-1971)、布卡·安木巴勒(蒙古族, 1911-1949)、沙里江巴依·巴巴江(Salihjanbay Babajan, 1870-1954)、阿不都木塔艾力·海里潘(Abdulmüteali Halfe, 1869-1960)、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Peter Romanovich Aleksandrov, ?)、艾尼(Gani Batur, 1901-1978)等十六人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推选艾力汗·吐烈为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为副主席，阿不都肉甫·马合苏木为秘书长<sup>9</sup>。该共和国的宣布日期与11

<sup>1</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6-237.

<sup>2</sup> 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的这一天，由于苏联的国庆，新疆日报社论仍祝“友邦苏联国运昌隆，中苏亲善永久无间”。此时，中国报纸不仅不敢提苏联侵略字样，而且口头上也不敢向苏联抗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 6257。

<sup>3</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64. 中国学者朱培民在分析苏联支持三区革命时指出：(1) 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三区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压迫；(2) 帮助建立秘密组织；(3) 突破新疆当局对边境的封锁，接待从伊、塔、阿地区越境人员，并给予训练和武器，向中国新疆派遣武装越境人员，为武装暴动提供条件；(4) 苏联军队直接参加攻打伊宁的战斗，苏联驻伊宁领事插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朱培民，“1943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21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 138-145。

<sup>4</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44。

<sup>5</sup> 《1944-1953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96. Л. 197-198)，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9.

<sup>6</sup> 《1944-1953年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档案》(Ф. 9401 с. Оп. 2. Д. 104, 300-303)，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9.

<sup>7</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80. 包尔汉也称，“三区的武装斗争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包尔汉，《新疆五十年》，页 282。

<sup>8</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9-240. 亲身经历和参与过“三区革命”之赛福鼎·艾则孜等人，在其回忆录中谨慎处理伊宁政府与苏联的关系，避免苏联支持“三区革命”之嫌。而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则无此顾虑，如《中国外交史》称：“11月12日，在苏方支持下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脱离了关系”。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年》(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599。

<sup>9</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35-36。据包尔汉的分类，“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成员有三种成份，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

年前由萨比提·大毛拉(Sabit Damolla Abdulbaki, ? -1934)在喀什噶尔宣布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年11月至1934年4月)同日,其中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目了然。

据陈力的叙述:起事后第三天,伊宁市“警局被陷;11月10日,伊宁城区全陷。伊宁区军警与巩哈县残军以及机关公务员眷属,退守艾林巴克(Hayranbagh)之鬼王庙、空教队及飞机场等几个据点。暴民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政府’。叛军占按伊宁后即分兵四犯,11日绥定被陷,宁西、霍城也于该日失守;20日博乐温泉,守兵四散。12月31日惠远陷落,伊区南面的巩留、新源、特克斯官民向焉耆撤退,径玉尔都斯(Yulduz)山,被暴民追上,生抵焉耆者仅县长、警察局长等30余人;昭苏的官民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最后抵达者仅十几名警士。这时伊宁区只有艾林巴克的孤军仍在死守”。<sup>1</sup>自11月9日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开始围攻艾林巴克。至1945年1月29日,“守军绝粮已经三天,30日艾林巴克放弃,退守最后据点机场。31日下午,孤军决定突围,突围后的二千军民被敌骑追至,杜德孚(预备第七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七师参谋长)、彭俊业(预备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团团长),不是自杀便是阵亡;青年妇女被拖走,800余人被俘,到最后入狱者仅500人,妇女34人。此时距开始被围11月9日,恰是84天”。<sup>2</sup>艾林巴克战役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之后最关键和最艰难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奠定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条件。

11月9日,主导新疆军务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1891-1963)接到预备第七师参谋长曹日灵解决“伊宁事变”之电文,其电称:“用外交方式作妥协,请其(苏方)作友谊协助,但不许苏俄派遣军队”<sup>3</sup>之办法为唯一途径。11月11日新疆主席吴忠信和朱绍良联名致电蒋介石:“从目前情势观之,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sup>4</sup>并建议由中央转托华盛顿方面对苏联政府进言,使两国边界如常安定;并请平时与苏联较为接近之人员迅速来新,以便与苏领馆切实联络。另要求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充实新疆的力量<sup>5</sup>。国民政府高官也深知“伊宁事变”背后有苏联支持,因此寻求与苏联达成谅解以便解决该事件。11月22日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拟呈恢复对苏贸易以及妥善处理新疆问题案,以求“使各民族在政治上及生活上得以安定,而免苏方从旁引诱挑拨”。<sup>6</sup>然而苏联方面并不承认曾涉及

---

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三是封建宗教阶层的,主要以伊力汗吐拉、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这个临时政府,既有反对国民党残酷压迫、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流,也有脱离祖国、仇杀汉族人的错误”。包尔汉,《新疆五十年》,页282。陈力曾分析该共和国领导层的结构特征:

(1)以团结土著民族为手段,以推翻汉族政权为目的。(2)事变期中,哈萨克拼命,归化人是外援媒介,维族是政略执行者。(3)发难时的英雄,不见得就是和平后的大官,而且愈接近和平,英雄们就愈趋末路。(4)宜接握政的,都是30上下的维族青年,高贵的花帽子还得请“社会贤达”的阿洪去戴。总之,革命过程中,照“理智者”的指示,是有阶段性的,暴动是手段,政权是目的,前一阶段所用得着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后一阶段所需要的。陈力,“伊宁事变军事冲突经过”,《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页434。

<sup>1</sup> 陈力,“伊宁事变军事冲突经过”,《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页430。作者另有专著出版,见陈力,《伊犁事变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有关伊宁政府军事力量攻取惠远城之详情,见吐呼地·依布拉音,“三区革命时的惠远解放”,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页94-107。

<sup>2</sup> 陈力,《伊宁事变军事冲突经过》,《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页431。

<sup>3</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33。

<sup>4</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34。

<sup>5</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34。

<sup>6</sup> 蓝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254。然而蒋介石似乎并未领会吴忠信和朱绍良陷入的困难,11月25日致信指示吴忠信和朱绍良,加强对伊宁方面的军事部署:(1)集中伊宁附近兵力积极进攻,以期收复伊宁等地,如不得已,则应在伊宁竭力对峙,作持久之计;如某国出面干涉,亦不必顾忌。(2)除已调往伊宁的部队外,其他兵力照原定方案,巩固迪化至玉门东大道之防务,并确保南北疆各要地,务使匪患不蔓延到其他地方。(3)对俄外交就地地进行,如有一线希望,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以保全领土与主权。(4)全疆各地应竭尽一切政治、军事手段,设法撑持。迪化附近工作,尤以原飞机修配厂及各飞机厂从速着手防御。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43-44。

该事件。外交部顾问事务处长卜道明在11月25日与苏联驻中国代办司高磋(T. F. Skvortsov 或T. F. Skvortsoff) 就有关新疆事件的谈话呈送蒋介石。报告称：“苏联将用一切方法增进并加强中苏友谊及两国之合作”<sup>1</sup>；“关于新疆发生事件报告指称白俄之暴动”一事，司高磋则称：“有关伊宁白俄之暴动，本人（司高磋）系于一星期前与阁下（卜道明）谈话中始获知悉，今竟几将伊宁城全部占领，实属不幸（该代办言至此，摇头，并低声骂他妈的）”。<sup>2</sup> 司高磋表示，“惟相信苏联对此等白俄之暴动，决不至有何种关系或支持，倘苏联人在新省有此种举动，苏联当用极严厉手段处置也”。<sup>3</sup> 中方面对这种情势，仍一面寻求内部之政治解决，一面希望从外交上维持中苏和平，而求新疆之安定。1945年1月19日宋子文将一项《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面交苏联驻华代办司高磋，以冀苏方不再在新疆省内制造事变，但苏方置而不复<sup>4</sup>。实际上莫斯科关闭了中苏有关在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大门。

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建立后，积极完善其组织构造之外，1945年1月5日该政府又于第4次委员会通过了《政府宣言》，声明其共和国性质：

- (1) 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
- (2) 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
- (3) 为使东土耳其斯坦在经济上得到全面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及私营企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4) 由于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特别提倡这个宗教，同时，也给与其他宗教自由，并予以保护；
- (5) 发展文化教育及保健卫生事业；
- (6) 同全世界各民主国家，尤其是东土耳其斯坦的邻邦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同时，也促进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
- (7) 为了保卫东土耳其斯坦的和平，吸收各族人民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 (8) 银行、邮政、电话、电报、森林及一切地下宝藏收归国有；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2。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3。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463。

<sup>4</sup> 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1950年），页 140；秦孝仪编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年），页 805。1945年1月19日吴忠信也曾向蒋介石建议：“（1）中央在可能范围内予新省交通、粮食及物资上以帮助。（2）积极调整对苏外交，俾达成中苏经济合作，而缓其政治上之阴谋”。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57。另外，有关抗战时期中苏贸易方面杨玉林有详细研究，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 324-337。

(9) 在国家工作人员中消除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民族主义及贪污腐化的恶劣作风。<sup>1</sup>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也引起美方的关注。早在1944年10月间外交部特派员吴霭宸曾告知美国驻迪化领事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 1901-1989），苏联已参与（在新疆的）各种活动，目的是为了保持它们和新疆的关系<sup>2</sup>。美国驻迪化领事华瑞德（Robert S. Ward）于同年12月10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 Jr., 1900-1949）电中叙述伊宁事件经过之报告，认为伊宁事件不是苏联人所为，是多年被压迫造成的反抗。但是也指出，当地所有人都认为该事件背后有苏联之参与<sup>3</sup>。1945年1月11日华瑞德拜访新疆主席吴忠信，表示希望了解伊宁事变的详情，以便公布于美国的报刊，藉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sup>4</sup>。1月23日华瑞德再次拜访新疆主席吴忠信，了解伊宁事变的最新情况<sup>5</sup>。至此，华瑞德已获知苏联幕后操纵之实事。1月11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二秘史密斯的备忘录则明确指出伊宁事件幕后指使者为苏联<sup>6</sup>。史密斯于1945年1月9日被任命为驻苏大使馆二秘之前曾任驻迪化领事，因此，对此事件背景略知一二。然而，美国为能得到苏联对日作战的承诺，对此事件仅表以观察而已，甚至坚持该事件背后没有莫斯科主使。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1944年11月29日美驻华大使高思辞职，11月17日由赫尔利继任）1945年6月16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电中提到，“据说朱将军（朱绍良）相信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达成协议，因为他坚信叛乱是苏联授意的。但是，英国和美国领事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叛乱不是出自苏联操纵，而是大量的内部原因引起的。虽然在边境的苏联一侧很可能存在着对叛乱分子不言而喻的同情，特别是在同一种族的成员中”。<sup>7</sup>

自伊宁失守以后，国民政府驻新疆部队撤退到精河以西，以便保卫迪化之安全。而伊宁共和国军事力量在占领伊犁后将目标转向塔城，欲以统合阿山将三区联成一片。2月8日朱绍良通电蒋介石，建议“以目前新疆事态，总须有青海两师骑兵开入为妥”。<sup>8</sup>而蒋介石于2月11日致函朱绍良，指示：“凡在精河以西部队，应用最妥之方法先撤至精河（精郭勒，Jing Kol）、乌苏（库尔喀喇乌苏，Kur Qara Usu）一带安全地区，然后从容布防，照中正所预先决定之方针切实遵行，此事对新疆计划只可保守重要据点勿失，以为他日恢复之基地。如果必须勉强维持全部，则必至全疆沦陷，不可收拾”。<sup>9</sup>而吴忠信于2月19日致电告知蒋介石，以新疆现有之交通、粮食、武器、兵源很难固守各据点。如精河以西各山隘失守，精河将不保，全疆亦将大乱，恐为东北之续<sup>10</sup>。此时，伊宁共和国政府一方面完善其组织构造，一方面步步为营，直逼迪化。至4月8日，三区民族军宣告成立<sup>11</sup>。至4月14日伊宁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总指挥部为进攻精河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作战

<sup>1</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51-5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29。

<sup>2</sup> *FRUS, 1943: China*, p. 390.

<sup>3</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818-819. 美国驻迪化领事华瑞德致美国国务院电文全文，见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817-821. 另外华瑞德领事于1944年12月15日致美国国务卿有关新疆局势发展的报告，See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 821-823;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pp. 990-992.

<sup>4</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55。

<sup>5</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58。

<sup>6</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88-990.

<sup>7</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1001-1002. 卜道明于1945年1月23日访唐纵，告诉他“目前伊犁匪势，仅有两千余人，亦无重武器，足证苏联并未出面支持”。唐纵，《唐纵日记》，页487。

<sup>8</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61。

<sup>9</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62。

<sup>10</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64。

<sup>11</sup> 有关民族军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见霍斋·松哈什，《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14辑（1988年），页65-78。有关伊宁政府民族军的编制和结构可参考郭寄峤密呈外交部有关伊宁政府军状况之报告，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①①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24-23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46-6554；也可参考张大军，“新疆伊宁事变与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中国边疆史语文学会编，《新疆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之二）（台北：文瑞印刷文具公司，1964年），页327-328之图表。

计划<sup>1</sup>。4月中旬，朱绍良也调整军事部署，将防御重点放在精河、乌苏两地<sup>2</sup>。

6月初伊宁政府军事总指挥部制定了南、北、中三面作战计划。北线作战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塔城、阿山两地区；中线主要作战任务是攻打乌苏、精河两地，直通迪化；南线的作战任务是攻占拜城、阿克苏，在南疆地区发动武装斗争<sup>3</sup>。这个战略计划若能实现，就可以南北夹击迪化，进而夺取整个新疆<sup>4</sup>。7月下旬民族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到9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Manas）河西岸，距迪化只有140多公里，不仅有渡河东进的情态，且有荡平迪化首府杀至星星峡之势，迪化全城风声鹤唳，汉族民众携妻带子东向内地<sup>5</sup>。至此，北疆全区已完全控制在伊宁政府之下。无疑，1944年至1945年间伊宁政府的建立和发展当取决于苏联政府的全面和积极支持有关<sup>6</sup>。

苏联为什么要参与新疆事务当是学者必为所探讨之重要议题。据中国官方的解释，“对苏联来说，新疆是否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苏联一直十分关心新疆政局，支持新疆地方当局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沟通经济联系，扶植亲苏势力，竭力促使新疆建立一个亲苏政权，使之与新疆接壤的长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得到好处”。<sup>7</sup>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它又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羽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sup>8</sup>。从国家利益方面来看，莫斯科最为关注的是恢复沙俄时代俄国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其实从二战后期起，斯大林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吸取二战初期的教训保证苏联的安全问题。他的安全战略是对沙俄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是以空间换时间，即通过无限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以赢得保障中央俄罗斯安全的时间<sup>9</sup>。从安全战略角度上来看，如美国学者布鲁特库斯所论：非常广阔的俄罗斯平原及其漫长的毫无防卫的边界，使它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而在无险可守的平原，扩大防御纵深无疑是保障安全的最佳途径。由此，伴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俄国也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以控制地理范围为核心的安全观念”。这种特有的安全观念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注重对中国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领土的掠夺与控制<sup>10</sup>。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

<sup>1</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64。

<sup>2</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74。

<sup>3</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78-79。有关三区政府军攻占塔城的详情，见哈吉也夫口述，塔依尔、杨任志翻译整理，“三区革命中塔城的地下活动与武装斗争”，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 4 辑（1988 年），页 25-54。有关三区政府军在新疆南部的军事活动详情，见穆罕麦鼎，“三区革命对南疆的影响”，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 1 辑（1984 年），页 117-124。有关南疆作战之情形，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 6492-6524。

<sup>4</sup> 有关新疆省军与伊宁方面军之间的作战情况，见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载《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 3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页 4-19；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西域研究》，期 2（2001 年），页 35-41。

<sup>5</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 6554-6555。

<sup>6</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64, 80.

<sup>7</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页 4。

<sup>8</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 222。

<sup>9</sup> 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页 24。

<sup>10</sup> 茹莹，“1945 年前美俄（苏）对华政策特点之比较”，《齐鲁学刊》，总期 172（2003 年），页 134。

且不太引人注目<sup>1</sup>。然而合并新疆为苏联至加盟共和国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1945年8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完全独立于中国，10月11日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苏联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吞并这些土地，那么，新疆也存在可能被兼并之忧。此当与莫斯科政策取向和利益取舍有关。与中共学者观点略有出入者，对新疆近百年史深有研究的张大军则认为，“此一伪共和国成立背景复杂，亦系苏俄侵略新疆的蓄意深远，尤在1943年10月德黑兰会议后，美国欲假道苏俄援华，斯大林鉴于中国如获得国际大量支持力量将增强，为了阻止援华，于是发动伊犁的部分回族乱，藉以阻塞通路。更为报复盛世才的反苏，打击中央的势力入新，于是支持法合提（帕提赫，Fatih Muslimov, 1900-1980）肇乱，并假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艾立汗条热（Alikhan Töre）等作反中国运动，要求民族自治自决，成立‘国家’，重演其前侵略伊犁的阴谋”。<sup>2</sup>另外，斯大林面对中亚加盟共和国之兴起的民族主义独立情愫，实施将此情愫转嫁于新疆的政策，“放任他们到伊犁动员新疆土著对付汉人，造成民族独立战争而转移视线”。<sup>3</sup>

在中国学者来看，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的话，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sup>4</sup>，即各取其利。俄国学者认为，新疆的“三区革命”被苏联的领导层看成是以听其支配的由本土居民为代表组成的政权，取代原新疆省政府的现实可行的机会<sup>5</sup>。似乎在淡化莫斯科深层战略利益。实际上，苏联既不甘心失去在新疆的既得利益，也不允许在自己边境有一个反苏基地存在，“因此它要利用新疆各族人民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推翻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以恢复它昔日在新疆的各种权益，并避免任何国家染指于它一向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新疆”。<sup>6</sup>因此，斯大林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保证苏联的战略安全。他将与苏联毗邻的中国新疆、外蒙古和东北纳入苏联的“战略安全圈”，在这些地区，“不准出现反苏地方政权或反苏势力，不准任何第三国势力入内”。<sup>7</sup>诚然，在中国和苏联中亚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自然有利于莫斯科实现在新疆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中亚的安全利益；再者，无论汉族或是当地民族主政，如果能在新疆能建立亲苏政权，即可符合苏联的地区利益。因此，在新疆建立的政权无关当地民族或汉族，只要有利于保障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任何新疆政权莫斯科都可以接受。

国共两党对伊宁事件性质方面的认知也有分歧：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此事件定性为由苏联支持的“叛乱”；而中共认为伊宁事件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一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官方学者以为东突厥斯坦之革命即“三区革命”无疑是新疆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而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之王恩茂（1913-2001年）对东突厥斯坦之革命的评价则代表了中共官方的认知：“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的配合下，在斯大林领导时代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sup>8</sup>但是面对历史事实，中国官方学者在研究该事件时面临极大的困境。如何认识苏联在新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在新疆的政策措施，实为棘手问题<sup>9</sup>。中国官方学者在处理东突共和国宣布独立以

<sup>1</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3。

<sup>2</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26-6527。

<sup>3</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26-6527。

<sup>4</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1。

<sup>5</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451。

<sup>6</sup> 欧阳云梓，“盛世才被迫离新原因探析”，《中州学刊》，页20。

<sup>7</sup> 薛衔天编著，《中苏关系史（1945-1949）》，页2。

<sup>8</sup> 蔡锦松，“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页5。

<sup>9</sup> 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在编辑出版《新疆简史》第三册时，也曾面临如何解释苏联出兵干涉新疆事物问题。《新疆简史》的编者陈慧生与蔡锦松，曾为此问题于1986年7月26日专程就苏联出兵和驻兵新疆问题请示了当时中

及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之作为时，仅以该共和国“犯错误”为了断：“应该指出‘三区革命’初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曾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独立旗帜[这主要体现在九项宣言上]，一个是把汉族当作一个整体，未能正确区别对待汉族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而发生过仇杀汉人的现象”。<sup>1</sup>然而，无论东突共和国建立初期和后期，所有领导人都认为其行为是“民族解放运动”<sup>2</sup>。

伊宁临时政府的成立给蒋介石以不小的冲击。国民政府为控制事态的发展以及寻求解决办法责成外交部拟定有关措施。1944年12月8日外交部提出《关于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东三省、朝鲜问题的研究报告》。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蒋介石建议说：“关于新疆问题，我们宜针对苏方策略筹划应付方针”。“因我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造成新省少数民族问题，故易受苏方之诱惑，发生叛变”。“苟不筹预防之计，则一旦事变发生，颇难收拾”。“为谋确保新省之安全：须先安定少数民族，放弃过去一贯之高压政策”。因此，“赋予自治政权，由我督导”。同时，要“增强省防，但必须避免刺激苏联”。要“改善交通”以便连接内地。“与苏联协商经济合作，须以经济互助为前提”。在策略上，“若借助于英美又易启苏联之猜忌，莫若顺水推舟，迎合苏联之意”。如此，“一方既可达成我新省之建设，一方又可暂时稳定苏联对新之态度”。<sup>3</sup>

蒋介石对外交部的建议犹豫不决；他认为此事关系到对苏外交的全局，不可轻动<sup>4</sup>。国民政府在解决新疆事件时面临两难的困境并非仅因莫斯科直接插手所致，缘于苏联控制的中亚民族与新疆民族在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方面拥有共同性，同于跨境民族，具有吸引新疆各族之功用，更何况新疆的经济命脉系于苏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1890-1969年）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强调“新疆与苏联向来就有历史上的、地理的、民族的、经济的种种密切的关系”。<sup>5</sup>张治中对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内在关系有现实的认知：“无论就民族、经济、地理来说，新疆和苏联都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就地理说，疆界毗邻。就民族说，我们新疆有乌孜别克民族，苏联有乌孜别克共和国；新疆有哈萨克族，苏联有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就是他的首都。苏联在中亚细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我们新疆都有同样的民族，而且都是近邻。这些民族的国籍虽不同，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无一不同。就经济说，……新疆人民的生活用品多半靠苏联供给，苏联与新疆构成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新疆和苏联的关系如此，我们能够不在外交上和苏联友好吗？所以我曾说：‘就全国说，应该保持中苏的友好关系；在新疆来说，尤其应该保持中苏最友好的关系’”。<sup>6</sup>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以亲苏的姿态，开展了对苏友好外交。然而，国民政府对伊宁政权同时又采取牵制和分化的政策<sup>7</sup>，其双管齐下的政策面对苏联支持的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收效甚微。

## 二、构筑外交优势：苏联战略利用“东突”

---

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立群。邓力群以为“以前的几次出兵与现实关系不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事，人民无权，不能做主，最后一次（指‘三区革命’期间）写得太多了不行，一句话不提也不好”。“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就行了：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物质上得到了邻邦的支持，就行了，事情也确实如此”。

蔡锦松，“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页2。

<sup>1</sup> 蔡锦松，“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页6。

<sup>2</sup> 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页83-94。另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张必须根除六十年来中国汉人之统治，即要根除自1884年新疆建省以来的中国之统治。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29、6531。由此可知，在该共和国的认知中，东突厥斯坦被中国统治的起始点源于新疆建省之时。

<sup>3</sup>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页600。另参阅苏光文，《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105。

<sup>4</sup>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页600。

<sup>5</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册，页421。

<sup>6</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册，页525。

<sup>7</sup>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论”，《西北史地》，页68-70。

正当伊宁方面正在积极拓展其实力之时，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胜利在望，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沈志华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因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雅尔塔会议所获利益之要求，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sup>1</sup>。

### （一）苏联对日宣战，获取在中国的利益

尽管苏联避免腹背受敌（德国和日本）于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立，但是，斯大林暗地里并未遵守该条约。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有意邀请苏联对日作战。1941年12月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 1871-1955）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利瓦伊诺夫（Maksim Maksimovich Litvinov, 1876-1951）时，表示了这个愿望。利瓦伊诺夫却说，苏联政府因忙于紧张的对德战争，已决定不能在这时进入远东战事<sup>2</sup>。尽管如此，斯大林在1941年12月对蒋介石、1942年8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同年12月对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 1883-1963）、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时，对美国国务卿赫尔一再表示苏联将会参加对日作战<sup>3</sup>。同年11月1日，蒋介石在获知苏联承诺参加对日作战消息后不久，即授权傅秉常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明确表态，如果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中国则准备与苏联结成任何种类的联盟<sup>4</sup>。斯大林在1943年12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当面表示，德国被打败后将在击败日本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sup>5</sup>。1944年10月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即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开战<sup>6</sup>。至此，苏联与盟国一起对日作战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但是，蒋介石对莫斯科是否会利用对日宣战进兵满洲后支持中共坐大有所担心。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要求蒋介石组成一个国共联合政府时，蒋介石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尊重东北的边界，他就接受罗斯福的建议<sup>7</sup>。实际上，为了防范

<sup>1</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4。

<sup>2</sup> Tien-fong Che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7), p. 62.

<sup>3</sup> Charles F. Romanus &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 51;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241;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1.

<sup>4</sup> *FRUS, 1943: China*, p. 833.

<sup>5</sup> William Averel Harriman &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 266;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 142. 德黑兰会议召开前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举行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三国首脑会议，史称“开罗会议”。由于斯大林认为苏联与日本有协约，不便与中国领袖蒋介石一起举行会，因此，斯大林没有参加“开罗会议”。而“开罗会议”结束后，斯大林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史称“德黑兰会议”。在开罗会议上，中国作为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四大国之一，与美英两国重点讨论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对日作战，反攻缅甸问题；二是关于中国问题；三是如何对日本进行战后处理等问题。11月30日，斯大林对丘吉尔表示，他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理所当然地应归还中国。See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323-325;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斯坦会议记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58。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它第一次宣布，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盟国要彻底打败日本，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明确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当然，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疆土之意思。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页5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页407。

<sup>6</sup>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69.

<sup>7</sup> 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p. 164;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1944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sup>1</sup>。

莫斯科对日作战的决策对美、英两国至关重要，其原因在于若美、英单方面与日本作战伤亡惨重，而借重苏军实力对付日本自然可以减轻伤亡程度，同时也可以缩短对日作战的期限。1944年9月召开的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s, 1943年8月17日至8月24日）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18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100万人的伤亡<sup>2</sup>。美、英的这种担心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45年7月16日美国试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为止。在1945年1月2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实属必要”。<sup>3</sup>由此可见，在军事方面，美国需要苏联的协助。另外，美国对中国是否能承担太平洋作战行动有所怀疑<sup>4</sup>，因此对付日军仍需要苏联的军事力量<sup>5</sup>。当时华盛顿一方面希望苏联能参与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会借机将中共纳入其势力范围，主导中国政情，因此积极建议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代价的。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午餐会上的谈话中曾谈到苏联需要与铁路有连接的不冻港。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动提出，他认为像俄国这样一块广大的陆地，理应有一个不冻港作为出海口。罗斯福立即以探询的口吻提出可以将大连辟为自由港的主张。斯大林对此非常欣赏，认为这个主张“将是不坏的”<sup>6</sup>。美方得知苏联有意参加对日作战之意图后，10月14日时驻莫斯科之美国军事使团团团长迪恩（John R. Deane, 1919-）向斯大林询问苏军何时可以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以及何时向日本开战。斯大林表示德国战败后，红军需要三个月才能对日本发动进攻。但斯大林提出美国必须满足苏军在西伯利亚集结之物质需求以及“某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莫斯科未能正式提出其对日作战的条件，当是

---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23.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与蒋介石分别于11月23日、25日会面，讨论有关亚太地区问题，其中中共与中苏关系问题上双方的看法略有不同。See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349-350.

<sup>1</sup>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51.

<sup>2</sup> Henry L. Stimson &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p. 618-619.

<sup>3</sup>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96.

<sup>4</sup>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页87-88、89、116。早在1943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斯（John P. Davis）致高思大使备忘录，谓中国政府不愿对日采取攻势，意在保持实力以备战后与中共作战，而依赖美国进攻日本。并指出中国军队士气低落，贪污腐败，政治派系纷争。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231。另外，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时，获知中国军队走私、营商，不能作战。甚至军民皆对中国政府全失信仰，军民之间亦不合作。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877。华莱士回国后如实报告，总统参谋团体对此感到忧虑，“恐影响整个大战”。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175。8月17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1880-1967）自纽约向蒋介石报告美方对中国的看法：“现在情形与太平洋战事初起时不同，因现在多数美国人心理，以为打败日本，不必一定需要用中国，其它盟国认我无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177。9月1日重庆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向蒋介石汇报与美国生产局局长纳尔生、赫尔利将军以及哈里曼大使会谈结果：“近来美国与之（苏联）交涉多予迁就，故希望中国也能持此态度，且宜趁此时机对苏联先有亲善之具体表示”。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182。1944年11月16日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与罗斯福会谈情况时称：罗斯福以为，“依据魏德迈的报告，中国军事前途悲观，军官多无现代军事知识，多半不能称职，部队体弱多病，营养不足，军械陈旧，无法应用，补充兵源缺乏”。“本人向认中国人力充足，今如此大所失望，过去役政绩效甚大，各省仍有一部分为军阀把持，鱼肉百姓，对政令阴奉阳违；美国目的在击溃日本，原拟利用中国人力，视察现情，实不可恃，颇觉忧虑”。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页202。有关当时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能力之衰弱详状，另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页236。

<sup>5</sup>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①①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页289。

<sup>6</sup>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61。另见罗伯特·西华（Robert Emmett Sherwood）著、李秋生译，《罗斯福与贺浦金斯：战时白宫秘录》（上海：上海中央日报社出版委员会，1948年），页216。

该条件有可能尚处在具体化的时期<sup>1</sup>。但是中国已悟知美、英为使苏军参战将牺牲中国之主权利益。10月14日重庆驻英国大使顾维钧（1888-1985）向蒋介石报告与美军高级将领会谈之内容：“询以苏俄参加将来战争问题，彼答想必加入，但料苏俄愿在远东取得旅顺不冻港，英比赞成，美亦无反对之意”。<sup>2</sup> 蒋介石对此非常关心，询问顾维钧“其用意何在”，顾维钧回电称：“以钧推测，美方曾表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俾促日寇之败，并探苏联之意。而苏联暗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条件之一”。<sup>3</sup>12月14日，哈里曼大使奉命会见斯大林，探寻苏联对日作战的意向。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出示了其作战条件，提出了4项具体要求：（1）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及库页岛（Sakhalin Island）应归还苏联，以保证海参崴（Vladivostok）之安全。（2）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应租与苏联。（3）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也应租与苏联。（4）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sup>4</sup>。1945年2月，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条件，宣布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与盟国并肩对日作战。2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 1890-1986）举行会谈，讨论苏联参战条件。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夺取的俄国原有权益，须予恢复，其具体内容即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应归还苏联；旅顺、大连港的租借所有权，应予恢复；在由中国继续保持东北地区完全主权之前提下，苏联在日俄战争（1904-1905）前所享有的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管理权，须予恢复。（3）千岛群岛须割交苏联<sup>5</sup>。斯大林并强调：“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sup>6</sup>为了保证这些条件的实施，斯大林特意要求在协议上写明：“三强领袖已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sup>7</sup>美方表示经修正后予以接受，但也列出七项要求<sup>8</sup>。当然有些条件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总而言之，苏联对日作战所提出的代价终于在1945年2月11日在雅尔塔举行的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上以秘密协议的形式得以认同<sup>9</sup>。当然，美国负有保证中国同意该条约义务<sup>10</sup>。美国官员对此似乎也有信心<sup>11</sup>。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各机构高官中在牺牲中国利益，促成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上已有共识<sup>12</sup>。

<sup>1</sup>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5）》，页406；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页258；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69.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39。顾维钧也曾告知国民政府，1944年10月华盛顿打算提供中国旅顺、大连为代价，要求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页661。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40。

<sup>4</sup> FRU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378-37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页233-235；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台北：外交部编印，2001年），页16-17。

<sup>5</sup> 有关苏联参战条件全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页231-232。

<sup>6</sup>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页162；罗伯特·西华（Robert Emmet Sherwood）着、李秋生译，《罗斯福与贺浦金斯》，页249。

<sup>7</sup>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页232。

<sup>8</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p. 897.

<sup>9</sup>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页258。

<sup>10</sup> 2月10日下午，三国就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问题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则提出对日作战之文件草案中关于保证兑现苏联条件之条文为：“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等条件应于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的予以履行”。而美方罗斯福与哈里曼要求修改为：“彼此谅解，此项协议上述有关港口及铁路者，应先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苏联方面也成功地在此条文上加上了“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建议之下，将采取措施取得此项同意”。See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766-770. 于是美国对苏联就负有实现协议的义务。

<sup>11</sup> 霍普金斯以为：“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任何权利的要求，那么，英美两国或许联合起来，强制执行该项条款”。See Robert Emmet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 867.

<sup>12</sup>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页188。

随着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出台后，美国方面开始担心苏联在东亚的真正意图。5月19日，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 1880-1965）在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将苏联比作纳粹德国。他预言，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战争，它将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和太平洋的霸主。“蒙古、满洲和朝鲜将逐渐纳入俄国的轨道”。“紧接着是中国，最后是日本”。<sup>1</sup>然而，美方军事要员虽然同意苏联有可能在东亚建立起势力范围，但是，却迫于形势对苏联无可奈何。1945年2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将军曾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官员说：苏联想占领整个满洲、朝鲜，可能还包括华北的一部分。但是他认为阻止苏联获取这些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必须坚持苏联以尽早进军满洲作为回报。当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 1892-1949）几天后在马尼拉见到麦克阿瑟将军时，后者更为强烈地表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不能有效地对抗日本，美国应确保苏联积极主动地对满洲国日军发起攻势，以拖住一大部分日军兵力。麦克阿瑟宣称，如果能使苏联人在东北亚投入大约60个师，美国军队就能较为容易地进军日本本土。直到6月中旬，麦克阿瑟仍然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积极推动苏联从西伯利亚发起进攻<sup>2</sup>。

美国方面也意识到，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中虽然没有列出新疆问题一事，但莫斯科仍会争取获得在新疆的影响力。在“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3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为罗斯福起草了一封有关苏联对中国政策评估的备忘录，谈到苏联会尊重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对中国整个领土并无野心；这种看法的依据是苏联势力已撤出新疆。针对外蒙古问题则以为，“承认外蒙古独立是出于军事保障，以免日本人进犯”。<sup>3</sup>哈里曼对苏联之新疆政策的看法在伊宁政府成立以及雅尔塔会议后有所深入和完善。哈里曼于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电中分析了苏联参与在新疆的目的和追求的目标：

（1）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意思是，早晚要从当地政府政策的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是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对地方当局的施政保持其幕后操纵的控制权，但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

（2）为了追求上述的目的，俄国人将毫不迟疑地运用惯用的方法，力取该地区政治权力。

（3）莫斯科并不匆忙行事，为审慎起见俄国人将优先大规模运用傀儡组织，除非危险确实超过绝对的可能性，不会采取行动。由于上述原因，苏联可能按照试探性的迂回方式重新伸张其势力。外界不容易看清它的变化方向。

（4）在一段时期内，至少主权问题属于次要地位。如果中国方面不太强烈地或者

---

<sup>1</sup> Joseph C. Grew, *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 1904-1945, 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2), p. 1446.

<sup>2</sup>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

<sup>3</sup>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5）》，页292。

单独地主张权力，从苏联立场看，保留中国主权不见得没有好处。早晚有一天，莫斯科会找到适当时机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压力，改变新疆地区的主权状况。

(5) 俄国的政策将始终如一地以消除该地区之西方势力和西方活动为目的。可以预期这种政策最后将用于对待西方官方代表和其他西方活动的表现上。

(6) 毫无疑问，俄国人在外交方面一定会在新疆居民和苏联的同族居民之间，继续广泛利用其同一种族的亲密关系。任何从苏联国内少数民族政策中获得的利益都将充分反映到苏联国境外的少数民族身上。

(7) 对新疆的贸易由俄国对外贸易垄断组织进行。和过去一样，大部分着眼于政治上的考虑。与落后民族做生意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树立一个普遍印象，使人们感到俄国消费品既便宜又丰富，而且苏联对外贸易机构还相当慷慨。<sup>1</sup>

无可置疑，美国方面已经了解到苏联在新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之所在。而重庆方面虽然自认苏联支持伊宁政府鼓励其独立，但为了获得美、英在新疆问题上的同情与支持，有意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而这与哈里曼对莫斯科的新疆政策之独特分析略有落差。美国方面因有求于苏联之对日作战，因此，在新疆问题上并未表现出其政策取向。而苏联在获得美国方面保证实现雅尔塔密约的承诺之后，也担心中国方面会拒绝美国。为使中国接受苏联所提出的对日作战条件，即雅尔塔密约中所规定的有关苏联在华利益的条件，莫斯科必须拥有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的筹码；该筹码还有二，一是中共，一是东突。

自雅尔塔会议结束发表公报后，蒋介石于2月8日在其日记中写到：“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sup>2</sup>，表现出蒋介石担心三强之间的协约会对中国不利。另外，蒋介石怀疑该会公报中只字未提东亚事务，认为一定有密约隐藏其中<sup>3</sup>。因此，积极展开获取密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在此期间，蒋介石已得知雅尔塔会议由密约签署，也获得大概内容。4月29日赫尔利再次拜会蒋介石，以私人身份告知密约内容：“（1）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划归苏联。（2）千岛群岛划归苏联。（3）承认朝鲜独立。（4）旅顺港租与苏联。（5）大连港开辟为自由商港。（6）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股权中苏各占一半，中国应承认苏联在该铁路的特殊利益。（7）外蒙古维持现状”。<sup>4</sup>最后，赫尔利告知蒋介石，在九十日内必须完成（1）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免苏联于某一事件发生后借口承认中共。（2）于苏联达成一个协议，解决以上各问题<sup>5</sup>。美国一直担心俄国会利

<sup>1</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pp. 995-997.

<sup>2</sup>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页674。

<sup>3</sup>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678。

<sup>4</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77-78。

<sup>5</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78-79。赫尔利将密约内容告诉江解释之后，于5月10日致电总统杜鲁门，认为有必要将密约内容正式告知中国领导人。See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865-868。5月12日杜鲁门回电赫尔利指示等待适当时机。See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868-869。即使如此，赫尔利于5月21日再次以私人谈话的性质向蒋介石口头详述雅尔塔密约内容。并强调“苏联当于参加

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发展其势力范围<sup>1</sup>。由此，作为因应措施，罗斯福希望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共联合政府，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因此，美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推动合作<sup>2</sup>。因此赫尔利有此提议。从宋子文（1894-1971）与美国战略情报官普尔（DeWitt C. Poole）于5月20日的一次长谈中也可以看出重庆政府对近来苏联的外交走向日益担心的心态。宋子文提到，中国方面担心的是满洲问题，中国注意到苏联军队沿着满洲边界的军事移动，担心苏联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进入满洲，又以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常驻满洲，并在满洲扶持亲苏政权；担心苏联支持新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在朝鲜扶植亲苏政权，以及支持中共。宋子文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是中苏谈判是否有所成效的关键<sup>3</sup>。5月23日蒋介石采纳王世杰建议，指示宋子文能够请求杜鲁门“向史（斯大林）剖切表示，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sup>4</sup> 5月25日宋子文又向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提出，苏联不能借口参加对日作战，而对东北三省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将此转告苏联政府<sup>5</sup>。蒋介石有意请美国主持公道，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

1945年5月下旬，杜鲁门遣其新顾问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 1890-1946）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讨论有关中国问题。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偕同霍普金斯于5月28日与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并不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担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蒋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sup>6</sup>斯大林还表示：“比之中国共产党，他倒宁愿准备和蒋介石打交道”。<sup>7</sup>在此一月前4月17日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氏曾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实现他们认为在中国所必须的和公正的改革，苏联没有援助中共，也不愿中国发生内战<sup>8</sup>。6月10日哈里曼晋见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斯大林在晤谈中表示同意哈里曼的意见，即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人物，应当予以支持。他还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人”<sup>9</sup>，以此使美国人相信苏联不会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因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曾表示，“有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政府（1）在战后时期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承认这一目标只有委员长（蒋介石）才能达到”。<sup>10</sup>苏联对蒋介石领导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之申明，在一定程度上释解了美国和中国对苏联的疑虑<sup>11</sup>。但是在解读莫斯科意图时或有“一厢情愿”之嫌。如美国官方声称斯大林对中国东北与新疆均无领土野心，而苏联

---

远东战争前夕，就以上诸事，与中国订一协定”。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46-547。

<sup>1</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p.737-738.

<sup>2</sup> 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p. 274.

<sup>3</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870-876.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47。

<sup>5</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48。

<sup>6</sup>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p. 115-116;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5; 罗伯特·西华（Robert Emmet Sherwood）著、李秋生译，《罗斯福与贺浦金斯》，页 273。

<sup>7</sup>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页 472-473、525。

<sup>8</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7;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pp. 338-339.

<sup>9</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97.

<sup>10</sup>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 1941-1946》，页 291-292。

<sup>11</sup> 实际上蒋介石对斯大林并不信任，对其有关中国的外交解释也不相信：“斯大林的‘苏联与共产党无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等论调，乃是一向遇有机会便背诵出来的宣传口号；至于他所谓仍愿与中国密切合作，则不过是要把雅尔塔密约使中国所受牺牲造成事实，作为其侵略中国的一个手段而已；他并且更打着这种‘友好’的幌子，意图迫使国民政府对共产党让步。盖这一类‘无关’、‘友好’、‘让步’等词汇，只是遮掩其赤化世界工作真相的假面具；然而，美国方面许多有关人士却漫不经心地受了那种宣传的欺骗，直到后来还是没有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四册，页 15。

方面的资料则仅称无领土要求<sup>1</sup>。然而，中国方面在得到莫斯科承认蒋介石为中国之领导、保证东北及新疆领土完整以及不支持中共的声明后，多少缓释了重庆对莫斯科的担心。因此，有学者断言蒋介石以为“为了避免中苏冲突，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他什么都可以同意”。<sup>2</sup>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6月2日副国务卿格鲁曾向出席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的斯退丁纽斯转达了杜鲁门的电报内容，谓通知宋子文，斯大林元帅希望7月1日以前同他在莫斯科讨论重要问题<sup>3</sup>。斯退丁纽斯以为应告诉宋子文有关密约内容，以便有所准备。杜鲁门认为等宋子文离美时由他亲自告知其内容<sup>4</sup>。6月9日宋子文如约谒见杜鲁门，得知密约内容。杜鲁门告知宋子文，有关内容已电传美驻华大使，将面呈蒋介石，因此，为保密起见，不必再传重庆。宋子文答应后双方就协议各项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商讨<sup>5</sup>。此外，宋子文曾询问中苏同盟条约的性质，是暂时同盟还是永久同盟？海军参谋长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 1875-1959）认为是对日作战同盟<sup>6</sup>。实际上，美国高官已道出中苏同盟谈判的目的和性质。同日，杜鲁门指示格鲁致电赫尔利，要赫尔利在6月15日正式将雅尔塔协议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纲要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蒋氏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而杜鲁门本人支持这个协议<sup>7</sup>。实际上，赫尔利于6月10日已将有关内容告知中国政府<sup>8</sup>。

不久，莫斯科为实现在中国的利益启动了其战略步骤。1945年6月12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阿波隆·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罗夫（1907-1949；1945-1948年间曾任苏联驻华大使）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向蒋介石摊牌，提出了苏联政府对日参战的先决条件：

-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 （5）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sup>9</sup>

如主席同意上述基本条件，则苏联准备即刻开始关于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谈判。即此项条约之缔结，即等于苏联对日作战<sup>10</sup>。

1945年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

<sup>1</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 494。

<sup>2</sup> 弗朗西斯·克里佛德·琼斯（F. C. Jones）等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 年的远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页 263。

<sup>3</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891-892.

<sup>4</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893-894.

<sup>5</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55-557。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56。

<sup>7</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897-898；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8。

<sup>8</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 101-102。

<sup>9</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20-724。

<sup>10</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59。

中国问题的立场。霍普金斯与史达林会面得道的印象是：苏联“对外蒙及新疆毫无野心”<sup>1</sup>，斯大林告知霍普金斯，“余之军事专家，曾无一人根据战略原因，认为苏联必须取得新疆”<sup>2</sup>。斯大林并向霍普金斯做出解释：“过去虽曾发生种种事件，若干错误或应归咎苏联，若干错误或应归咎中国，但苏联并不需要新疆”。“大连可由中苏共同管理，甚或由中国单独管理，均属可能；苏联希望长期租借旅顺和东北铁路”。<sup>3</sup>斯大林在秘密协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建立的同时，又强调其对新疆无野心，相反，隐现出其对新疆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对新疆无野心”的表白下又要求其在满洲的各种利益，犹告中方，以脱手新疆换取满洲之利益，望中国择其一而从之。为了达成此目标以及以法律形式保障其利益，斯大林希望宋子文于1945年7月1日前来莫斯科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8月参加对日作战<sup>4</sup>。6月14日，宋子文再次与杜鲁门总统会晤。他声明：“租借旅顺、大连系问题之症结，我国人民饱经忧患后，不愿在中国有任何租借地的存在。杜鲁门则说，他‘现在的首要利益是设法使苏联在足够的时间内参加远东战争，以有助于缩短战争并从而挽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sup>5</sup>并称美国和英国同意支持雅尔塔协议。宋子文见美国已亮出底牌，知事态已无法挽回，只好于6月15日启程回国。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正式将有关〈雅尔塔协议〉内容通知蒋介石。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为机密的〈关于中国政府和苏联协议纲要的说明〉之备忘录，并附有雅尔塔密约的全文。备忘录的内容是：

- (1) 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统一。
- (2) 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
- (3) 斯大林期待中国达成统一、安定，希望满洲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
- (4) 对于中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为了和日军作战而进入中国领土的苏联军队，尊重中国主权。
- (5) 为使中国便于在满洲组织行政组织，欢迎蒋主席的代表和苏联军队同行进入满洲。
- (6) 斯大林同意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倡的门户开放主义。
- (7) 斯大林同意朝鲜由中、美、英、苏四国托管。以下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条件（即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所呈之参战条件相同），尚能全部同意，苏联即可于8月对日开战。<sup>6</sup>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5。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5。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5。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5；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 1941-1946》，页 472-473。

<sup>5</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920.

<sup>6</sup>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一册，页 42；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67-568。另见梁敬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影响》，《中美关系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 33、35。

赫尔利并且告诉蒋介石，雅尔塔协议将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sup>1</sup>。“中国了解，以局势而言，苏俄投入远东战争是迟早的。苏俄既不可能完全放弃其对中国及远东之侵略企图，而英、美也不会为中国而得罪苏俄这一潜力无穷的对手，因而，在外交上中国必须与苏俄维持某种形式的友好关系”。<sup>2</sup>

面对强权施压被迫接受其秘密协议所带来的悲愤可以想象，但在联美抑苏的策略失败后，蒋介石只得面对现实，向苏让步，同意谈判。6月26日，蒋介石会见彼得洛夫大使，表示他即将派宋子文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sup>3</sup>。据陈立文的分析，当时中国正处在中、美日渐交恶，中、苏关系紧张，美、苏紧密勾结的整体局势，深感若提出异议，美国必将因中国拒绝雅尔塔协约而迁怒，甚至断绝对华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约的存在，反有支持其达成全部要求之义务。中国在国际上之孤立，将注定外交交涉之必然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力必利用中国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约笼统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国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而造成更混乱之局势。那时，中国必将既无力以本身之兵力与苏俄对抗，也无法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反之，中国若依照美国之要求，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一方面可以条约来限制苏俄的侵略步伐，二方面可使美国无法置身事外，对中、苏间可能发生之纠纷视而不睹。因此，与苏俄间签订友好条约对中国“虽然不是保护国运‘充足的’，然却是‘必要’的”。<sup>4</sup>所以，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不得已而为之。

## （二）中苏谈判，战略利用“东突”

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胡世泽（1894-1972）、蒋经国（1910-1988）、沈鸿烈（1882-1969）等人，于6月27日自重庆启程赴莫斯科，与苏联领袖斯大林展开了月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苏联方面谈判人员由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 1878-1952）以及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pollon Aleksandrovich Petrov, 1907-1949）和翻译巴甫洛夫（V. N. Pavlov）等组成。该项谈判前后共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6月30日起至7月12日止，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因斯大林与其外长莫洛托夫须于14日启程赴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宋子文亦欲乘机返国请示，会议暂告中断。第二阶段自8月7日起至同月15日止，双方共会谈四次；卒于8月15日正式议定并由国府新任外长王世杰与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sup>5</sup>。中苏双方都严重低估了这次谈判的难度，中苏内部预定在一周内可以签署条约。然而，中苏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首先在外蒙问题上相持不下<sup>6</sup>。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sup>7</sup>。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在斯大林来看，“外蒙古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

<sup>1</sup> FRUS, 1944: China. Vol. VI, p. 907. 杜鲁门为什么指令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1945年6月15日方能通知中国政府，不得而知。赫尔利早在两月前就泄密于蒋介石，不逮6月15日提前5天将秘密协议之详情告知蒋介石；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 A. Petrov）也不等到6月15日而于6月12日向蒋介石呈上对日作战之条件。赫尔利本人也不知6月15日又什么特殊意义。See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00-901.

<sup>2</sup>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页190。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71。

<sup>4</sup>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页207-208。

<sup>5</sup> 梁敬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及影响”，《中美关系论文集》，页36-48。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76-590。

<sup>7</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49、77-79。根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外蒙在1945年独立以前，向属中国，但久为俄国垂涎，争议甚久。依两国于1915年与外蒙古共同签订的条约，后者对内完全自主，但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后中苏两国于1924年的条约中，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国完整之一部，究其之所以有如此变动的原由，全因因应有关各国的国势，而调整外交政策的结果”。董霖，《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25-26。

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sup>1</sup>斯大林以为，“外蒙古人民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彼等要独立，为中国计，割去蒙古，实较有利”。“如此问题不能实现，外蒙将统一所有自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sup>2</sup>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sup>3</sup>。

7月3日至4日宋子文电请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并认为“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祇可中止交涉”。<sup>4</sup>7月5日，国民党中央举行高级官员会议讨论对中苏谈判的条件。次日，蒋介石把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电传宋子文，要求其在谈判中切实交涉。电文称：“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sup>5</sup>蒋介石及其阁僚商议后提出承认外蒙古的四个条件：

（1）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由中国主管，军港可以和苏联共同使用，但不是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按照各国自由港管理的范例使用，但行政权由中国主管。中东铁路可以同苏联共同经营，但不是双方共同管理。

（2）新疆的伊犁和整个新疆沦陷区必须完全恢复，中苏双方应依照以往的协议共同在边界地区清剿土匪。阿尔泰地区应属新疆。

（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由中央统一指挥，按照各国政党和国家法令的原则，政府将一视同仁，正式召开国会。政府改组时可容纳中共进入行政院。

（4）中国必须统一到如此程度才可以按三民主义原则主动提出外蒙古问题，计划由外蒙古人民用投票的方式解决。如果投票结果是外蒙古独立，那么政府将正式提请国

---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78。另外 1945 年 7 月初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并归俄国，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斯大林并且拿出地图指着说“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斯大林虽然不认为日本和中国将来会成为这个“军事力量”，然而对美国有所担心。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册（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2 年），页 234-238；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76；《蒋总统秘录》，第一册，页 47；蒋经国，《负重致远》（台北：幼狮书店印行，1976 年），页 67；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年），页 111。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78-579。

<sup>3</sup> 有关莫斯科分离外蒙古之策略和经过，See Christopher P. Atwood, “Sino-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Mongolia, 1945-1946,” in Stephen Kotkin & Bruce A. Elleman,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9), pp. 137-162.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3。

<sup>5</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46-748。

会正式通过后，方可宣布独立，但必须是在抗战结束之后。<sup>1</sup>

很明显，中苏交涉外蒙古独立的代价是换取东北及新疆的领土主权之完整和制止支持中共<sup>2</sup>。也可以理解为苏联利用东北、新疆及中共问题之筹码胁迫国民政府接受外蒙古独立之现实。由此可知，新疆为中国统一必须达成的四条件之一<sup>3</sup>，因此，新疆对于中国之国家利益高于外蒙古。

同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子文，指示其遵照前电所详示，斟酌当地情势相机行事。但东三省与新疆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方针固不能变，在此方面必须有书面确实保障。并指示，“对中共问题必须与其（苏方）割切约束”。<sup>4</sup>宋子文在7月7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艰苦周旋了45分钟，始终没有突破外蒙古独立之问题<sup>5</sup>。就在这次会谈后，即7月7日宋子文又接到蒋介石指示：苏联在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以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惟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决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恐不出空洞笼统之故套”。“故对苏联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割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其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也”。<sup>6</sup>蒋介石于7月7日又特别嘱咐宋子文，强调中国牺牲外蒙古利益，“惟望苏联亦能了解余之诚意与志愿，对我国所要求之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之支持，能下决心作具体之答复，期得两国久远与根本之合作也”。<sup>7</sup>7月8日的中苏谈判，具体讨论了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形式和书面承诺等问题。在谈判之前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询问：“如史（斯大林）对新疆及中共问题有切实具体谅解”，有关东北问题各节“可否照提”。<sup>8</sup>由此可知新疆与中共问题在中苏谈判中举足轻重的作用。7月9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允诺苏联关于外蒙战后独立之条件<sup>9</sup>。据宋子文7月9日致蒋介石电：“今晚见史大林（斯大林），职首将钧座对外蒙问题指示告史，并说明中国为中苏永久和平与合作，故忍痛牺牲。中国政府在战事结束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其承诺方式，容再洽商。史甚表满意，并同意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斯大林对国民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在新疆以及中共问题上也作出了表示：“（1）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职告以中国政府收复陷区，当恩威并施，如和平方法不能解决，则当用武力，史（斯大林）认为甚然。（2）有关中共问题，苏联承认中央政府，不供给武器与共党”。<sup>10</sup>

7月9日中苏双方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籍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4。

<sup>2</sup> 7月5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谈到有关放弃外蒙古的想法：“斯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议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绝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履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46。

<sup>3</sup>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页 320。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5。

<sup>5</sup> 有关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三次谈判内容，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9-604。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6；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51-752。

<sup>7</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97；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 117-118。

<sup>8</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05。

<sup>9</sup>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54；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06-607。

<sup>10</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09。

之答复”。<sup>1</sup>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为：（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为了中苏共同的利益出发，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为20年；旅大的行政管理权应属于中国，目的是保证中国在满洲的主权真正完整。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可以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但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经营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为20年。（2）新疆在最近一年内发生叛乱，导致中苏交通中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切盼苏联能按照以前之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使得贸易交通得以恢复。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该仍然是新疆的一部分。（3）中国共产党有自己单独的军事和行政组织，由于其军令和政令未能归中央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和物资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sup>2</sup>。蒋介石在提出上述三个要求外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sup>3</sup>蒋介石同时在电报中对外蒙古的疆界范围做出明确划定，即以中国旧地图为准。

以下为宋子文与斯大林之间第四次谈判有关新疆问题的谈话纪录（1945年7月9日下午9时至10时40分）：

宋：关于新疆，阁下能助吾人平抑变乱否？

史：如何，派遣军队乎？

宋：否，现在边境有军械之走私，吾人盼阁下设法制止之。

史：吾人无权干涉。

宋：非在中国境内，而系在边界。

史：中国将对当地人民予以若干权利否？

宋：然此为一政治问题，亦为军事问题。

史：局势如此严重乎？

宋：伊犁已为叛军所占领。

史：系畏吾尔（维吾尔）人乎？哈萨克人乎？

---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09。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10-611。据新疆监察史罗家伦索的观察，1940年以前印制的苏联地图上阿尔泰山地区划入中国版图，至1941年以后印制的地图上该地区皆划入苏联版图。见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242。可见莫斯科自1941年有意将阿尔泰山地区并入蒙古。阿尔泰山旧属科布多（Qobto）参赞大臣管辖，隶属镇守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1905年，阿尔泰山从科布多析出，设办事大臣，直隶中央政府。1911年，沙俄鼓励外蒙古独立，因举兵东侵科布多。新疆督军杨增新（1863-1928）将军遣派三个营精锐部队驰援，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陷落。1913年6-7月，外蒙军队进犯阿尔泰山，遭遇新疆省军还击，守住了阿尔泰山。1919年应新疆督军杨增新的要求，北京政府撤阿尔泰山办事长官，置阿山道，并入新疆省。苏联、外蒙要求阿尔泰山归属外蒙古，其因即阿尔泰山原属外蒙古之科布多之故。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11。

宋：其混杂甚繁，吾人愿善待所有民族，此为应付各民族唯一之方法，但吾人希望恢复叛军所占领之土地。

史：此为合法之愿望，最好之方法为予以权利、吾人有各种不同之民族，倘不承认其最低限度之权利，纠纷将永无底止，但此为中国本身之问题。

宋：余同意此点，对于民族居少数之处理，不少地方吾人可向苏联学习。吾人愿作若干让步，但如不继之以服从，吾人必须引用武力。

史：此为当然之事，叛民意图脱离中国乎？

宋：彼辈宣布一所谓新共和国。

史：吾将搜集情报，吾人或将再谈一次，关于禁止边境私运军械一节，吾人之职责应防止之，倘确有若干漏卮，吾人愿为所能为以赴之。

宋：叛民所配备之军械甚佳，为彼辈前所未有者。

史：今日君随处可以获得军械。

宋：但非在新疆。

史：何故？

宋：因交通困难之故。

史：印度不致出售军械否？

宋：凭可靠情报，不知有此。

史：两国作战之时，甲国恒供给军械于乙国之叛军。

宋：在新疆运输实属困难。

史：阁下以为军械系由苏联输入否？

宋：可能有此。

史：甚少可能，容改日再谈。

宋：余盼得一保证，阁下将尽一切可能禁止私运，我方当设法以和平方法克服叛乱。

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若干法国军火工厂供给武器于德国，贵国官吏不致以高价出售军械于叛军否？

宋：余有一答案，阁下可以置信，即叛军所持有之军械，较中国官吏所有者为佳。

史：阁下似较余更为明了。

宋：吾人曾收集爆炸后之炮弹，吾人发现吾人并无此种炮弹，余深知阁下极愿助我解决此项困难。<sup>1</sup>

尽管这次有关新疆问题谈判未有实质性的结果，斯大林也表现出心明而不知的态度，然而中国方面已将其要求明确提出，促使苏联方面关注该问题。虽然斯大林就有关新疆问题保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sup>2</sup>，然而在解决“新疆独立”问题上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因此，蒋介石对苏联的有限承诺仍有担心，希望能有书面保证。宋子文于7月11日致蒋介石电称：“东北、新疆、中共三点，俟一切问题双方商妥后，史（斯大林）允以书面表示”。<sup>3</sup>至此，国民政府在新疆问题上已获得莫斯科的初步保证。实际上，国民政府在谈判前就为解决新疆问题已做了一些准备。6月20日宋子文，在重庆就目前新疆存在的问题与吴忠信会商，决定电召特派员刘泽荣（又名刘绍周，1892-1970）来重庆，同赴莫斯科<sup>4</sup>。6月24日蒋介石表明了其对解决新疆问题的观点：“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合作”。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谈判九条要点，作为中国代表团对苏交涉之基本方针。其中第六条涉及新疆问题：“中国在新疆省将与苏联谋经济上更密切之合作，但对于新疆各民族待遇问题，当自求解决，至于新疆之西北部叛变迭起，其他地区皆与苏联之边境连接，且与苏联境内民族有关，应照旧日协议对中苏国境沿边之匪徒共同助剿，相约双方不得收容其对方叛徒，更不得卖给武器与弹药”。<sup>5</sup>另外宋子文在莫斯科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提到要与苏联谈判新疆问题。据哈里曼于7月3日致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 1879-1972）电中称：“中国方面有可能考虑在中苏谈判初期提出新疆问题。然而，没有讨论新疆的问题，但是宋子文告诉我（哈里曼），委员长正在考虑指派他的儿子（蒋经国）任新疆省长，因为他对苏联抱同情态度，相信这样可以改善关于这个省份的对苏关系”。<sup>6</sup>但是，苏联方面迟至7月9日因中国方面提出该问题后，方有以上“不知情”之推诿答复。而伊宁方面在此期间积极向南疆和塔城进兵，拓展其势力，全面展开其三线作战计划<sup>7</sup>。由此可推知，莫斯科有意迫使中方被动提出新疆问题之策略，无疑是要掌握在该问题谈判上的主动权，迫使中方同意苏联在满洲以及大连和旅顺港口的重要利益。为达到此利益，苏联也用同样方式打中共牌。如中苏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17-619。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09。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22。

<sup>4</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81。另外，6月29日美国驻迪化领事华德瑞拜访新省主席吴忠信，表示杜鲁门总统已帕特使霍普金斯赴莫斯科，伊宁事件可望不复扩大。新疆三区革命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81。

<sup>5</sup>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 734-737。

<sup>6</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14.*

<sup>7</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82-84。

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称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又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以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sup>1</sup>。即斯大林利用中共和新疆问题以及保证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做为政治诱饵，诱使国民政府接受其在外蒙古和东北三省利益之策略跃然纸上。因而，“（苏联）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sup>2</sup>

因美、英、苏三国领袖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三方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中苏谈判进入休会期间（7月13日至8月6日）。然而，中苏谈判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仍然在会外进行。1945年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强调：“为增进中苏友谊，为消除障碍中苏友谊合作的原因，虽然牺牲很大，我可克服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不过这样的决定，将使中国政府陷于困难的地位，所以同时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我国牺牲之重大”。<sup>3</sup> 蒋介石同日将此想法与杜鲁门总统分享：蒋介石致杜鲁门的电报称：“（1）为了中国的行政与军事统一起见，苏联不得给与中国共产党任何精神或物质的支持，任何对中国的支持只限于给与国民政府；（2）尽可能支持中国平定新疆的叛乱；以及（3）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完整和主权”。<sup>4</sup> 蒋介石致杜鲁门电中强调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议的要求，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sup>5</sup>。然而，同月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19日的电报说：

“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议，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议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议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sup>6</sup>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也有所不满；同时也有鼓励国民政府保障其利益的作为。实际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不仅对中苏每次的谈判细节都详加汇报，而且从7月3日至13日所送上的报告中力谏杜鲁门当局认识到苏联对中国的野心，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进行解释，以帮助中国政府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sup>7</sup>。杜鲁门总统尽管仍然拒绝“仲裁”中苏谈判，但还是在中苏围绕“维持外蒙古现状”问题争执不下时授意哈里曼向宋子文私下解释：“您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确认您的理解，即就本政府而言：我们没有对与外蒙现状有关的雅尔塔决议条款进行过解释和讨论。鉴于此，应当接受的书面意思就是维护外蒙古现有的司法状态。……我们对此的理解是，‘现状’是中国仍然维持对外蒙古法理上的主权，而实际上并不运用这一主权”。<sup>8</sup> 杜鲁门的这一指示更显示了美国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自雅尔塔会议以来一直恪守的中立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政府的这种变化盖与其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577-588。

<sup>2</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 225。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36-63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八《谈话》，页 188-189。

<sup>4</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48.

<sup>5</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48-949.

<sup>6</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50. 这份回信由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的。据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解释，起草的这份回信，其目的是想借中苏谈判拖延苏军参战的日期。贝尔纳斯的私人助理布朗（Walter Johnson Brown, 1903-1995）对这份回信的意图有独特的解释：“杜鲁门响应了蒋介石的电报，说他不希望中国屈从于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JFB（James F. Byrnes）仍然在争取时间，相信原子弹之后日本会投降，那么苏联就不会在战争胜利时在现场出现并从中大大获益”。See Gar Alperovitz,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pp. 267-268. 从第二阶段中苏谈判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方面并没有领会贝尔纳斯的意图。

<sup>7</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10-934.

<sup>8</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14-915;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48-950.

有关，因此，美国一味迁就苏联的态度有所改变。美国在第二阶段中苏谈判未开之时，一改过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介入了中苏谈判。在美国的干预下，莫斯科主动就苏联参战以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做出了正面表态，同时苏方在谈判中在某些议题上做出了一些相应的策略性调整。然而，国民政府方面没有完全解读美国在中苏关系中微妙变化。在第二阶段中苏谈判之前，当贝尔纳斯从赫尔利通报得知宋子文要辞去外交部长并表示不愿再赴莫斯科的消息后，亲自致电宋子文，鼓励宋子文尽快联系有关事宜并早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sup>1</sup>，但他没有告诉宋子文真实意图，相反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James Vincent Forrestal, 1892-1949）。据《弗雷斯特尔日记》（The Forrestal Diaries）7月28日的记载，贝尔纳斯说他最渴望的是想在俄国人进兵满洲之前结束日本事务，他特别提到了大连和旅顺港，担心苏联人一旦进入满洲，再将他们弄出来就很不容易了。在美国历史学家奥珀罗维特兹（Gar Alperovitz, 1936-）来看，正是因为怀着这种考虑，贝尔纳斯倾向于宋返回莫斯科以便使得这一议题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sup>2</sup>。贝尔纳斯本人在1957年接受美国历史学家菲斯（Herbert Feis, 1893-1972）对他进行采访时，谈及曾试图鼓励宋子文延长谈判直至美国结束战争的策略<sup>3</sup>。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需要苏联对日参战。自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后，杜鲁门曾询问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以为，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靠苏联来帮助征服日本，但有苏联的支持将有助于加快胜利的到来，美军伤亡将会减少；而且，无论如何苏联要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sup>4</sup>。同时，美国也担心战后俄国在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地区发展势力，当哈里曼汇报苏联进兵中国东北计划时，罗斯福总统担心地问道：“如果俄国人进去了，还肯出来吗？”<sup>5</sup>罗斯福有此担心也有其所本，因为他知道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sup>6</sup>。因此，在罗斯福的认知中，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sup>7</sup>。而且，美国断定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稳定的基础<sup>8</sup>。

在这种背景下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中苏重开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在东北长驱直入。而中苏谈判因在外蒙古边界划线问题争持不下时，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地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sup>9</sup>该日谈判中，也涉及新疆问题。在讨论到关于东北和新疆问题的共同声明的条文时，王世杰建议附上以下内容：在新疆发生混乱的情况下，于必要时，中苏两国政府将进行合作。而斯大林则反驳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人在新疆，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苏联不打算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sup>10</sup>与此同时，自8月初，伊宁民族军在南北疆展开全面攻击，除乌鲁木齐外其他各地都面临打击的危险<sup>11</sup>。8月10日中方再次在新疆问题上获得苏方的承诺，因此，宋子文、王世杰等致电蒋介石称：“关于撤兵事，及不干涉新疆内政，尊重东三省主权，与苏方一切援助只能给予我中央政府诸项，苏已同意照此表示”。<sup>12</sup>8月13日宋子文、王世杰致蒋介石

<sup>1</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948-950.

<sup>2</sup> Gar Alperovitz,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p. 274.

<sup>3</sup> Gar Alperovitz,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p. 268.

<sup>4</sup> 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80.

<sup>5</sup> William Averel Harriman &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 370.

<sup>6</sup>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页721。

<sup>7</sup> 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 p. 267.

<sup>8</sup>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356-357.

<sup>9</sup> 弗朗西斯·克里福德·琼斯（F. C. Jones）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页272；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68.

<sup>10</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181。

<sup>11</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91-94。

<sup>1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645。

的电文中也有同样的语句<sup>1</sup>。同时，在苏军进兵东北的现实之下，蒋介石开始担心共产党军队将随之进入东北，所以又指示宋子文、王世杰尽快结束中苏谈判。8月12日和13日蒋介石授权宋子文、王世杰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有关未决事项<sup>2</sup>，并且竭力主张“苏俄对于不援助中共，尊重中国东北主权的完整，不干涉新疆内政，规定俄军自东北撤退期限，须提供保证”。<sup>3</sup>宋子文、王世杰等又在大连问题上以及在其他协议的细节上作出了让步。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以后，在中-蒙边界划线问题仍未获结果。据王世杰8月13日致蒋介石电文中声明道：“职又请其派人立即来渝划定图界，史氏亦认为不可。史氏始终亦未自行提出苏方外蒙地图，窥其原因，不外二者：一则苏方预计彼之地图即边括新疆一部份领土，当非驻华大使所能接受，揆之实际，我确不能于放弃外蒙领土之外，复放弃任何新疆领土。二则唐努乌笃（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现则已成苏联另一属国。总之，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成果，不胜惶恐”。<sup>4</sup>

历时月余的中苏谈判终于在8月14日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4项附加协议也于15日在莫斯科签订<sup>5</sup>，苏联保障了其在雅尔塔协议中所获得的在华利益，有些部分超出了雅尔塔协议所限之利益<sup>6</sup>。（1）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日本战败后，倘外蒙古经公民投票愿意独立，中国政府将予以承认；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任监事长和路局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2）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满洲）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自中国撤退，最多三个月为完成撤退之期。中苏条约有效期为30年。但事后史实证明，苏联所允诺于国民政府者，并未实现。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将于欧战结束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因此苏联政府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苏军兵分三路，长驱直入中国之满蒙地区。14日，日皇裕仁正式发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诏书。至23日，苏军已将中国之东北全部及热河之承德、察哈尔之张家口等地占领。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完全自中国撤出；日本政府系于9月2日向同盟国签署降书，故1945年12月3日，应即为苏军完全自中国撤出之期限。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苏军于1946年5月方撤出满洲<sup>7</sup>。

但是，苏军自占领满洲以后，阻挠国民政府军进入东北，却暗中培植中共在东北之势力，直接间接影响及于其后国共双方对东北之争夺与控制，构成了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sup>8</sup>。据栗国成的研究，苏军进兵满洲期间（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为中共壮大提供了有力条件：

（1）支持中共势力进入东北：除培植中国东北亲苏势力外，兼以作为要挟平衡国民政府的一项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48。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46, 649-651。

<sup>3</sup>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页 104。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50。

<sup>5</sup> 有关条约全文和照会以及附件，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52-668；有关分析可参考梁敬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中美关系论文集》，页 35-48。该条约于8月24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分别通过。25日中苏分别批准该条约，27日条约全文公布，见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 384、386。有关详情见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页 152-154。

<sup>6</sup> 蒋永敬，《中苏同盟条约之谈判》，《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页 497-503。

<sup>7</sup> 栗国成，“张嘉璈与战后初期中苏关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谈判（1945/10-1946/4）”，《政治科学论丛》，期 19（2003年12月），页 142。据蒋介石的观点，“苏军之所以盘踞东北不撤，有两点目的：一点是为了任意劫掠；另一点，是要把东北交给中国的共军”。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四册，页 46。

<sup>8</sup> 张其昀，《大陆沦陷的痛史与光复大陆的努力》（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页 1-14。

工具。但就苏联在雅尔塔协议后所形成的新国际情势之下看，她对中共的支持程度，是有若干抑制与保留的。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并未放弃承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主体地位。（2）阻碍迟滞国民政府军队顺利进入东北：一方面方便苏联卵翼中共势力在东北成长，拆迁日人在东北所遗留的工业设备；一方面亦藉此要挟国民政府允诺“东北经济合作”，兼以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3）总的来说，苏联战后在东北的作为，就是要恢复1905年以前，东北是帝俄势力范围的特权。这些特权一大部份已由雅尔塔协议给予了保证；由此而衍生出的其他需求（如在中国东北培植亲苏势力，独占东北之经济利益等），正是以上一、二两项作为的真正目的<sup>1</sup>。莫斯科虽然在中苏谈判中一再重申不支持中共以及承认国民政府的代表权，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其所言。中共牌已开始演变成为莫斯科对国民政府以及美国在华势力之外交策略的一个筹码。据牛军的分析，苏联在中苏谈判中的方针是依靠苏军参战造成的优势地位和与美国协调远东政策的影响，利用国民党对中共迅速发展的恐惧心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雅尔塔协议划定的格局，防止战后因美国涉足而使东北再次变成反苏基地<sup>2</sup>。

国民政府同意签订中苏条约特别是承认外蒙独立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苏联应“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sup>3</sup> 斯大林自然答应了这一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sup>4</sup>同时，斯大林针对国民党的一党政治体制则指出，在中国政府中，“国民党因历史关系，当然应居领导地位，但政府如不容纳前进分子，困难无法消除，实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袒护任何党派”。因此，“政府对前进分子（不仅共党），宜加容纳”<sup>5</sup>，当时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至于国民党不愿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之原因，斯大林则表示谅解，认为“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因为“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sup>6</sup>此外，斯大林意有所指地告诉中方：“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国民党自不出此，如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sup>7</sup>实际上斯大林犹知可利用中国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坚信：“尽管共产国际已经正式解散（1943年5月15日），莫斯科仍然对延安起领导作用”。<sup>8</sup>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就把苏联承认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以及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作为自己接受雅尔塔协议中有关中国条款，特别是承认外蒙独立。对此美国方面也有相似的解读。美国务卿贝尔纳斯曾在1945年8月11日，就拟议中的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协议上，有关使用措辞的问题作出了响应，“虽然这是一件我们不能以官方出面干预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该协议的措辞必须是明确的，使之足以确定日后苏联政府的态度不会出现异议。我们觉得中国政府的让步所能得到的唯一补偿，是使苏联政府明确保证不支持中国国内的持不同政见分子”。<sup>9</sup>

除利用“中共牌”达成在满洲的战略利益之外，莫斯科也利用“东突牌”增强其获取在华利益的作用。苏联政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虽然没有与新疆问题有关的条文，但在莫洛托夫的照会第三条中明言“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

<sup>1</sup> 栗国成，“张嘉璈与战后初期中苏关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谈判（1945/10-1946/4）”，《政治科学论丛》，页170-171。

<sup>2</sup> 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期1（1987年），页218。

<sup>3</sup>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736。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609。

<sup>5</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77。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588。

<sup>7</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609。

<sup>8</sup> 安德烈·梅福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A. M. Ledovski）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页365。

<sup>9</sup>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969.*

中国内政之意”。<sup>1</sup>而条约第五条则称：“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设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sup>2</sup>这也是宋子文和王世杰等努力的结果<sup>3</sup>。虽然照会明言苏联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但是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当日，攻打南疆战线的伊宁民族军开始实施打通连接南北疆之战略要地穆扎尔达坂（Muz-art Davan）的战役；8月17日伊宁政府在南疆与中亚塔吉克斯坦接壤的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建立自治县政府；8月中旬苏联顾问团抵达蒲犁访问；8月19-25日间塔什库尔干地区的伊宁民族军游击队整编为正规部队；25日新疆省主席吴忠信致电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1902-1998）称：“欲收复失地，恢复秩序，亦非加强空运及有远程轰炸机或其他有效实际办法不足挽回危局”<sup>4</sup>；26日国民党守军弃哈巴河县城撤往承化（1954年改为阿尔泰县，1984年设为阿尔泰市）；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时，申明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同情和声援，要求国民党放弃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同日伊宁南疆民族军开始攻打阿克苏；28-29日塔城骑六团和蒙古独立营切断了通向乌苏的交通要道；8月30日至9月11日伊宁南疆民族军加强了其攻势；8月31日蒲犁民族军攻下通往莎车、英吉沙、喀什等地的交通要道托依布伦，分别进攻以上各城<sup>5</sup>。9月初，苏联飞机帮助伊宁民族军轰炸精河、乌苏等地，蒋介石随即约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 1897-1989）商讨对策，“彼等极愿派员参加调查真相”<sup>6</sup>。另外蒋介石就此事件要宋子文“在英美相机切商”。<sup>7</sup>然而未得其果。至9月上旬民族军中线占领精河、乌苏之后开始挺进新疆省府迪化。伊宁民族军在距迪化150公里处的玛纳斯河整兵待发，二日可抵迪化，解放全疆，胜利在望。而迪化驻军兵力只有六个营（包括军校学生），也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其粮食储备可支十日，步枪、机枪子弹仅有一百余万发。事态严重，前途不测<sup>8</sup>，迪化“有疆朝不保夕之势”<sup>9</sup>。面对这种局面，新疆驻军司令朱绍良一日之内向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告急求援：“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上报党国”。<sup>10</sup>外交部开始考虑可撤英、美、苏领馆人员至哈密或兰州<sup>11</sup>。国民党高层对苏联支持伊宁民族军的做法亦深有感触，9月14日国民政府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白崇禧在会上指出，“全疆危在旦夕，是诚可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墨迹未干，而情况逆转如此，出人意料之外”。<sup>12</sup>蒋介石也曾于9月8日思考对策时，对事件“始甚惊骇愤激，继则依据理智研究，渐臻平定，最后乃一本于理处之，而以祸为福”。<sup>13</sup>蒋介石一方面派参谋长郭寄峤去新疆助阵，一方面指示新疆驻军司令朱绍良和新疆主席吴忠信“通令各级军民长官，如无令擅退者，不论何人，皆照临阵脱逃论罪”。<sup>14</sup>9月10日蒋介石处理新疆问题的方针出炉：“（1）新疆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55。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 654。

<sup>3</sup> 据陈立文教授对协定之此段的研究认为：“在此点上苏俄虽有避重就轻之意，但在宋的坚持下卒有此明文规定，惟文字之约束原必须视双方之诚意，苏俄苟无心践约，再则具体之文字亦属无效；苏俄真愿与中国和平共处，则不干涉中国内政一语已足够矣”。即“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始终将重点置于外蒙、旅大及铁路之实质厉害，而对此数点（中共及新）较原则性之问题，只在获取苏联的首肯与承认”。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页 323-324。

<sup>4</sup> 337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95。

<sup>5</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95-99。

<sup>6</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 762。

<sup>7</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 764。

<sup>8</sup>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 425。

<sup>9</sup> 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322。

<sup>10</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105-106。

<sup>11</sup> 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 313。

<sup>12</sup> 唐纵，《唐纵日记》，页 53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109。

<sup>13</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 762。

<sup>14</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 762-763。

极抵抗。(2)外交与宣传只作应有与合理之表示,而不加以刺激,勿使其有借口。(3)对新疆政治与宗教之改革,则作积极之准备,此时应以全力接受东北与各省市军政第一要务也”。<sup>1</sup>即为了东北问题,新疆即使丢失,也不作积极之抵抗。而且也不能公开苏联为支持独立分子轰炸乌苏、精河之行为<sup>2</sup>。蒋介石曾在9月9日的日记中对当时的局势有所感慨:“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新疆、外蒙问题“亦未解决”,使他感到“万分忧辱”<sup>3</sup>。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媒体也猜测国民政府将会以外蒙古独立方式或以中亚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将新疆割让与苏联<sup>4</sup>。在新疆问题上,国民政府深刻领略到莫斯科之“不干涉内政”的含义。国民政府当初决定进行中苏谈判有三个目标,(1)稳定中苏间的关系;(2)减少共产党的猖獗;(3)保证对日作战的苏联军队自东三省撤退,并尽量限制苏俄在东三省的权益,与其在新疆等地的活动<sup>5</sup>。然而,局势的发展表明,国民政府至此为止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但是,自9月15日以后,危在旦夕的全疆局面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形势。

### (三) 获取利益, 牺牲“东突”

1945年9月12至13日乌苏、精河相继失陷,新疆守军残部突围玛纳斯河东岸转进,伊宁民族军也跟踪急追,有趁势夺取迪化之势。蒋介石遂派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赴新助阵。9月中旬及下旬民族军多次集中向玛纳斯河正面及两翼猛攻,但未能越河直指迪化。其后,民族军回撤玛纳斯河西岸,郭寄峤电请蒋介石增兵,乘势追击民族军。郭寄峤分析道,“此时世界大战结束,苏俄对美国有所顾忌,决不会增派兵力来参战,我应乘机先行收复失地”。<sup>6</sup>但民国政府忙于收复东三省,无力分兵武力解决新疆问题。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国民政府面对苏联的秘密干涉而采取的武力解决新疆问题的措施业已受阻,只好寻求政治解决之道。

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念头与中苏谈判的进程有关。自7月11日国民政府确认莫斯科愿意书面保证不干涉新疆事务之后,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于10月间“归复伊犁”。朱绍良、吴忠信认为,如果此次宋子文与斯大林会谈有结果,中苏外交好转,双方就有关新疆事件若取得谅解,可于10月用政治方式收复伊犁<sup>7</sup>。354 但是,事态并非如国民政府的意愿而发展,伊宁政府之民族军自7月起以北、中、南三线对迪化政府展开全面攻击<sup>8</sup>,政治解决新疆问题之策略暂时被搁置。迟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之后,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就解决民族问题作出训示:“目前国际间之民族主义,业经获得解决,吾人现应解决国内之民族主义。吾人之政策为:国内各民族之未具有自治能力者,应予以协助,使其获得自治能力。对生活于边疆之民族,于其具有自治能力之时,即可予以自治”。<sup>9</sup> 有利于缓解新疆问题的这个指示,虽然也是麦斯武德(Mesut Sabir Baykuzi, 1887-1952)、伊敏(Mehmet Emin Bughra, 1901-1965)及艾沙(Isa Yusuf Alptekin, 1901-1995)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764。

<sup>2</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764。

<sup>3</sup>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页196。

<sup>4</sup>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 195.

<sup>5</sup>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页482-483。

<sup>6</sup> 郭寄峤口述,《救平新疆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经过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1982年),页13。另外,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曾对郭寄峤等收复新疆有一评述:“假如你不去迪化,则新疆一定失陷,你收复新疆之结果,对中央政府帮助不大,对毛泽东却是帮了大忙。因为,假如新疆陷入苏联所建之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手中,那斯大林还会把它交给毛泽东吗?新疆没有了,等于中国西北部没有了,也如同一把大刀,插入毛泽东的右肋下,那毛泽东还敢再以反苏来向国际招摇诈骗吗?”郭寄峤口述,《救平新疆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经过纪要》,页18-19。

<sup>7</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85。

<sup>8</sup> 有关伊宁民族军北、中、南三线全面攻击国民政府军的叙述,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页391-408。

<sup>9</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98。

等新疆民族主义者积极提倡的观点，但是与苏联支持的伊宁政府所追求的“民族解放”运动之目标尚有差距<sup>1</sup>。因此，新疆局势在失控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寻求借苏联之影响力，解决新疆问题。9月初蒋介石决定派在国共和谈中积有经验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前往新疆，指示其任务为“振奋士气，安定人心，考察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于是，张治中于9月12日由重庆飞往迪化<sup>2</sup>。

9月14日张治中在驻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的陪同下拜访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Yevseyev），就“伊宁事变”征询其意见。叶谢也夫表示：此全系新疆省内部事，当苏中双方在莫斯科订约时，苏联曾正式声明不干涉新省内政，因苏联对新疆向无领土野心。据其个人的看法，现时最好设法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张治中问叶谢也夫，是否愿意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之道路，先使伊宁方面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出代表正式商谈，否则一旦军事行动扩大，恐再无和平解决之机会。叶谢也夫表示，他个人极愿帮助，但最好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较易有效<sup>3</sup>。张治中当天电告蒋介石，称：“此间情况万分紧迫，除非伊宁军队中止前进，迪化殊无把握确保”。<sup>4</sup>他建议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同日，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电呈外交部，认为新疆问题祇有外交解决之途径，须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较为有效<sup>5</sup>。与此同时，即9月14日苏联方面也己做出伊宁与重庆方面进行谈判的提议。此前，由苏联外交部次长维辛斯基（Andrey Yanuaryevich Vyshinskiy, 1883-1954）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共同起草的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内容和策略之报告呈交苏共中央进行讨论。该报告指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时其内容和范围不能偏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精神，应在此条约基础上展开谈判<sup>6</sup>。鉴于该报告，苏共中央秘密通过一项《关于新疆形势的决议》。其主要内容为（1）鉴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协议的签订及双方对新疆问题的互换照会，认为在新疆起义者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承担调停工作是适宜的；（2）委托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此向中国政府发表相应声明；（3）建议新疆起义者在适当时机（其中包括可能将进行的谈判期间），暂时停止其武装力量的积极行动，观察中方之响应<sup>7</sup>。9月15日下午七时三十分彼得洛夫拜访外交

<sup>1</sup>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初的目标是民族解放，即完全独立。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于1945年1月5日宣布的《政府宣言》第一条可知：“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然而，自伊宁政府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后，其追求目标则改为“高度自治”。据张治中的回忆，伊宁政府“已经放弃了独立的要求，不提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只要得到高度自治了”。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35。伊宁政府所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内容是，除了外交、交通、币制由中央政府主持外，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则由当地人民自理。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20。中共官方历史学家对伊宁政府方面提出的“高度自治”要求并未提出异议，而对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民族主义者提出的“高度自治”则解释为“独立的代名词”或“以高度自治为名，鼓吹新疆独立”。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页461、496；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12。实际上有一些国民党高官也将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提出的“新疆自治”解读为“新疆独立”。唐纵，《唐纵日记》，页306、307、312。

<sup>2</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18。

<sup>3</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19；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4；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108。从叶谢也夫的响应中可推知，苏联政府内部就有关政治解决伊宁事件的决定在9月14日以前己达成共识，若非，苏联驻迪化领事不可能擅自做出让国民政府提请苏联政府协助解决伊宁事件的建议。

<sup>4</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19；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4。福布斯判断，苏联方面是在张治中“将苏联支持东突暴动公布于世”，即“最后通牒”之威胁下方同意从中调和伊宁事件的。See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p. 190-191. 其实并非如此。

<sup>5</sup> 唐屹、蓝美华、赵成竹，《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3。

<sup>6</sup> B. A.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96; Edmund O.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7.

<sup>7</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斯大林专档」(ГАРФ. 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66. Л. 7)，见 B. A.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96-97.

部次长甘乃光提到如果需要苏联愿协助中国解决伊宁事件<sup>1</sup>。同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晤，就新疆事件将进行交涉，莫洛托夫表示，此事为临时（transitory）性质现象，请王世杰放心勿重视，暗示此事将终止。据王世杰推测，“此或系中苏条约批准前预定步骤，而未曾宣布者”。<sup>2</sup>1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米克拉舍夫斯基拜会外交部，阐明彼得洛夫大使昨日与甘乃光次长谈话内容当是正确，并送交谈话书面纪要：

苏联驻伊宁领事报告苏联政府：有回民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现该领事馆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解彼等与中国当局间所发生之冲突。该代表等并声明暴动之人民，并无主张脱离中国之意，其宗旨凡回民在新疆显占多数之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塔城〕、阿尔泰、喀什喀尔〔喀什〕各区，均求达到自治之目的。该代表等并历述新疆回民之无权利，及中国行政当局之欺压、违法，与对回民之种种压迫情事，迫使回民出而以武力保护其权利。苏联政府因关心安定在其与新疆接连边界之上安宁与秩序，若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整新疆已造成之局势。<sup>3</sup>

国民政府外交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17日面告苏联大使：“（1）关于新疆回民暴动事，承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2）关于边疆人民待遇之改善，蒋主席早有宣示，政府对新疆人民甚为关切，此次事变政府已派张部长（张治中）暗中赴新疆调查，实即为改良待遇之张本；（3）我政府甚望此次事变分子即派代表到迪化，向张部长陈述意见，以便商洽解决。政府必根据既定政策，使新疆全体人员在政治、经济上与内地人民获得同等待遇；（4）苏联驻伊宁领事愿意协助，请即代为通知并介绍彼等到迪化，晋謁张部长，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至该代表等之安全我将力为保障”。<sup>4</sup>虽然国民政府有此善意面告，但蒋介石仍然对苏联政府不信任。蒋介石针对苏联政府出面调停伊宁事件一事于10月4日记事中，以为：“此固为苏联制造傀儡、以便其掌握利用之一贯政策”“其所谓‘调停’与‘商谈’，实为其缓兵之计耳”“我当以东北尚未接收，而中苏条约亦签订未久，故姑俟其提出内容与条件后，再言方针”。<sup>5</sup>

至此，苏联以牺牲“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换取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方面已做出了最终决议。伊宁政府军事力量为什么在9月中旬没有乘胜挥戈直捣兵力空虚的迪化，而被限制在玛纳斯河西岸驻兵待命，当缘于莫斯科已改变了其新疆政策，确然可知。但苏方同意解决新疆问题的目标和底线则是新疆自治。

莫斯科改变其新疆政策并非始于1945年9月中旬，其改变过程当始于酝酿中苏谈判之时。

<sup>1</sup>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80年），页765；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8。

<sup>2</sup> 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9；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175。

<sup>3</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765-766；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20。

<sup>4</sup> 唐屹、蓝美华、赵成竹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10。

<sup>5</sup>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页844；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766。

1945年6月9日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曾拜访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提出请苏联对于平息伊宁事变予以友好协助的要求，叶谢也夫表示，此事须请示莫斯科<sup>1</sup>。国民政府在中苏谈判前邀请苏方协助解决伊宁事件的努力未获其果。而与此同时，苏联高层为了达成中苏谈判之结果开始考虑调整新疆政策。6月10日贝利亚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顾问耶格纳洛夫呈交的一份报告中批注：“停止在‘三区’的军事行动”<sup>2</sup>。其原因是要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苏联将要对日宣战需要中方支持，另一方面为签署苏中友好条约构建友好环境。由此可知，苏联改变其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仅是策略性调整。因此，苏联高层为了完全控制伊宁政府以及在中苏谈判中使其成为捭阖之筹码，决定继续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发展。据俄国联邦国家档案馆资料，苏联政府为巩固东突共和国之成果，于1945年6月苏共政治局召开有关新疆问题特别会议，为强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实力决定向该共和国控制区派遣50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据内政部部长贝利亚呈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之报告，该决定已得到执行<sup>3</sup>。苏联政府为了加强该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为伊宁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火炮、弹药、车辆以及电话和无线电设备<sup>4</sup>。在苏联的支持下，伊宁政府民族军在中苏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并未停止其军事行动，即便是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其直指迪化的武力攻击持续进行，直至1945年9月中旬为止。虽然此时在莫斯科的调停下北疆的军事冲突略有缓解，而南疆的军事攻击仍然进行，直至1945年年底。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1945年9月苏联对新疆政策的转变，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内地援军陆续进入新疆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sup>5</sup>。而在吴相湘看来，这是苏联另一新阴谋的开始：“因为伊、塔、阿三区失陷后，暴民已据有进退自如的优越形势，足以胁持省政当局，不必再采取武力手段，惹起国际间的注意即可以达到其目的了，因此，当俄寇唆使毛匪泽东前往重庆，高唱‘联合政府’口号的同时，俄使即表示愿调停伊宁事变；于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联合政府’阴谋也开始在新疆酝酿了”。<sup>6</sup>曾任美国驻迪化领事之柯乐博认为，苏联方面阻止伊宁军事力量进兵迪化的原因盖与张治中欲将伊宁-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诉诸于国际社会有关，苏联方面也担心国民政府的同盟国美国也有可能参与此纠纷<sup>7</sup>。有些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以为莫斯科考虑到自身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因此同意协助国民政府解决该问题。如伊宁民族军为什么在有利条件下没有攻取迪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迪化有英美领事馆，苏联自然不愿让英美外交人员直接看到它在支持伊犁革命<sup>8</sup>。因此，在当时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对于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苏联都存有诸多顾忌<sup>9</sup>。而福布斯则不以为然，以为苏联鼓励伊宁方面已占据伊、塔、阿三区，实则苏联已达到获取其在该三区之经济资源和能源的利益<sup>10</sup>。《新疆风暴七十年》的作者张大军，同时从该共和国内部因素角度指

<sup>1</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79。

<sup>2</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斯大林专档》(ГАРФ. Ф. Р-9401. с/ч. Оп. 2. Д. 96. Л. 197)，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91.

<sup>3</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116)，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80.

<sup>4</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80.

<sup>5</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784；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5。

<sup>6</sup>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页448-449。

<sup>7</sup> Edmund O.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p. 367. 张大军也有类似的看法，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784。但该论点有讨论的余地。

<sup>8</sup> 黄建华，“1943-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对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30期1(2002年)，页58。

<sup>9</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1。

<sup>10</sup>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p. 193-194.

出，伊宁政府军没有进攻迪化是因伊宁方面还未攻下南疆之故<sup>1</sup>，即时机还未成熟。福布斯也分析到另一种政治现象，即新疆本身就存在反对苏维埃的民族主义者、南疆之地方宗教主义势力以及苏联支持的“先进分子”，而伊宁政府内部也存在民族主义与“先进分子”之间的斗争，维吾尔族、哈萨克等民族之间也有隔阂，莫斯科考虑难于驾驭全新疆民族及宗教之动荡，故此，以控制北疆三区为既定目标<sup>2</sup>。

对中苏关系深有研究的薛衔天认为：“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因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sup>3</sup>“苏联为什么采取这一政策？正如它坚持外蒙古独立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一样，取消‘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也是出于民族利益的需要。‘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产物。而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同样受到‘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正是‘双泛’的共同威胁，使中苏在解决新疆问题上有了契合点，苏联对新疆采取了‘务实政策’。即使是在1947年新疆当局开始执行反苏政策时，苏联也没有挑起新疆动乱，而是采取力保‘三区’，‘以静待变’的态度”。<sup>4</sup>

也有学者赞同此说，以为“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产物，而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正是这种威胁使中苏在解决新疆问题上有了契合点，苏联没有像对待外蒙古那样搞所谓的“民族独立”，而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政策，架空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三区真正的革命者，取消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最终使新疆问题于1946年6月得到了和平解决<sup>5</sup>。383对中苏关系有深入研究的沈志华也强调这一观点，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不对外扩张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对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sup>6</sup>。

曾任职于伊宁政府的高层人物曹达诺夫·扎义尔（1920-2007）对重庆与伊宁和谈的背景和原因叙述略异：“1945年9月中旬，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胜利。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毛泽东主席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签订了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双十协定》：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当三区民族军进占乌苏、沙湾，直接威胁迪化之后，国民党新疆当局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对新疆各族人民继续坚持武力镇压政策，扑灭‘三区革命’运动的烈火是办不到的。为了维持其在新疆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愿意和平解决与三区的问题。同时‘三区革命’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三区革命’斗争必须服从和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各族

<sup>1</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6577。

<sup>2</sup>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 196.

<sup>3</sup> 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期1（2003年），页68-74。

<sup>4</sup>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前言〉，页2。

<sup>5</sup> 伊传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初探”，《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卷2期11（2005年3月），页119。

<sup>6</sup>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7-228。

人民同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sup>1</sup>无疑，这个观点并不代表伊宁政府的主张，相反，其有意撇清伊宁政府与莫斯科的关系，而强调伊宁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尽管此时伊宁政府与中共殊无联络。

总之，苏联利用东突共和国已达到了其预定之战略目标，在确知获得在华的利益之时，改变了其支持东突共和国的独立政策<sup>2</sup>。莫斯科虽然在此时改变了颠覆新疆政策的政策，但是其主导伊宁政府（三区政府）直至1949年底。

莫斯科在调整其“东突”政策的同时，也开始调整其中共政策，即支持中共进入东北，强化中共整治、经济、军事实力。据薛衔天的分析，对苏联来说，为防止日本的重新崛起，牵制美国独霸远东，也需要同战后四大国之一的中国保持合作和一定的同盟关系。但是苏联并不看重这方面的利益。它所最为关注的是恢复沙皇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这两个独占的势力范围。由于通过“三区革命”苏联已控制了新疆局势，而且那里没有美国的势力，苏联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东北<sup>3</sup>。9月14日，苏联驻满洲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ii, 1898-1967）派遣东北苏军代表别洛鲁索夫（Belousov，亦译作贝鲁索夫）大校密访延安。别洛鲁索夫在中共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传达了苏军对共军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要求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别洛鲁索夫与中共朱德总司令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第一，允许中共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第二，允许中共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能进入东北大城市和苏战区公开活动；第三，允许中共控制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即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地区。苏军代表指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即“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与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军队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sup>4</sup>莫斯科的态度鼓舞了中共夺取东北的决心。9月15日中共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最后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并与苏军建立联系，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2万干部，不带武器穿着便衣，挺进东北<sup>5</sup>。9月16日，外贝加尔地区苏蒙联军代表克尼

<sup>1</sup> 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0。实际上许多参加过伊宁政府的高官在其回忆录及口述历史资料中常常隐晦该共和国与莫斯科的内在关系。移居境外者，常强调该共和国是其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而定居境内者，则必须点明该共和国是因中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结果。

<sup>2</sup> 沈志华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5。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莫斯科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页223。

<sup>3</sup> 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期1，页57。苏联对美国势力渗入满洲甚为担心。1945年底蒋经国以蒋介石之私人代表前访问苏联，斯大林曾告诉蒋经国，“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四册，页44。

<sup>4</sup>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页235。

<sup>5</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78；王渔，《中共党史简编》（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243-244；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28-129；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页229-235；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期2（1996年），页183-184；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14；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65；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北京：黄河出版社，1998年），页328；薛衔天编著，《中苏关系史（1945-1949）》（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52。

德涅夫 (Kenednev) 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 中苏条约之规定, 苏军必须退出已占领之热察地区, 因此坚决要求共军主力火速北上前往接收, 并主动表示愿秘密向中共提供武器支持。在重庆的苏联大使甚至向中共领导人表示, 中共应“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 防蒋进攻”。<sup>1</sup> 大批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 在那里建立了地方政权, 组织了地方武装, 但不以中共名义与苏军进行交涉。虽然驻东北苏军针对中共进驻东北策略时有起伏之变化, 但让中共主导东北事务的政策并未改变。<sup>2</sup>

曾在1942-1952年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列多夫斯基 (Andrei Mefodievich Ledovskiy) 也承认苏联帮助中共取得东北一事。列多夫斯基指出, 美国在军事和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进驻满洲 (东北), 但未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苏联领导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 但同时竭力阻止国民政府控制满洲并帮助中共取得政权。列多夫斯基认为苏联的作为违背了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苏中条约和有关满洲的协议。其中的原因“应该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 从苏美在远东的对抗, 从国际紧张关系普遍尖锐化方面去寻找。正如中国史学家公正地指出的, 苏联视中共为更亲近的意识形态盟友, 想凭借他竭力对抗美国对中国以及对整个远东的政策。对此还应加以补充, 苏联领导通过自己在满洲对中共的支持而追求更为广泛的战略目标, 即不仅对中国的, 而且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施加影响。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府所持的立场使中共领导在同国民党的抗争中持强硬态度, 战后中国事件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特点正在于此”。<sup>3</sup> 另外, 有些学者也指出, 斯大林基于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 迅速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sup>4</sup>。也有学者以为, 斯大林在东北政策上有双重考虑: 一方面他认为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有力量统治中国, 双方签订的中苏条约表明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这同时也是苏、美雅尔塔交易的组成部分, 苏联无法改变态度。另一方面, 虽然雅尔塔协议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以特殊地位, 苏联仍然需要一支力量在苏联撤走后牵制国民党。苏联不能让国民党和美国势力在东北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sup>5</sup>。然而, 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制止伊宁政府军进攻迪化以及鼓励中共进兵东北之两种策略, 明显表明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所使用的杠杆已倾向中共, 选择中共为其胁迫国民政府的筹码, “东突”的牵制作用渐已被中共取代。

1945年9月中旬至下旬, 莫斯科最终做出伊宁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 盖于此期间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开始施加压力, 敦促其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至10月2日“东突”政府通过第100号决议, 同意与中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由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 (Rahimjan Sabirhaci)、阿不都海依尔·吐烈 (Abudul-hayr Töre) 及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Ahmedjan Kasim) 三人组成<sup>6</sup>。3日叶谢也夫约见刘泽荣称: 已奉莫斯科复电, 伊宁方面谈判代表业已内定, 请确定伊宁谈判代表到达迪化的时间和路线<sup>7</sup>。10月9日叶谢也夫通知新疆省政府, 伊宁方面谈判代表将于12日抵达迪化<sup>8</sup>。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 其中提到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sup>9</sup>。10月17日双方展开了第一次和平谈判。第一次谈判结束后, 内政部高官耶格纳洛夫及朗方等将军从伊宁启

<sup>1</sup>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页231。

<sup>2</sup> 乌传袞, “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简论(1945年8月-1949年10月)”,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期2(1990年), 页6-16; 张盛发, “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 《世界历史》, 期6(1999年), 页19-30; 路文娟, “1945年8月-1946年4月苏联对中国东北政策的研究”, 《鞍山科技大学学报》, 卷28期5(2005年10月), 页381-387、391。

<sup>3</sup> 列多夫斯基著、郭兴仁译, “1937-1949年间的苏联与中国: 一位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 《抗日战争研究》, 总期6(1992年), 页216-217。

<sup>4</sup> 章百家、牛军, 《冷战与中国》(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页75、77-78。

<sup>5</sup> 华庆昭,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页145。

<sup>6</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页115-116。

<sup>7</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页116。

<sup>8</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页117。

<sup>9</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页118。

程于10月24日在精河会见了自迪化返回的伊宁政府三名谈判人员；10月29日向莫洛托夫·马林科夫（Georgy Maksimilianovich Malenkov, 1902-1988）、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 1895-1978）及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汇报了有关谈判状况和中国方面的观点<sup>1</sup>。据俄国档案，在谈判过程中关于伊宁方面的内部情况（包括总体情势、内部矛盾、发展动态），都由苏联内务部随时直接、迅速地通报给内务部长贝利亚；贝利亚又将这些情况直接报告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几名最高领导人<sup>2</sup>。此外，伊宁政府谈判代表团每次参加双方谈判前后也都与苏驻迪化领事叶谢也夫会面。苏联调停者一方面对伊宁政府的利益加以维护，另一方面，又对伊宁政府中主张独立的势力加以限制，构成了苏联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对新疆政策的两个方面<sup>3</sup>。苏联开始直接介入伊宁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进程，但是，苏联主导伊宁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行为在伊宁政府控制区产生了负面影响，行政区的官员和平民之间对该谈判有所异议<sup>4</sup>。其中东突共和国主席艾力汗·吐烈自始至终反对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及签署有关协议。<sup>5</sup>

张治中于10月14日由重庆经兰州飞抵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1899-1975）、彭昭贤（1896-1979）、屈武（1898-1992）、张静愚（1894-1984）、邓文仪（1905-1998）、刘孟纯（1904-1982）、王曾善等人。伊宁政府谈判代表先于张治中一行两日抵达迪化。为了使谈判有所成果，张治中特邀避居兰州的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人（当时在新疆被称为“三先生”）赶赴迪化。该三人也于17日飞抵迪化。由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麦斯武德侄子及女婿）、阿不都海依尔·吐烈及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组成的伊宁政府代表团，身穿草绿军装，配星月肩章与星月勋章，佩带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声言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与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中国政府方面也应交验证件。张治中面对这一情势，即于15日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洽商，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事变分子的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并请叶谢也夫领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伊方。三区代表经叶谢也夫领事之劝告，最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态度。这样谈判方得以举行<sup>6</sup>。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人也与伊宁方面谈判代表经常会面，鼓励其要求更广泛的自治要求。然而，伊宁方面代表并未表示其谈判意图。据伊敏的观察，伊宁方面的实际代表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据艾沙的观察，伊宁方面代表完全受制于苏联<sup>7</sup>。另外，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人也与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及副领事Almas（乌兹别克人）见面，重申苏方帮助要求新疆之广泛性自治。而苏方领事以为此要求涉及中国内政，不宜参与其中<sup>8</sup>。该“三先生”不仅与伊宁方面代表会面，而且与艾力汗·吐烈也有秘密通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之初与该共和国主席艾力汗·吐烈曾通过驻兰州的苏联商会去信邀请以上三人来伊宁共同主导新疆事务。因国民政府的阻止而未果<sup>9</sup>。该「三

<sup>1</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296-297），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09-110.

<sup>2</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451；See Vladislav Zubok &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6.

<sup>3</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420.

<sup>4</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298-299），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10.

<sup>5</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273.

<sup>6</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22-423.

<sup>7</sup> 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艾沙回忆录：为了被奴役的东突厥斯坦）（Derleyen M. Ali Taşçı）（İstanbul: Doğu Türkistan Neşriyat Merkezi, 1985），ss. 445-446.

<sup>8</sup> 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s. 446. 该“三先生”不仅是国民政府之官员，也是反苏的民族主义者，因此，苏联驻迪化领事在内部要求伊宁政府谈判代表向国民政府争取自治的同时，又告诫“三先生”要求自治是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可知，除伊宁政府之外，苏联方面并没有与新疆其他势力进行合作的意图。

<sup>9</sup> 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ss. 439-440; Gültekin Baykozi Pehlivan, *Dr. Mesut Sabri Baykozi (1887-1952) ve Kurtuluşu Arayan Doğu Türkistan*（麦斯武德及寻求解放的东突厥斯坦）（Ankara: Güner Matbaacılık Ticaret Sanayi, 1990），ss. 68-69.

生」从兰州回到迪化后，艾力汗·吐烈与他们也通过信<sup>1</sup>。虽然当时的新疆精英之间在新疆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但是，包括艾力汗·吐烈及麦斯武德、伊敏和艾沙等人从不相信苏联会真心拯救新疆民众。<sup>2</sup>

艾力汗·吐烈自始至终反对与国民政府谈判，并且派兵在南疆继续展开军事活动，违反苏联停战之告诫。1945年10月18日，耶格纳洛夫上呈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到，已截获艾力汗·吐烈指示指挥南疆军事行动负责人苏比耶夫（Subiyev/Sofi Ahun）继续扩大军事打击国民党政府军之信件<sup>3</sup>。10月22日，内政部第一部第四局局长郎方将军与耶格纳洛夫将军共呈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艾力汗·吐烈积极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扩大东突厥共和国政府之军事活动。艾力汗·吐烈独自行动，已不与吾人商讨。报告中提示，在未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前，对艾力汗·吐烈的行为并未采取措施<sup>4</sup>。对艾力汗·吐烈脱离莫斯科擅自行动的行为，大概引起了苏联高层的关注和不满。苏联高层在寻求如何处理艾力汗·吐烈的同时，为保证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影响力，以及为该共和国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带来的变化环境作准备，便于10月决定向“三区”派驻由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及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军队。10月20日贝利亚呈莫洛托夫报告中称，向新疆派遣红军任务已完成<sup>5</sup>。从艾力汗·吐烈回忆录中可知，苏联政府派出的红军由来自于各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塔塔尔人组成，其中一部分属于苏联内政部系统的骨干分子。这批骨干分子分别安置在伊宁政府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至1945年底，该共和国许多机构主管被称为“先进分子”的红军骨干分子所替代<sup>6</sup>。苏联政府为全力控制伊宁政府，渗透各政府部门已采取了积极步骤。

在这种情况下，艾力汗·吐烈在1945年11月仍然致电苏联内政部长贝利亚，请求苏联援助其从中国统治者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这一电报被转送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但苏联最高领导显然对其要求未予支持<sup>7</sup>。由于伊宁政府内部对和平谈判有分歧以及双方在某些议题上的没有达成共识，致使谈判迟滞无进展。苏联政府为使谈判早日结束，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艾力汗·吐烈回忆录，12月12日在苏联政府的逼迫下，在南疆的伊宁政府部队开始撤回伊宁<sup>8</sup>。至年底，苏联政府抽调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之骨干派驻三区各地，担任要职。原伊宁政府领导高层也逐渐被这些骨干所取代。原伊宁政府某些高官一夜之间都转变为莫斯科在三区的代表人物。伊宁政府也逐渐由苏联驻伊宁领事柯兹洛夫所主导，伊宁政府开始积极培养亲苏分子，反对政府中的民族主义分子<sup>9</sup>。政府中的左翼势力业已得势。

在这种背景下，同年12月底蒋经国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讨论中苏关系问题<sup>10</sup>。蒋经国未至莫斯

<sup>1</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78.

<sup>2</sup> 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ss. 440-442; Ali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4-235; Amaç Karahoca, *Doğu Türkistan: Çin Müstemlekesi* (东突厥斯坦：中国的殖民地) (İstanbul: Fakülteler Matbaası, 1960), s. 21. 张大军指出，主张民族自治的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民族主义者都认为伊宁事件无苏联人背景。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二册，页 6803。然而，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回忆录中都强调伊宁事件背后有苏联人之背景。张大军之说恐有误。

<sup>3</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117），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03.

<sup>4</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118），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05.

<sup>5</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洛托夫专档》（ГАРФ. Ф. 9401с. Оп. 2. Д. 104. Л. 118），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04-105.

<sup>6</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74.

<sup>7</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 451-452。

<sup>8</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73. 南疆持续作战本为谈判成功之一策略。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册，页 6787。当谈判结果达到其预定目的之后，莫斯科有改变其东突策略，强行召回伊宁政府攻打南疆之部队。

<sup>9</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74.

<sup>10</sup> 1945年底，为了解决中苏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政权、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关系、大连港的使用等问题，蒋介石要求派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谒见斯大林。1945年12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

科之前，即12月29日苏联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提交的《关于蒋经国来访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就分析到中国代表团将会提出新疆问题：“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sup>1</sup>蒋经国于12月30日第二次与斯大林会面时果然提出了新疆问题。斯大林询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蒋经国答复：“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sup>2</sup>从斯大林信心自满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此时莫斯科已完全控制了伊宁政府。而艾力汗·吐烈被认为是阻碍和平谈判的负面人物，因此取缔艾力汗·吐烈当为时下之要事。1946年6月8日艾力汗·吐烈突然收到一封恐吓信，逼迫其辞职。艾力汗·吐烈与麦斯武德、伊敏及艾沙等东突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秘密书信也被窃走。6月13日艾力汗·吐烈被苏联内政部情治人员劫持，送回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sup>3</sup>，扫除了干扰和平谈判的最后障碍。伊宁政府领导由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担任。6月28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宣布解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sup>4</sup>。至此，原伊宁政府所辖之三区皆由左翼共产主义者主导其一切政、经、军事务。

经过双方艰苦谈判，南京与伊宁之间于1946年6月6日达成最后协议，并于1946年7月1日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席、由副主席阿合买提江代表三区方面、包尔汉（Burhan Shahidi, 1894-1989，苏联之塔塔尔族）代表其他七区的一个具有民主联合性质的政府的新疆联合省政府<sup>5</sup>。张治中对此评价说：“由于双方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居间调停，才终于使历时一年又八个月的伊宁事件获得和平解决。这个影响和作用似甚远大，乃至也为新疆在一九四九年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吧？”<sup>6</sup>实际上，谈判过程多由苏联方面主导，甚至联合政府的伊宁方面人选也由莫斯科仔细甄选，并且得到了贝利亚的首肯<sup>7</sup>。莫斯科对该谈判结果大约感到满意，因此，苏共高层在1946年8月6日的会议上认为苏联主导新疆和谈的任务圆满完成<sup>8</sup>。在苏联的配合下，张治中对谈判结果也感到满意，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伊宁政府之独立于迪化政府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当时就有人批评张治中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事业并非成功之作<sup>9</sup>。1947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麦斯武德

---

斯大林准备于12月下半月接见蒋介石的代表。12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接见彼得洛夫，告诉他蒋介石决定派其儿子、东北特派员蒋经国于本月25日左右赴莫斯科。12月30日，蒋经国一行抵达莫斯科，并于当晚受到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谈话，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想法和倾向性意见。1946年1月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回国。

<sup>1</sup> 丁明、耿葆贞等翻译，沈志华编辑、校对和注释，《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档，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http://www.shunz.net/mybook/history/histroy\\_015.htm](http://www.shunz.net/mybook/history/histroy_015.htm)（撷取时间2004年6月16日）。

<sup>2</sup> 丁明、耿葆贞等翻译，沈志华编辑、校对和注释，《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档，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http://www.shunz.net/mybook/history/histroy\\_015.htm](http://www.shunz.net/mybook/history/histroy_015.htm)（撷取时间2004年6月16日）；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452。

<sup>3</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78-279.

<sup>4</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 281;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173。

<sup>5</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64。

<sup>6</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页454。

<sup>7</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贝利亚专档》(ГАРФ. Ф. Р-9401. Оп. 2. Д. 149. Л. 206-210)，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10.

<sup>8</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5.

<sup>9</sup> 张治中的和平政策之所以未能收获预期的成效，第一是由于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民族仇恨，非短时间内所能消除净尽；第二是张氏没有得到足够的人力财力的支持，使他所宣示的如何发展经济，推广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的诺言，无法迅速兑现，以致他的执行和平政策的诚意，不易为顽固分子所信任；第三是在野心家的恶意宣传挑拨阻挠之下，使和平条款所规定的一切事项，不能顺利实施。伊宁方面的人物，始终未曾放弃过他们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全盘企图，他们的签订和平协议，停止军事行动，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策略。评论见陈斯英，“伊宁事变前后的新疆政局”，原载《中国青年》（南京），卷1期9（1947年），见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页422。有关张治中与三区政府周旋之状况，见陶天白，“张治中与‘三区革命’”，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页55-80。

担任该联合政府主席之后，伊宁方面表示不满，双方矛盾激化。8月联合政府中之伊宁方面代表开始陆续返回伊犁，联合省政府破裂。至1949年9月中共军队进驻新疆以前，国民政府的政治势力仍未达到北疆，伊宁政府俨然为一独立政权。

### 三、结论

孙福坤在“苏俄对新疆的政治军事侵略”一文中分析了苏联侵略邻邦之特点：“（1）开始乘机渗透，伺隙而窥；（2）再进一步扶植一人对其貌示伪善与友好，但实际上即用以为侵略的工具；（3）同时再扶植其他力量，以为牵制，不令其产生尾大不掉之弊；（4）对于被利用之人，不使其有太长之时间，得形成其个人之力量，故当其作用减少之时，即设法换掉；（5）时机一熟立即吞并”。<sup>1</sup>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与此分析轨迹多有符合，然而，苏联并没有吞并新疆，相反要求该共和国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求自治。

据俄国学者巴尔敏（Valery A. Barmin）对苏联时期莫斯科对华政策中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指出，苏联高层并无意支持新疆独立。苏联支持“三区”民众独立运动并非其真实意图，也没有将新疆纳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之意。苏联高层的意图本是推翻盛世才政权，支持新疆土著民众当政，使其拥有行使自主权的权利，但在不脱离中国版图条件之下。因此，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苏联将会分裂新疆之言论有误，缘任何俄国档案中并无支持此类观点的数据<sup>2</sup>。巴尔敏引述道，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于1943年5月4日就盛世才背叛行为及有关新疆局势问题之评议会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作出将新疆分离出去以及兼并其领土的决议，因为，苏联领导人考虑会全面影响中苏关系<sup>3</sup>。巴尔敏以为，莫斯科第一次对外表明无意支持新疆独立之主张是在1945年5月斯大林接见杜鲁门的顾问霍普金斯之时<sup>4</sup>。同时，巴尔敏又例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初密访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会面时表示莫斯科不支持新疆独立而强化其论点<sup>5</sup>。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怀疑伊犁之“革命”得到苏联的协助，因为斯大林对协助伊斯兰势力分裂新疆不感兴趣<sup>6</sup>。实际上，苏联自1933年起就已制定了新疆政策，即（1）不支持新疆从中国分离；（2）支持新疆地方自治<sup>1</sup>。这似乎已成为苏俄对新疆之传统外交策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建国至国家地位被取缔的整个过程都印证了该策略，即新疆不能独立，只能自治，而自治并不取决于汉族或当地民族，唯取决于亲苏还是反苏。因此，当张治中领导新疆政治倡导亲苏政策时，莫斯科对此感到满意；当国民政府改换反共而提倡民族主义思想之麦斯武德任职新疆省主席时，莫斯科则深感威胁，鼓励“三区政府”抗议麦斯武德联合政府，甚至威胁瓦解该政府，终于迫使南京政府撤换麦斯武德。

苏联在协助东突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制定了精细的计划，花费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完成了有组织、有目的而且非常成功的东突独立运动。从巴尔敏德观点来看，苏联支持东突独立是为了推翻盛世才政权和让土著执政，当然所谓的“土著执政”，是当地民族在国民党政权下建立的自治政权。而当地民众则以为苏联政府是支持其建立独立国家的。在起事之前，斯大林曾传话给艾

<sup>1</sup>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一），页737。

<sup>2</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86-189.

<sup>3</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71.

<sup>4</sup>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90.

<sup>5</sup>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与中共高层会面时表示苏联不会支持新疆独立。据2月4日米高扬电呈斯大林与中共会谈之报告，米高扬向中共主席毛泽东表示，莫斯科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不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同时，米高扬强调，将来中共建政时也不希望中共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给予民族独立之地位，缩小中国版图。至多给予民族自治之地位。据米高扬的报告，毛泽东对苏联民族问题之态度感到欣慰，从毛泽东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可能给予民族独立之意图。见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стр. 177-179.

<sup>6</sup>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p.178;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 Y. : M. E. Sharpe, 1990), p. 94.

力汗·吐烈，提出愿意帮助其建立独立国家<sup>2</sup>。1944年8月苏联驻伊宁领事杜波辛（Duboshin）告诉艾力汗·吐烈，苏联不但愿意支持其独立事业，甚至可以以不公开的形式承认其所建立之共和国<sup>3</sup>。这也许是斯大林为达到鼓动当地民族反抗盛氏政权之目的而使用的妄语，但是，斯大林本人也知当地人的独立愿望，如1945年7月9日中苏第四次谈判中斯大林有意向宋子文问到：“叛民意图脱离中国乎？”<sup>4</sup>另外有一些苏联官员似乎也主张东突独立，如郭寄峤于1946年3月11日密呈外交部信中提到，最近由莫斯科归来、奉斯大林面示之苏联驻迪化副领事吓斯丹吉诺夫、乌国马索夫将负责“解放新疆事”。该副领事答询此间工作人员称：“对国际弱小民族及劳动者使其自由平等，为苏联既定之政策，新疆多数回族为少数汉族压迫统治，苏联政府当然有以武力支持此一被压迫民族实现解放自由之义务”。<sup>5</sup>说明苏联内部对新疆独立一事有意见相歧的现象，而这种分歧也反映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领导阶层<sup>6</sup>。盛世才于1950年3月8日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卜道明谈话时声称，1940年签署“盛苏密约”时，苏联曾鼓励其在新疆独立<sup>7</sup>。而苏联方面的解释与盛世才的说辞有违，指出1941年1月盛世才向苏联建议使新疆叛离中国而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纳入苏联加盟共和国<sup>8</sup>。虽然两说有异，但也表明苏联方面在新疆“统独”问题上似乎有过慎重的考虑。自二战结束后苏联对新疆政策已明朗化，从支持其独立转变为支持其自治。

莫斯科改变其新疆政策，并非其国力不能支持东突独立，也并非伊宁政府之四、五万民族军无力攻取新疆首府迪化，而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映在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改变上。从以上的研究可知，盛世才自1942年受国民政府的招安，并且力争驱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然而，遭到了莫斯科的反制，苏联为保障其在新疆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一方面在新疆制造紧张气氛，迫使国民政府撤消盛世才之新疆省一切职务，另一方面鼓励深受迫害的当地民众起义反抗，建立了独立政权。苏联势力自被赶出新疆之后，莫斯科第一次成功的利用新疆民众对盛氏政权的憎恨，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预设的新疆政策。因为“新疆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手中，因此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物资由新疆转运中国内地的计划也因此被取消。因为苏联造就了“新疆问题”之筹码，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中有信心提出不利于国民政府主权的要求，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在雅尔塔密约中所获之利益，而且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其利益用法律形式合法化，巩固其对华外交的影响力。而中国的虚弱以及美、英等国对苏联在新疆的战略意图不甚了解，为苏联主导新疆事务创造了机遇。从1943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苏联对华政策中始终伴随着新疆问题之阴影，而且，苏联根据国际情势与国内政治需要随时调整其新疆政策，渐次缓急向国民政府施压。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迫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取缔其独立之政治地位，进而再次利用“新疆问题”调整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当时对此有准确的推测，以为结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地位，“此或系中苏条约批准前预定步骤，而未曾宣布者”。<sup>9</sup>从发展过程来看，苏

<sup>1</sup>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页420。

<sup>2</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2-233.

<sup>3</sup> Alikhan Töre Saguni, *Türkistan Kaygısı*, ss. 234-235.

<sup>4</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618。

<sup>5</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31。另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以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甫塞也夫（叶谢也夫）邀请包尔汉·沙赫德拉会面。据包尔汉的回忆，领事叶甫塞也夫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位不认识的苏联人。那人站起来同包尔汉寒暄而且问道：“伊犁革命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包尔汉回答：“我是坚决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成立独立的国家，我不同意”。那人没有肯定或否定包尔汉的观点。当时包尔汉感觉到：三区的武装斗争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可怀疑的，苏联的外交人员对三区的斗争也存在着不甚相同的看法和估价。此事过后，叶甫塞也夫对包尔汉说：“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包尔汉，《新疆五十年》，页282。

<sup>6</sup>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册，页420、428、441。

<sup>7</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四册《新疆卷》（二）（台北：外交部编印，2001年），页408。

<sup>8</sup>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页437；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页208。

<sup>9</sup>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页309；王世杰，

联制造的“新疆问题”已结束了其第一步历史使命。其第二步历史使命则是协助伊宁政府获得自治的权力，以便有限保证在新疆的利益。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改变以往不支持中共的政策，借中共筹码强化其对华外交的影响力。也正因为有此发展，制衡国民政府之“东突牌”逐渐被“中共牌”所取代，其原因较之“东突牌”，运用“中共牌”可以达到更广泛之利益目标，可以替代“东突牌”所拥有的功能。虽然这两张牌各有其功用，但战略利用“中共牌”也可以达到“东突牌”所带来的利益。其结果，真正失去利益最大者当是新疆民众，是大国间利益竞争的最大牺牲者。

## 征引书目

### （一）档案数据

#### 西文部分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Volume V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ff,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中文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全十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四册《新疆卷》（二）。台北：外交部，2001年。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台北：外交部，2001年。

唐屹、蓝美华、赵竹成编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台北：外交部，2001年。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页175。

-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中苏关系中的「东突」问题（1944-1945） 207
-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八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
-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
-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 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亚·菲舍尔注释《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

## （二）专著

### 外文部分

- Alperovitz, Gar,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 Alperovitz, Gar,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 Beloff, Max,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Beloff, Max,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4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Benson, Linda,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0.
- Bishop, Jim,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 Byrnes, James F., *All One Lifetim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8.
- Cheng, Tien-fo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7.
- Clubb, Edmund O.,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Feis, Herbert,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Forbes, Andrew D. W.,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Forbes, Andrew D. W.,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Grew, Joseph C., *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 1904-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2.
- Harriman, William Averell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208
- Kotkin, Stephen and Bruce A. Elleman,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9, pp. 137-162.
- Leahy, William Daniel, *I Was Ther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50.
- Romanus, Charles F.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 the Army, 1953.
- Roosevelt, Elliot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chmitz, David F., *Henry L. Stimson: The First Wise Man*.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1.
- Stimson, Henry L.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 Westad, 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s: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hiting, Allen S. and Sheng Shin-ts'ai, *Sinkiang: Pawn and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Амаç Карահоча, *Doğu Türkistan: Çin Müstemlekesi*. İstanbul: Fakülteler Matbaası, 1960.
- Бармин, В. 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Монография*. –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 Бармин, В. 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8.
- Pehlivan, Gültekin Baykozi, *Dr. Mesut Sabri Baykozi ( 1887-1952) ve Kurtuluşu Arayan Doğu Türkistan*. Ankara: Güner Matbaacılık Ticaret Sanayi, 1990.
- Alptekin, İsa Yusuf,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Derleyen M. Ali Taşçı). İstanbul: Doğu Türkistan Neşriyat Merkezi, 1985
- Saguni, Alihan Töre, *Türkistan Kaygısı*. İstanbul: Orient-Institut İstanbul, 2006.

### 中文部分

- 丁宏、张国杰，《百年中国穆斯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戴维·达林 (David J. Dallin) 著、潘崖译，《苏联与远东》 (*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台北：华国出版社，1950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战后中苏关系走向 (1945-1960)：中俄 (苏) 关系学术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中国边政协会编，《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台北：中国边政协会，1954年。
- 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编，《新疆研究》 (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之二)。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4年。
-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
-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一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4年。
-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
-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
-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四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

外交部主编，《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台北：外交部编印，1950年。

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年。

安宁，《新疆内幕》，出版地不详：创垦，1952年。

安德烈·梅福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A. M.）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出版社，1973-1974年。

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法眼晋作著，长靖等译《二战期间日本外交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弗朗西斯·克理佛德·琼斯（F. C. Jones）·休·博顿（Hugh Borton）·伯提·雷吉诺·皮尔恩（B. R. Pearn）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6: The Far East*），上、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孙福坤编著，《苏联掠夺新疆纪实》。九龙：自由出版社，1952年。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

张其昀，《大陆沦陷的痛史与光复大陆的努力》。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抗战建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0年。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

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梁敬箴，《中美关系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郭寄峤口述，《救平新疆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经过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1982年。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8年。

-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
- 陶文钊主编，《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 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北京：黄河出版社，1998年。
-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苏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1957年。
- 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 蒋经国，《负重致远》。台北：幼狮书店印行，1976年。
-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册。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2年。
-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薛衔天编著，《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罗伯特·西华（Robert E. Sherwood）著、李秋生译，《罗斯福与贺浦金斯：战时白宫秘录》（*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上海：上海中央日报社出版委员会，1948年。
-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北京：商务印书局，1984年。
-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 苏光文，《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

### （三）论文

- 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期1，1987年，页217-243。
- 安德烈·梅福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著、郭兴仁译，“1937-1949年间的苏联与中国：一位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抗日战争研究》，总期6，1992年，页193-222。
- 朱培民，“1943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21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宋凤英，“多变军阀盛世才”，《文史精华》，期3，2005年，页32-38。
- 宋凤英，“多变军阀盛世才的诡秘人生”，《军事史林》，期8，2005年，页43-49。
- 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08-236。
- 李嘉谷，“《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期4，2002年，页79-88。
-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期3，1999年，页213-242。

- 周宁选辑，“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签呈，1944年7月10日”，《民国档案》，期2，2006年，页52。
- 郎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64-173。
- 栗国成，“张嘉璈与战后初期中苏关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谈判（1945/10-1946/4）”，《政治科学论丛》，期19，2003年，页139-180。
- 乌传袞，“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简论（1945年8月-1949年10月）”，《苏联问题研究资料》，期2，1990年，页6-16。
- 茹莹，“1945年前美俄（苏）对华政策特点之比较”，《齐鲁学刊》，总期172，2003年，页133-138。
- 茹莹，“二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出兵远东态度的变化”，《战争史研究》，期3，2002年，页46-49。
- 张治中，“从迪化会谈到新疆和平解放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期1，1996年，页13-18。
- 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期6，1999年，页19-30。
- 曹国芳，“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21期2，2005年，页123-127。
- 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53。
- 陶文钊，“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曾景忠主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438-459。
- 曾小鲁，“吴忠信统治新疆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83-97。
- 黄建华，“1943-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对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卷30期1，2002年，页56-59。
-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论”，《西北史地》，期4，1994年，页64-72。
- 黄建华，“论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期2，2002年，页53-56。
- 路文娟，“1945年8月-1946年4月苏联对中国东北政策的研究”，《鞍山科技大学学报》，卷28期5，2005年，页381-387。
-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译，“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8辑。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118-157。
- 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期1，1998年，页79-90。
- 欧阳云梓，“1942-1943年国民政府的新疆战略述评”，《中州学刊》，总期129，2002年，页92-94。
- 欧阳云梓，“四十年代中苏关于苏联势力撤出新疆问题的交涉”，《西域研究》，期4，2001年，页39-45。
- 欧阳云梓，“盛世才被迫离新原因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卷24期6，2004年，页19-22。
- 欧阳云梓，“试论1942年中苏关于苏联势力撤出新疆问题的谈判和交涉”，《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29期4，2001年，页43-48。
- 蔡锦松，“撰写《新疆简史》第三册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导思想”，《新疆历史研究》，期2，1986年，页1-6。
- 霍斋·松哈什，“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

犁文史资料》，第14辑，1988年，页65-78。

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期1，2003年，页68-74。

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期1，1996年，页53-76。

谢承国，“论盛世才政权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基础”，《史学月刊》，期4，1999年，页61-65。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